



政見
合辑·二〇一四年春

轮值主编：归 宿

本期设计：钱争予

观察员：

陈仲伟	方可成	傅若兰	归 宿	韩 笑	励 轩
刘含章	刘 冉	刘岩川	马 军	缪 莹	邵 立
宿 亮	陶 郁	汪吕杰	王 馨	王绍达	王 韬
吴 瑶	武卓韵	杨鸣宇	于灵歌	袁 林	袁幼林
张跃然	周 航				

制图师：

卜书剑	龚方舟	黄俊如	黄雷蕾	焦佳文	吕 妍
钱争予	苏颢云	魏天瑶	姚 辰	张韧刚	周优游

新媒体运营：

韩智轩	李大岩	卢凯悦	吴 睿	赵蒙昀	张 烨
-----	-----	-----	-----	-----	-----

设计师：

钱争予 朱丹青

工程师：

黎 达 林育颖 周优游

靠谱地谈论中国

关于政见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从官员到农民，从时评人到的哥，似乎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一番；但是，似乎又没有人能真正将它弄明白、说清楚。大众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充斥着令人目不暇接的信息和似乎永无止境的争吵，但是，它们都太局限了。

要想更靠谱地谈论中国，你需要接触更智慧的头脑，吸取更优质的思想资源。

我们的使命与愿景

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的“政见 CNPolitics”，希望带给你这样的

资源。我们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独立网站，成员包括海内外政治学研究者和国内一线时政记者。我们秉持专业、独立、理性的原则，跟踪阅读全球学术界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最新研究，从中挑选出最具价值的部分呈现给你。

我们引介的思想资源，绝大部分都是在大众传媒上无法见到的。它们呆在仅有专业人士才经常问津的学术期刊、报告、会议中，普通公众鲜有机会接触。

当然，来自学界的研究成果也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比起大众传媒提供的快餐，比起社交网络上那些泛着情绪化泡沫的争吵，学界的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基于丰富的研究材料，经过了理性的逻辑推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接近真相，提供更具解释力的观点，是更值得你参考的信息。

我们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多位大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使用了我们制作的内容，中央编译局出版的期刊曾转载我们的文章，还曾有省部级官员与我们联系，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得到了包括大西洋月刊在内的众多外媒译介。不过，比起这些，我们更看重每一位普通读者从“政见”的内容中吸取的营养、得到的启发。

我们的风格与旨趣

我们致力于发掘理性、靠谱的思想资源，理性并不等于枯燥，它们往往是鲜活、有趣、令人茅塞顿开的。

我们将普通人难以接近的学术研究成果，以强调“专业性、趣味性、信息量”的写作风格呈现给你，节省你的宝贵时间。

媒体报道

他们不忙着在公共辩论中站队，而是为读者普及热门话题背后的知识；

他们不直接发表政治意见，而是编译介绍外国的学术观点；

他们管自己做的事情叫“政治科普”。

（年轻政网深入浅出），《联合早报》，2013年6月30日

5月21日，一个由青年人自发组织的非盈利网站“政见”发布了一条“图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微博。3个月内，这条微博被转发2786次，评论382条。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转发微博并评论道：“中国公民基础知识之一：多民族。好帖。收了！”

一个名为 CPGTour 的网友评论道：“太棒了，要顶！如果这个有英法文版就更好了，给外国人介绍时更加生动。以前没见到过这么棒的图文并茂又简洁的分析介绍。”

《凤凰周刊》主笔黄章晋曾写过一个关于少数民族的专题，他看到这张图后，留言道：“看到这图，想想我的呈现形式，我觉得我像一条听到自己腰椎咔嚓一声折断了的小狗……费劲巴拉地写了一大堆，被人一张大图给灭了。”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4日

新一代人对现实的认知和行动力，完全跃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他们知道怎么通过社会网络激发参与和共建新的平台，从生活的裂缝本身，给社会撕开了新的出口。

《商业周刊 / 中文版》(Bloomberg Businessweek)

各界评价

口水少、有新知，值得关注。

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学者

总体来说，“政见”的信息图新闻产品引领了业界的潮流，树立了一定的评判标准。经由“政见”的介绍和推广，信息可视化的概念在国内新闻界得到了广泛关注。虽然“政见”团队自身具有有别于专业媒体的特殊性，它的信息图新闻也并非量产，但它在新闻领域作出的信息可视化尝试确实在逐渐改变国内传统的生产模式，更新了受众的阅读体验，这对于信息时代新闻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龙昊，《新闻信息可视化的尝试——以“政见 CNPolitics”的信息图新闻生产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6月

一群年轻的新闻人将目光投向海内外的学术界，将最新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简洁但又严谨地报道出来，为

普通公民提供更为专业、独到的优质信息。如果你渴望在时政话题上比市井杂谈、网络吐槽有着更为深入地表达和理解。

北大媒介观察

与其关注大 V, 不如关注 @政见 CNPolitics, 理性地思考政治。

微博网友 @Nate_invictus

“永远不要怀疑那一小部分有思想并且持续努力的公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事实上, 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这样。”——这种精英主义的话刊登在 @政见 CNPolitics 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微博网友 @龍助

政见合辑

二〇一四年春

编者的话

在不确定的时代构建确定性 1

治理

政协：帮助执政党掌握党外精英的思想 5

越公平越幸福 9

官员绩效如何评估？地方干部如何应对？ 13

调解类节目向观众灌输“调解优于诉讼”？ 17

提高女性工资将能缓解性别比例失衡 21

中共为何重视“学习”？ 25

违宪审查的一种可能：党内设置违宪审查委员会 28

三大挑战使治理中国愈发困难	33
司法机构：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带？	38
中印对比：私企如何促进居民权利	42
官员升迁，政策创新经验随之向上传递	46
自由与管制之间	49
多族杂居环境利于消减族群偏见	54
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仍将上升	58
中日俄印对比：中国已经领先邻国？	64
农民工为何认为“法律无用，上街有用”？	68
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越少向下级政府拨款	72

外交

中日韩青年如何看待历史伤痕与外交政策	78
中国加大对朝经贸联系有助于推进朝鲜无核化？	82
如何让周边“小伙伴”们不视中国为威胁？	87
靖国神社：参拜与民意	92
“双倍下注”还是引发“噩梦”	99
新大使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什么？	105

经济

中国移民怎样在非洲做零售批发生意	110
民营企业主：国家的盟友	114
民营企业：“不顾法律”的发展？	117
用数字证明制度缺失导致企业行贿盛行	120
存款保险制度：政府决心已定，细节值得推敲	124
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更喜欢贷款给国企？	129
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意图与顾虑	133
中国和巴西：在非洲角逐的策略异同	137
孔子学院：文化推手的经贸意义	143
市场还是政治？北京现代崛起的逻辑	147
中国银行建立史：政权更迭背后的利益纠葛	151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体系：中投与国家外管局之间的竞赛	157
中国经济究竟比印度领先多少？	161
跨国企业恶化腐败现象	167

社会

商业化和新技术让新闻变得更糟糕？	172
------------------	-----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既要自主创新,又不放弃国际合作	176
单身汉的苦恼：婚姻不平等值得关注	181
跨族交流越多,傲慢偏见越少	185
环境污染也不平等：谁首当其冲？	189
墙里墙外：不同研究者眼里的新浪微博 vs 推特	193

两岸三地

台湾“总统”大选对经济景气的影响	202
我们是谁？	206
选举改变了国民党么？	210
两岸经济一体化不会消解台湾的本土认同	214
米尔斯海默：美国将对台湾说再见？	219

专栏

课本里的世界观	224
说说《纸牌屋》里那些 Chief of Staff	232
告别打口时代：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年文化	237
学术研究的意义：为什么仅仅依赖常识是不够的	244

克里会见中国网民与“回旋镖”理论	250
理解族群冲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255

海外来鸿

阿富汗学者眼中的“中国梦”	260
---------------	-----

书评

龙与象：真的很不一样吗？	266
--------------	-----

加入我们

成为政见观察员	276
成为政见设计师	278
成为政见主页君	279
成为政见工程师	281

编者的话

在不确定的时代构建确定性

整理 2014 年春季的《政见合辑》的时候，正值北京大街小巷柳絮飞扬。时间如白驹过隙，春光转瞬即逝，一转眼又到了五月，2014 年已经过去一小半了。

这个充满喧嚣的春天，注定是令人难忘的。俄罗斯和美欧在乌克兰激烈博弈，危机迅速升级；朝鲜人事异动频繁，示强举动不断；台湾学生发起反服贸运动，两岸关系又遇寒流；大陆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复杂和困难因素进一步增多……而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昆明、乌鲁木齐发生暴恐袭击等突发事件，也不断冲击和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

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和生活其中的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个时代？3月和4月，我在分别接待英国和澳大利亚智库代表团时，都与对方聊到了这个问题。有趣的是，他们当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词：建设性。这里的建设性，不仅包括行动，更包括认识。记得澳大利亚智库代表团团长就说到，“在现在这个变化和动荡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不确定性。而建设性的认识和行动，无疑是在不确定的时代构建确定性最为有效的方式。”

在不确定的时代构建确定性，本身也是“政见”团队的初衷之一。您现在所看到的这本合辑，包含了2014年1—3月间“政见”团队发布的56篇文章，展现出的，就是“政见”团队成员们上述努力的一点小小成果。而这56篇文章中，既有传统的“研究速览”和“书评”，也有新产品“专栏”。这也是我们追求更好的传播效果，寻求多样化的初步尝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为您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构建确定性，发挥一些积极和促进的作用。

其实对我来说，编辑这本合辑，是颇要鼓起一些勇气的。因为相较于“政见”团队的其他同事，我没有长时间在海外求学、生活的经历。对于中国和她所在的世界，自然缺少另一个维度的观察和体会。不过，能担任这期合辑的轮值主编，有机会和您交流自己

一些感想和体会,的确也是很幸运的事。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政见”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希望能能在网站 CNPolitics.org、微博 [@政见CNPolitics](https://weibo.com/politics)、微信公众号“政见”和知乎政见专栏上看到您的批评和建议,这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最大动力。

归宿

2014年5月3日,北京

治理

政协：帮助执政党掌握党外精英的思想

◎ 刘岩川

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连接执政党与党外社会精英的桥梁。香港大学学者阎小骏在研究河北某县政协后提出：政协机制的作用超乎外界的预期——它不仅为中共提供了团结党外人士的平台，而且为执政党采集社情民意提供了支持。

政协机制在国共内战时期诞生，并在建国期间成为中共凝聚社会共识的平台。文化大革命中，政协与很多党政机构一道被打入冷宫，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启锚。1983年，中共中央的文件称，政协的职能是帮助共产党与党外精英、社会领袖团结合作。

在阎小骏走访的县，当地政协重启时的主要任务是抚平文革

造成的创伤和提高社会包容度。当年，成为政协委员的非共产党员有九类：党外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少数民族、爱国宗教人士、移居台湾的国民党人的亲朋、归国华侨、投诚的国民党军官、民主党派成员或有影响力的无党派人士，以及台湾人。同时，政协委员候选人还必须有过硬的政治和道德情操，有知识和影响力，经常接触共产党，爱党、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且提倡祖国统一。其中，对共产党和现行体制的认同尤其重要。

政协委员的筛选由四步组成：乡镇党委和下辖的单位提名，县委统战部核实候选人背景，县委常委裁决，政协通过最终名单并对外公布。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比例被控制在4比6。

政治学习和联络工作是地方政协的重要任务。在阎小骏调查的县政协，党委和政府通过组织政治学习向政协委员传达最新精神和政策。此外，党政官员不时探望政协委员，给予相应照顾。例如，在政协重启初期，当地干部曾帮助文革中丢掉饭碗的国民党亲属回到岗位。近年来，政府和党委通过分享相关政策讯息、降低市场门槛和提供国有银行贷款，大力帮助政协委员创业。统计表明，1984年到2008年间，当地政协委员建立了238座工厂。

为了支持对港澳台统战工作，该县政协优先帮助港澳台居民

在大陆的亲属致富。成功的企业家、意见领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也享受相似的待遇。由此，一位受访的政协委员称：“政协给政协委员办实事，坚定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除了政治学习与联络工作，政协委员还肩负着视察的责任。从教学楼质量到清真食品的制作流程，供政协委员视察的目标包罗万象。此外，政协委员还可受邀担任公共医院、税务局和电视台等单位的特约监督员，甚至对当地党政干部的表现做出评价。而政协发现的问题，往往会引起党政部门的积极回应。阎小骏认为，政协委员的视察职能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进而提高了他们和对现行体制的认同感。

在视察之外，政协还通过提案工作和民意采集，帮助执政党搜集社会对执政表现的反馈。在阎小骏寻访的县，政协的提案必须得到党政部门的书面回应甚至当面咨询。当然，政协也不能无止境地提供意见，涉足国家机密和党内人事决定的问题就不在讨论范围内。该县政协还负责多方面的信息采集工作，如地方精英对政策的態度，潜在不稳定因素，群众心态的变化，可能造成群情激愤的贪腐案件，以及宗教活动。

阎小骏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政协机制通过政策宣传和利益倾

斜,使非共产党员在认同现行制度的同时,在规定范围内对党政事务提出建议,并且帮助执政党掌握社会舆论和党外精英的思想。相较于通过选举和媒体表达民意的西方,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无疑更可控、更稳定。

参考文献

- Yan, X. (2011). Regime Inclusion and the Resilience of Authoritarianism: The Local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in Post-Mao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66, 53-75.

越公平越幸福

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如何影响幸福感

◎ 缪莹

“你幸福吗？”在 2012 年央视幸福感调查中，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表示自己的生活幸福。那么，一个人的幸福感究竟被什么影响呢？在学界看来，除了个人因素，人们对社会公平的主观认识也是幸福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同年的一项调查中，清华大学的孙凤教授以及罗德岛大学的肖经建教授通过研究对比两千多位北京居民的答案得出结论：公平感对幸福感十分重要，无论是收入公平，还是社会福利公平。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收入差距的绝对大小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这种差距可以激励生产和带动发展，那么就是合理（reasonable）

的。但在孙教授和肖教授的论文里，同样的理论并不能被如此简单地应用到人们的幸福指数上。他们发现，在中国，有时就算收入差距的变化在经济学角度上是合理的，很多人依旧觉得幸福指数降低了。相反，有些时候收入差距在经济学角度上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它对幸福感的影响却是很小的——在2004年，中国的基尼指数达到了0.48，但幸福感却在了一项调查中高居世界第二。

论文指出，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感受远比收入差距的实际变化要来得重要：公平感越高，幸福感也就越高。这种差距在工作上比在生活上要更有影响，也就是说，对收入差距的不满带来的对工作上的不满比在生活上的不满要更为明显。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下中国的政策是在资源初次分配方面注重效率，而在再次分配方面注重公平。企业可能为了增加生产率而压榨工人，从而导致人们在工作上的不满，影响到社会和谐。确实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今中国，工作岗位本身是最直接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而非收入本身或房产（因为前者直接影响后者）。

比起收入差距，人们更关心社会福利政策：越是觉得福利不公平，幸福感就越低。对此，孙教授和肖教授的解释是，收入分配是一个社会资源再分配系统的构成，形成了有人欢喜有人愁的状态，

得益者的幸福指数大幅上升是可以理解的。而社会福利系统则关系到基本生存底线,倘若这个底线不能满足人们的生存要求,那么幸福感大幅下降也是合理的。

与收入差距不同的是,社会福利对人们在生活上(而非工作上)的幸福感影响更大。这一点和中国的医疗和教育系统是密不可分的:在05年央行的一项调查中,医疗和子女教育是人民存钱的最重要动因,而为了存钱,人们不得不牺牲消费,因而影响到生活满意度。在这两项原因中,医疗比教育的驱动性更大,这和央行的调查是相符的。

另外,研究还发现,人们的工作满意度是跟随年龄下降的,但生活满意度却不是。青年和老年人都对生活相对满意,而中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最低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刚好经历了新中国最多最动荡的改革,也和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状态密不可分。此外,教育程度对工作满意度有正面影响,却对生活满意度没有很大影响。

在这项研究的结尾,两位教授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医疗和教育问题,并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国家应该关注在生产线上初次分配的公平状况,保护职工的权利和提高

人们的工作满意度。只有在长期发展中保证了人们的公平感,才能让公民们的幸福感继续上升。

参考文献

- Sun, F., & Xiao, J. J. (2012). Perceived social policy fairn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7(1), 171–186.

官员绩效如何评估？ 地方干部如何应对？

◎ 杨鸣宇

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主体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系统。然而，为了照顾地区差异，中央需要容许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如何在给予自由的同时确保地方干部不会偏离中央要求的大方向？一套绩效评估体系至关重要。这套体系如何运转，地方干部如何应对，这是理解和分析政策在地方执行时的重要维度。

最近，德国学者 Thomas Heberer 和 René Trappel 在学术期刊《当代中国》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两位研究者开篇即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虽然在理念和技术上借鉴了“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但两者有着重要区别。“新公共管理”希望通过把政府产出量化的方式，减低上级监察下级表现所付出的成本。而中国的绩效评估体系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有了一些额外功能，比如籍此对地方干部的“品行”进行改造，使其更合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好干部”。绩效评估同时亦是上下级进行讯息交流的重要渠道。最后，这套评价体系亦为希望晋升的干部提供了激励机制——这些附带功能恰恰是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估的关键。

具体而言，绩效评估可以分为三类：

- ※ **目标考核：**这是和“新公共管理”最为接近的方式。政策指标细分为大量不同的子项目，通过下级政府和上级签订责任协议的方式进行确定和分配。
- ※ **领导干部考评：**除了绩效考评外，具体的地方领导个人还需要接受上一级党委组织部的考评。考核内容包括领导的个人能力、道德、生活作风等方面。
- ※ **一票否决：**在头两项考评中取得“优秀”的评分只是获取晋升的必要条件，因为还有权重更大的“一票否决”项目。如果在一些特定项目，比如说计划生育、社会稳定、地方经济发展方面不达标，那么即便地方干部完成了其他指标，也几乎不会有

晋升的可能。因此，“一票否决”的项目也被称为“硬指标”，其他没有这样相对权重的被称为“软指标”。

对于追求晋升的地方干部而言，最重要的是完成“硬指标”，而不是全部指标——因为在资源的约束和条块关系的约束下，这经常是不可能的任务。事实上，上级政府亦明白其中的情况，因此只要完成了“硬指标”，地方干部在其他项目上不达标也极少会受到惩罚（除非被媒体曝光）。

然而，在“硬指标”上达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地方干部衍生出了对绩效评估的三种不同回应：

- ※ **政策创新**：这是最为积极的一种回应。被验证为有效的新方法往往会以“模式”、“典型”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成功探索新“模式”的地方干部自然晋升机会也更多。
- ※ **实干**：即中规中矩地执行上级要求。政策创新虽然吸引力大，但是也面临着失败的可能，因此老实实在地执行政策是更为保险的策略。只要达标，没有政策创新也同样能够获得正面的评价。
- ※ **规避**：如果达标已经不可能，地方干部还可以通过串通上级政府的方式来规避更上级的考评。

两位研究者在结论部份认为,这套绩效评估体系以及地方干部的应对方式至少产生了几十个值得注意的后果:

- ※ 首先是一套不同地方层级之间的双向交流机制。对于上级政府而言,绩效评估是他们控制下级行为的利器;而对于希望晋升的地方干部而言,这是一套强大的激励机制。
- ※ 第二,为了应对绩效评估,双向交流同时也加速了不同层级的地方干部之间的结盟。其中的一个衍生品是官员的腐败和派系势力的滋长。当失去上级的保护伞后,下级的干部也很难独善其身。
- ※ 最后,由于中央政策指示通常都比较笼统,因此如何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意图是一道“开放题”,绩效评估由此可能引起希望晋升的地方干部进行政策创新,而不纯粹是中规中矩地执行政策。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Heberer, T., & Trappel, R. (2013). Evaluation Processes, Local Cadres' Behaviour and Local Development Proc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84), 1048–1066.

调解类节目向观众灌输“调解优于诉讼”？

◎ 张跃然

近年来，纠纷调解类电视节目在各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最新一期的《法律与社会评论》上，两位学者发表研究指出，这一现象与政府在提出“和谐社会”执政范式后，鼓励使用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手段、强调“大调解”这一社会治理方式的大背景密不可分。这类节目暗含了鼓励大众多使用调解机制的引导信息。

自2008年《新老娘舅》在上海东方卫视开播并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模式相似的各种纠纷调解类电视节目陆续登上了各大地方卫视屏幕。这一类节目往往聚焦家庭矛盾、邻里关系、财产纠纷等民事冲突，由当事人现场讲述，通过嘉宾与当事人（以及场内、场

外观众)的互动来寻求冲突化解之道。

要探讨纠纷调解类节目受到各地电视台青睐的原因,要从这类电视台“双重身份”的特殊性说起。一方面,地方电视台为政府所有,承担“政府喉舌”的职能;另一方面,地方电视台的运作模式大都已商业化,需要在市场中逐利以生存。因此,电视台在开发电视节目时,带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强调节目的政治正确,承担政府所需要的社会功能;一方面要受观众喜爱,有收视率。而纠纷调解类节目,一方面能满足观众的窥私和猎奇欲望,市场前景看好;一方面又受到政府大力支持,两全其美。

这一类节目为何能受到政府大力支持?根本原因是政府近年“鼓励调解”的明确态度和其背后体现出的执政理念的转变。面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一系列猛烈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中共在十六大期间明确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新执政范式,希图通过一系列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相对于诉讼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调解在消除表面对立、“软化”当事人态度、制造“大团圆”结局的能力上优势明显,最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近些年来,政府对调解手段的鼓励态度愈发明显。2008年最高法院出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工作原则、2010年《人民调解法》出台都是重要例证。因

此,地方政府无疑乐于见到电视台将调解现场直接呈现到观众面前、增进大众对调解机制的了解、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于是一路对纠纷调解类节目大开绿灯,并提供各种资源支持。

在这类节目呈现的具体调解过程中,调解机制所独有的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得到充分体现。其具体表现是,“法定权利”的重要性被大大弱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往往被污名化,而道德、情感、正义被赋予了最高的力量。

通过对某几期节目的具体案例分析,研究者指出,当事人和调解人在寻找可接受的纠纷解决方案时,并非依据基于法律的“冰冷思维”,而主要依赖道德的对错和情感的可接受性。对于拒不配合的当事人,调解人和观众主要采用道德讨伐的方式对其施加压力。在纠纷解决后,主持人和调解人通常从道德层面对案例加以总结升华。

这类节目体现的“调解”和“正规法律途径”的关系,也是值得玩味的。这一类节目的嘉宾中通常会包括律师或法律专家,主要负责从法律角度对纠纷进行分析。但这些分析的功能通常并非是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依据,而是为了证明调解途径的优越性,说服当事人放弃打官司的念头。这些法律分析往往暗示了诉讼对维系社会

关系和伦理道德的破坏作用,并突出法律手段的高成本、低收益。在这种话语体系中,“调解优于诉讼”的价值判断在无形中被灌输给了观众。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研究的方法是将电视节目当做“文本”,如分析文学作品一样来探寻其内在含义,其解读可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此外,研究者试图通过电视调解的案例来概括调解机制的整体特征,也存在很大的风险。但这无法掩盖研究者在问题意识上的敏锐,以及其研究结论对我们认识媒体、文化和政府执政理念之间关系的重要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Hawes, C. S., & Kong, S. (2013). Primetime Dispute Resolution: Reality TV Mediation Shows in China's "Harmonious Society". *Law & Society Review*, 47(4), 739-770.

提高女性工资将能缓解性别比例失衡

◎ 王绍达

人口性别比例失衡是许多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欧人口中女性占 50.1%，而在中国与印度这一比例仅为 48.4%。阿玛蒂亚·森将这一现象称为“消失的女性”。据估计，“消失的女性”这一现象在中国与印度最为严重，其规模大约介于三千万到七千万之间。

根据中国的出生人口记录，在 1970 年至 2000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全国新生儿中男性的比例由 51% 上升至 57%。这样显著的、违背自然规律的变化表明，许多中国家庭很可能存在有性别选择的堕胎，甚至杀婴行为。那么，究竟是什么激励导致了这样的行为模式呢？经济学家 Nancy Qian 试图利用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检验

“消失的女性”这一人口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

如何恰当地分析经济因素与性别选择的关系？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简单地检验“女性工资收入”与“女婴出生率”之间的关系，无法得出真实的因果推断，主要原因在于遗漏了很多其它因素。比如，即便我们观察到女性工资收入高的地区女婴出生率同样也很高，我们也不能断言就是前者导致了后者，因为还有可能是那些地方的宗教或文化赋予女性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样更高的地位同时导致了女性收入与出生率的提升。

因此，想要建立起“女性工资收入”与“女婴出生率”之间的因果联系，就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自然实验”，使得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变化是由可观测到的外生事件所影响，而非如上述情景一样由不可观测到的遗漏变量所影响。

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独具匠心地利用“后毛泽东时代的茶叶价格”来估计女性工资收入如何影响女婴出生率。其具体思路是：后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大大提升，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茶叶与水果。而由于身高、身体素质和技术传承等诸多原因，女性适合收割茶叶，男性适合收割水果。这样，伴随着经济作物价格的提升，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女性的经济地位得

以提升；而适宜种植水果的地区，男性的经济地位得以提升。上述两性相对收入的变化，完全是受到外生的国家政策所影响，并非受文化、宗教等不可观测的因素所影响，也并非男性与女性自己选择的结果。

基于这一巧妙的自然实验设计，作者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进行了严格的因果推断。

结果表明，在经济改革后，一个家庭每多种一亩茶叶（也即女性收入上升），新生儿为男性的比例降低 1.2 个百分点；而每多种一亩水果（也即男性收入上升），新生儿为男性的比例提升 0.5 个百分点。类似地，作者还发现，在这段时期内，家庭种植茶叶（即女性收入上升）对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有正面影响，而家庭种植水果则有负面影响。

结合茶农数据并给定一些简单的数学假设，作者得出估算：如果女性工资增长导致家庭总收入增加 10%，则女性人口的比例会相应地上升 1.3%。这意味着，如果女性的工资增长导致家庭总收入增加 20%，中国的人口比例大致可与西欧达到相同的水准。这样的结果对应着非常鲜明的政策建议：增加成年女性的工资收入可以有效地缓解“消失的女性”这一现象。

综合来看,这则研究采取巧妙的方法设计,运用细致的微观数据,得出了稳健而令人信服的实证结果,并给出了易于执行的政策建议。相信更多类似这样文章的出现,将有助于把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论战提升到更为科学和有价值的层面上来进行。

参考文献

- Qian, N. (2008). Missing women and the price of tea in China: The effect of sex-specific earnings on sex imbalan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3(3), 1251–1285.

中共为何重视“学习”？

◎ 刘岩川

中国共产党提出“学习型政党”口号后，外界普遍认为其在吸收西方管理学中的“学习型组织”理论，即让员工不断投入学习中，使各岗位都能实现更高的效率与价值。然而，台湾学者蔡文轩和 Nicola Dean 经过研究发现，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学习”一说带有深刻的本土烙印：它上承毛泽东对思想统一的追求，下接当代执政党亟需适应新环境的现实。

“学习”是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常客。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曾大举学习苏联模式，而 1990 年代又开始研习西方的“新公共管理”思想。在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不厌其烦地研究苏联崩溃的原因，以求避免重蹈老大哥的覆辙。

不过，中国政坛中的“学习”不单纯意味着掌握新技能、新知

识，而是屡屡扮演思想的大熔炉。两位研究者注意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让自己的理念深入全党人心，宣称党应变成一所“无期大学”，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学习机制。整风期间，延安更是出现了地位在政治局以上、毛泽东以下的“总学习委员会”。一旦党内出现分歧，延安就会发动以阅读和讨论为主的学习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对阅读内容的评语和解读由专人记录并在党内印刷发行。

文革期间，“学习”与对肉体和灵魂的折磨混杂到一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五七干校”中曾有成千上万人以军事化劳动的形式接受“再教育”。

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学习”的内容大有改观。为了协调高层对改革的引导，政治局层面的“学习”越来越多地涉足经济和法制。对于省部级官员，党校为他们提供话题逐渐丰富的短期学习体验。人大常委会和政协也先后设立了自身的学习讲座机制。

200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实现了空前的制度化。据二位研究者统计，2002年至2011年间，中南海怀仁堂每隔数月都会举办讲座。先由中央办公厅配合中央政策研究室拟定话题的范围，而后具体议题由总书记拍板。议题一旦确定，与其对口的部门便开始联系主讲人和组织排练。论坛形成的文件由中央书记处下

发到各级党委,由党委一把手领导各地方的学习。

需要注意的是,主讲人对讲座的内容并无十足的掌握,而是要接受高层对内容、乃至语速和语调的全权调试。例如,一场法治专题讲座被赋予传播“和谐社会”观念的任务。讲者因此提出:不鼓励群众为小纠纷动用法律武器,因为这种做法既有悖于中国文化的和谐传统,又容易滋生西方式的权利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最终由中央书记处下发到各级党委的学习文件,也就不再是主讲人自身的观点,而是最高层自身的政治意图。两位研究者由此认为,党内“学习”是毛泽东时期追求思想统一的延续。

当然,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改革开放前相去甚远。通过学习提升执政能力,也是执政党适应新环境、巩固自身稳定性和合法性的本能反应。除此之外,在已经走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威。在统一思想越发不易的背景下,“学习”顺理成章地再次扮演“熔炉”的角色。

参考文献

- Tsai, W. H., & Dean, N. (2013). The CCP's Learning System: Thought Unification and Regime Adaptation. *China Journal*, 69, 87-107.

违宪审查的一种可能： 党内设置违宪审查委员会

◎ 武卓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和法规都不能与宪法相冲突。”这是我们初中复习思想政治考试就熟记的一句话。但放眼全球，这一句美丽的口号还没能在哪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究其原因，往往并非立法者不愿遵守宪法，而是因为宪法的条文往往大而空，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涵在不断改变，而随着立法数量的增加，立法者事先也无法面面俱到考虑现实世界的所有可能。所以一部法律出台后，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权利，也会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与宪法精神相冲突。

法律界有一句名言：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试想，法律规定

了你口袋里的钱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却又同时告诉你，万一你被歹徒抢劫了，你不可以去追歹徒，也不能跟歹徒把钱要回来，甚至不能报警——总之，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你追回损失。在这种没有救济方式的窘况面前，法律所规定的神圣不可侵犯还有什么意义吗？

人人都能理解这种境地的尴尬之处，而这正是中国宪法目前所处的境地——当某部法律与宪法相冲突或者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时，公民无法在任何一个法院提出弥补损失的请求。

违宪审查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而存在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着某种方式的违宪审查机制，比如在美国，违宪审查又叫做司法审查，这一权力被最高法院牢牢控制着；而在欧洲一些国家，有专门的宪法法院来处理这些问题。不管形式如何，他们的共同点是：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审理，来解决法律实施过程中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或是与宪法规定相冲突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来，违宪审查是中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目前的规定，中国的宪法解释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这也仅仅局限于“解释”宪法，而不是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中国如何设立违宪审查机制一直是法律界关注的重点。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白柯 (Larry Backer) 教授在其 2010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独到观点。

中国学界对于违宪审查机制的讨论有不同观点：有人建议，违宪审查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与目前宪法解释权的机制能互相配合；也有人建议，权力归于最高人民法院，因为具体案件的审理是司法机关的职责；此外，还有人建议效仿欧洲一些国家，成立专门的宪法法院，作为释宪和审理宪法案件的专门机关。

白柯教授认为，上述三种建议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关，如果违宪审查权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话，难免会出现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局面；其次，与美国三权分立的机制不同，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并不适合承担解释根本大法的任务。

如此一来，比较合适的路径也许是成立专门的解释宪法的机关，但是这个机关具体要处于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哪个坐标呢？白柯认为，共产党自身是承担这一功能最合适的载体。他解释道，在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是共产党向执政型政党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不断制度化的必然结果。

从政治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党政分开，

使得国家的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逐步分离。政府、法院等国家机关仅仅承担着行政的功能，可同时中国的宪法不仅仅是国家基本行政制度和公民权利的载体，更是规定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载体。在行政权力服从于政治的环境下，让行政机关承担解释宪法的功能会导致政治结构的错位，也会使法律体系包含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作者进一步阐释说，随着党政分开的不断深入，目前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要承担的功能并不仅仅是通过个案来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权力和政府的行政权力间扮演协调的角色。同时，共产党自身在向执政型政党的转变中，需要在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前提下，不断增强自身制定政策和领导的合法性。违宪审查可以说是法治社会的最高政治权力，将其归于共产党自身，不仅名正言顺，而且可以最大程度上符合目前中国的法律和政治的现实。

另一方面，作者观察到，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迟迟无法有实质性突破，根源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层面，官方和学者对于违宪审查的理解过于单一，往往下意识地与三权分立等西方政治制度挂钩，认为违宪审查意味着彻底改变目前的政治制度；第二，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的绝对力量，如何

能够在违宪审查机制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在常规的思路中往往无法有完善的答案。而如果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设立违宪审查委员会,则可以避免这样的猜疑和不信任。

白柯教授的观点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努力在不突破既有宪法框架的前提下,寻找宪法落地生根的可能。他的观点在过去几年不断受到国内宪法学者的重视,赞美和批评之声皆有。政见团队将于近期采访白柯教授,如果各位读者对于他的研究有任何问题,欢迎在留言中提出,我们将选择一些问题采访时一并提出。

参考文献

- Backer, L. C. (2010). A constitutional court for China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role of the CCP. *Suffolk University Law Review*, 43(3), 593.

三大挑战使治理中国愈发困难

◎ 归宿

最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大卫·兰普敦(David M. Lampto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名为《如何治理中国》的文章。他指出:政治领导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民间力量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治理中国的难度越来越大。而治理体系的改革,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这篇文章也是作者今年2月出版的新书《跟随领导者:中国四代领导人如何治理中国》(*Following the Leader: Ruling China*)中的一部分。

挑战之一: 强人政治的终结及回归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政治领导体制逐渐完

善,实现了从“一个人说了算”向法规化、制度化的转换。毛时代那样仅通过个人魅力就可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四代领导人中,只有邓小平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和“魅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的结合。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力排众议,果断拍板,制定的许多政策至今仍产生深远影响。邓之后的中国领导层更多转向集体领导的方式。这种决策方式虽然更加民主,可以更多吸纳不同方面的意见建议,但也使得做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决策更为困难。

作者认为,毛邓之后的中国的领导人,更多是在既定的政治体制框架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激发制度内在潜力,而非推动大规模的制度社会变革。但在过去的一年中,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采取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强化领导权威。这说明中国新的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在集体领导体制下的中国,不可避免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治理问题。而重新树立中央权威,被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挑战之二：脆弱多元的社会结构

利益团体的多元化、复合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在毛和邓时代，中国的领导层只需要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但是今天的中国领导层，更多是在统筹、协调各类利益集体的诉求，以避免各类利益集体“迎头相撞”。利益集团的多元化使得社会结构更为脆弱，也导致中国领导层制定和推行政策更为困难。

中国的政治体系为了应对社会利益团体的多元化，自身也变得更为多元。中国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了一系列“领导小组”协调、处理各个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这也牵扯了几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的大部分精力。同时，各省、大城市、主要行业协会和企业也想方设法加大游说力度，期望中央政府能推出对其有利的政策措施。上述这些情况，在省市县等中国的各个政治层面，都有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现。

挑战之三：民意的觉醒

当前几乎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民意。他们已经认识到，民意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民意调查行业在中国也成为一门大生意，民调数据在一些地方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2000年以来，民意在汇率、税收、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民意的影响力也在上升。受此影响，中国的各级官员也逐渐认识到，政府必须要对民众负责。

中国民意的觉醒，主要源自中央政府逐渐从社会生活中退出，对于资本、人力和信息的垄断被打破。尽管目前中国还存在着很多垄断行业，为腐败分子大肆寻租、牟取暴利提供了空间。但对于普通中国民众来说，随着经济资本资源逐步开放，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获取信息途径日益拓宽，他们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加速推进的城镇化无疑也推动了这一进程。在城市中，人员、信息流动加快，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这些都使中国各级领导层面临的治理局面更为复杂。

至关重要的治理转型

文章指出，中国现在又到了深化改革的紧要关头。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军力也相当强盛，但其治理体系的脆弱性和不适应性愈发成为明显的短板。文章认为，中国的治理体系需要

转型,建立法治、更具代表性、更能凝聚共识的治理体制,可能是最佳的转型方向。文章还特别指出: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一定要立刻推行西方式的民主,但是加强本地政治参与、增加政治透明度、司法和监察机构拥有更多独立性等西方治理体系中已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被更多地吸纳到中国的治理体系转型中。

作者认为,从中国历史上看,后一代领导人往往能认识到前一代领导人的局限性,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并会努力将改革付诸实施。但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已不容许中国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有任何犹豫、迟疑和后退。改革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要么往前走,要么摔倒。中国领导集体只能向前进。文章最后指出,如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能成功实现领导体制的转型,深化经济和社会改革,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那么中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一个半世纪以来奋斗的目标。

参考文献

- Lampton, D. M. (2014). How China Is Ruled — Why It's Getting Harder for Beijing to Govern. *Foreign Affairs*.

司法机构：介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缓冲带？

◎ 刘冉

在 Web 2.0 时代，互联网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成为不可忽视的话题。网络舆论是否具有扭转司法判决的力量？这种力量究竟是福还是祸？

近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新媒体、互联网与变化的中国”会议上，来自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张善喻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研究。他通过研究执政党、司法部门、互联网与网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微博等互联网工具的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舆论生态，而微博平台上对法律事件的讨论与传播对司法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当网民渴望通过微博来寻求法律正义，

民间声音终于有途径传入法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审判结果；然而，在本身缺乏司法独立性的体制中，当案件在传播过程中被戏剧化和情感化，司法部门不得不面临来自民间与政府的双重压力，正义与司法之间产生了新的张力。

作者从2008年到2012年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舆情监测年度报告中选取了12个司法事件，其选取标准是：网络舆论成功将社会冲突转化为司法案件，或影响到司法判决结果，或使得法院在舆论压力下进行了重审；网络舆论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甚至得到了法院和相关部门的公开承认。这12个案件分别是：药家鑫案、“我爸是李刚”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上海钓鱼执法案、杭州飙车案、小学女生卖淫案、王帅发帖被拘案、习水嫖宿幼女案、罗彩霞案、华南虎案以及许霆取款案。

通过分析这些案件中网络、司法与执政党的互动，作者指出，“舆论监督”在中国语境下具有多层含义：执政党将其视为了解公众动向、保证社会稳定和党的领导的途径，公民则视其为表达民间观点、纠正社会不公、监督当权者的方式。理论上说，党是公众和媒体监督的对象，但在党的视野中，公众和媒体又在其领导之下。传统媒体并未为民间保留足够的发声渠道，而在网络空间中，这两种

理解方式终于得以交锋,并在这些司法案件中体现出各自的妥协。

例如,邓玉娇案最终判决邓因精神问题“有罪但免责”,被视为对舆论的回应与安抚,并在人民网的年度报告中被列为有利于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正面案例;杭州“七十码”飙车案中,犯罪嫌疑人胡斌最终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虽然仍未能达到愤怒的网民们所要求的重刑,但至少避免了案件真相被湮没;河南青年王帅因发帖举报官员导致被囚八日,在网络舆论的发酵下,最终获得780元政府赔偿,被视为网民的“小小胜利”;而“激情杀人案”中药家鑫的重判,也被认为受到了舆情的影响,且最初对药家背景的传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舆论风向。

作者认为,上述案件均带有“妥协”的痕迹,一方面并未直接挑战政府权威,另一方面也对网民的情绪做出了回应;若没有网络媒体的介入,在现行司法制度下,其结果很有可能有所不同。

作者指出,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向司法机构“鸣冤”来追求社会正义的传统,司法往往成为人民揭竿而起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网民面对社会不公勇于发声,并试图通过舆论影响司法判决。这虽然是对司法的干涉,却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与司法秩序。

因此,中国司法机构不仅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与司法争议的功能,还扮演了缓和政府与民间冲突、安抚社会异议的角色。通过回应公众舆论,司法给予人们希望;反过来,在并不独立的司法体系之下,网络舆论也为司法机构做出不利于政府的判决提供了理据和正当性。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Cheung, A. S. Y. (2014). The Battle of Microblogging for Legal Justice in China. *Conference of New Media, The Internet, and a Changing China.*

中印对比：私企如何促进居民权利

◎ 武卓韵

富士康在中国遭遇“N 连跳”事件，跨国资源巨头韦丹塔（Vedanta Resources）在印度某矿山开发时陷入纠纷。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宾州州立大学白柯（Larry Baker）教授指出：全球化和私有化的浪潮为促进人们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私有企业在不同国家扮演的角色和促进当地居民权利的方式上也有显著的区别。

在印度，韦丹塔公司在某地开发矿山过程中，与当地的部落居民产生冲突。居民们认为，即将被开发的矿山属于圣山，与部落的精神传统息息相关。此外，他们也担心开发会污染当地的自

然环境。

白柯认为，印度解决此类纠纷的模式有如下特点：

第一，国家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起核心作用，而这种核心作用最直接的体现是纠纷最终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在这起纠纷中，法院的判决直接决定该公司是否可以获得采矿许可。

第二，各类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印度国内的法律，但是他们的非强制性决议、声明等都影响了印度政府的态度和法院的最终判决——例如，挪威政府、英国政府和大赦国际都曾针对此事发布过声明和决议，认为韦丹塔侵犯了当地居民的人权。

第三，在这种模式下，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是建立在其政治权利基础之上的，例如获得公正审判、司法救济以及申诉等权利，这与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路径类似。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者以富士康为例，着重分析了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的处理模式。白柯认为，与印度的案例相反，富士康事件有如下特征：首先，政府——尤其是法院并未直接参与到事件的处理过程当中。在连续的跳楼事件中，没有任何一起进入到司法程序；其次，外国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对事件的影响力十分有限；第三，市场在推动富士康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进一步解释说，在连环跳楼事件发生之初，富士康试图仅以自己履行了中国的法律义务为理由，否认需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富士康在媒体中被形容为“血汗工厂”。这不仅影响到了富士康自身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供应链中，这种公众印象直接影响到了它最重要的客户——苹果公司。作者认为，苹果出于履行自身企业社会责任和对自身公众形象的考虑，在事件后续的处理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迫使富士康采取进一步措施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度发生——其中包括给工人们加薪 20%。

由于私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仅要面对来自所在地法律的约束，而且在全球化浪潮下也需要履行更多的来自外部的义务，因此，它们在改善当地居民权利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中国和印度的案例中都有体现。同时，韦丹塔和富士康的比较揭示了在全球化浪潮中，私有企业在不同的国家所扮演角色并不相同，改善居民经济社会权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是他在文中并未进一步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中印两国在改善公民经济社会权利

的过程中有上述差异,也并未说明两种模式是否存在优劣之别。

政见团队将于近期采访白柯教授,欢迎各位针对白柯教授的观点提出问题,我们期待这些问题在采访中能够得到进一步解答。

参考文献

- Backer, L. C., (2013). Privatization, the Role of Enterpris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A Comparison of Rights-Based and Administrative Approaches in India and China. *Georg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45(4). Retrieved from <http://ssrn.com/abstract=2195251>

官员升迁, 政策创新经验随之向上传递

◎ 杨鸣宇

经济绩效与官员升迁之关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研究里的一个热点话题。最近的研究发现, 成功的政策创新也可以作为官员升迁的政治资本。但地方的经验是如何上传至更高甚至是中央层面的呢? 其中的具体机制, 外界仍然所知不多。

以研究中国政策过程而为人熟知的学者韩博天 (Sebastian Heilmann) 和他的合作者在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上撰文, 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 地方政策创新和官员升迁是一个相辅相承的过程。简单而言, 政策经验是随着官员的不断升迁而逐步上传, 并可能最终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推广。

这种过程被韩博天等命名为“垂直层级结构下的试验”。地方官员在进行政策试验和创新前首先需要取得上级政府的支持,这往往通过非正式的游说来完成。在取得上级的青睐后,地方将得到一定的政策优惠和自由裁量权来进行政策试验。如果成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经验进行“包装”(比如说冠以“XX模式”之名)并通过媒体推广来获取更大范围内的关注。之后,这些经验才有可能随着官员的升迁而进入中央层面,并最终成为国家政策或法规。

文中举了无锡的530计划作为例子。530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吸引优秀的海外人才回国创业。2006年,该计划在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的一次参观考察中得到支持,并在2007年被宣布为“模式”在江苏省推广。随着李源潮晋升至中央,这一模式也获得了进一步上传的机会。在参考“无锡模式”的成功经验后,中央推出了更大型的“千人计划”人才吸引政策。

其后,通过召开全国性会议的方式来整合和传播不同地方在相关政策上的创新经验,可以进一步完成地方创新经验“垂直上传”再回到地方“水平扩散”的过程。

韩博天等认为,虽然在2006—2010年间有不少地方开展了类

似的计划,但最终只有 530 计划的经验上升到国家层面,这其中
一个最为直观的解释变量就是政策创新和官员的升迁之间的互补
关系。当然,只凭一个政策案例可能不足以完全解释结果上的差
异。但是韩博天等的研究无疑对理解中国的政策创新过程或者是
官员的升迁决定因素都提出了新的变量和解释方向,值得往后的
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 Heilmann, S., Shih, L., & Hofem, A. (2013). National Planning and Local Technology Zones: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s Torch Programme. *China Quarterly*, 216, 896-919.

自由与管制之间

中、美、新三国互联网管理模式对比

◎ 武卓韵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其组织架构浮出水面:习近平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这是继中央深改小组和国安委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成立的第三个由最高领导人牵头的超级机构。它也意味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被提高到空前重要的战略地位。

信息的自由传播是互联网的核心精神,但很少有人同意网络可以脱离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从茉莉花革命到斯诺登事件,互联网管理中发生的种种碰撞一直引人关注。如何在控制非法信息传播的同时,保持互联网作为信息自由流动载体的优势,是各国政府

共同面对的难题。

目前,大部分国家都有专门或者间接针对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立法,但是不同的国家采取的管理模式和路径迥然不同。来自哈佛大学的法律硕士 Jeffery (Chien-Fei) Li 在他的论文《互联网管理还是互联网审查:中国、新加坡和美国互联网管理比较》中,对上述三个国家的互联网管理模式进行了详细对比,从国际法的角度总结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

作者认为,由于互联网与现实世界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针对互联网的法律与针对现实社会的法律也有诸多不同。例如,在社会规范方面,互联网的匿名性使得用户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可能与现实社会中并不一致;从市场角度观察,互联网市场的范围和交易模式和传统交易也不一样;在实体构造方面,由于科技的迅速进步和软硬件的更新换代,也使得针对互联网的管理模式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各国不同的历史和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管理模式,例如,知识产权的概念在美国社会长期受到重视,所以它在美国互联网管理当中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而在中国,相关社会观念并未成熟,所以相关的立法和管理也相对滞后。

作者将中国、新加坡和美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分别归纳为审查许可模式、分类许可模式和政府民间合作管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法律基础是 2000 年 9 月国务院通过并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在实际操作中,中国的审查许可模式具体分为三个方面:第一,许可证制度要求互联网提供商在取得政府许可之后才能进行互联网信息服务,否则将会面对网站关闭和罚款等惩罚。第二,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服务必须合法,否则将会丧失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的资格,这就使得它们必须加强自身内容的审查。第三,通过国家防火墙的建设,大范围屏蔽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互联网信息和其他涉嫌违法的信息。

作者认为,中国的互联网管理模式之所以招致国际社会的不少批评,主要是因为其原则并不明确。例如《办法》第十五条列举了九项非法的互联网内容,但是当中的许多内容——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散布谣言”等——缺乏更加明晰的定义,有可能与《公约》当中的必要性原则相抵触。

新加坡互联网管理模式相对简单。与中国针对内容的过滤和审查不同,新加坡以《广播分类许可法案》为法律基础,规定互联网内容提供者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需要取得许可。但在实际操

作中,这种控制并不严格,绝大部分内容提供者和服务提供商在建立之时就会自动取得许可,少数组织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网吧等则被要求在实际运作 14 天之内注册。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法案》规定上述机构必须遵守相关法律,但并未对违法之后的惩罚措施做出任何规定。所以,目前相关法律在实际操作中也仅仅是象征性的。

美国的互联网管理采用的是政府和私人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商合作的模式。政府要求内容提供商和信息服务提供商与政府合作,监控和阻止非法内容的传播。与中国模式相比,美国政府要达到的管理目的相对简单,主要分为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和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方面。在实践中,除了未成年人保护受到的争议较小外,其他两个方面都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和批评。“9·11”后,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政府通过了《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监控私人数据的权力。尽管 9·11 对社会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使得政府扩权时并未遭到严重阻力,但是越来越多人质疑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管理手段是否必需。针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争议则更大,许多人认为知识产权内容宽泛,以此为目的的管理有可能被政府滥用,从而损害信息在互联网的自由流动。

基于以上比较,作者总结说,要想使政府对于互联网的管理正当化,就必须使管理目标明晰、具体并且合理。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政府所面对的争议根源都在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缺乏更加具体的解释和指引。另外,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必须是达到上述目标所必需的,过分宽泛的管理措施有可能伤及无辜,也容易招致批评。这两点不仅是国际法对于政府的要求,也料将是未来各国互联网管理的发展方向。

本文已刊发于《大公网》

参考文献

- Li, J. (2013). Internet Control or Internet Censorship? Comparing the Control Models of China, Singapo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Guide Taiwan's Choice. *Pittsburgh Journal of Technology Law and Policy*, 14(1). doi: 10.5195/tlp.2013.131

多族杂居环境利于消滅族群偏见

◎ 陶郁

3月1日晚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恐怖袭击事件,令人倍感震惊与悲痛,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才能增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与包容?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对中国非常重要,在其他许多国家也极受关注。最近,来自德国、英国、南非和新加坡的十位学者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联合发表论文,他们通过研究证明:在多族群杂居的环境下,主要族群居民对少数族群的偏见更可能得以消弭。

为开展这项研究,上述学者在2002年至2011年间,在英国、欧洲大陆、美国和南非等地累计开展了7项研究,考察主要族群成

语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研究者认为,主要族群成员对于少数民族的所谓偏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自身收入水平和本地经济状况的下降单纯归咎于少数民族,二是认为那些失业或违法的少数民族成员应该立刻离开本地。

通过测量与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居住于多族群杂居社区的主要族群受访者,对于少数民族的偏见程度显著低于其他人;更有意思的是,在上述社区中,即便来自主要族群的受访者不直接认识或者从未与少数民族邻居进行直接交流,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偏见往往也相对较弱。

当然,多族群社区中的主要族群居民偏见之所以更少,或许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例如,更有偏见的主要族群成员,也往往更可能选择主动避开或者搬离多族群社区,而没有偏见的主要族群成员,则一般不会介意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为排除上述干扰,研究者们特地进行了两项纵向研究,通过多年数据观察受访者对少数民族的偏见程度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结果显示,即便是那些从不与少数民族进行直接交流的极端偏见者,在周边居住环境逐渐变得多元化之后,其偏见程度也发生了显著下降。

为更好刻画上述现象背后的社会机制,研究者们借鉴“被动吸

烟”的说法，将新发现称为“被动包容”。换句话说，就像不吸烟者长期暴露在二手烟弥漫的空气中也会增加肺癌发病率一样，即便是那些偏见极深并且从不与少数族群直接交往的主要族群成员，如果长期在多族群社区生活，往往也更容易受到周围那些主动与少数族群沟通与交往的同族群居民影响，从而降低对少数族群的偏见程度。

研究者们据此指出，在多族群社区中，不同族群之间面对面交流互动的机会往往更多，这种交流和互动不仅能够直接增加参与者对少数族群的包容程度，也能间接纠正其他多数族群居民对少数族群的偏见，从而提升社区的整体包容水平。他们因此建议，虽然多族群杂居粗看起来更有可能增加不同族群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但政府还是应该鼓励此类社区的形成，因为从长期来看，杂居社区不仅能在个体层面更好地消减主要族群居民对少数族群的偏见，更能从整体上提升整个社区乃至全社会的包容水平。

在“政见”此前介绍过的一项类似研究中，学者们通过分析英国数据，发现跨族交流频繁的白人看待少数族群的态度较为积极，对邻里更为信任，但却没能确定这种相关关系背后的社会机制。本研究采用多国家、多时段数据进行分析比对，成果不仅更加可靠，

而且更可能具有普适意义。

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不仅确认了跨族交流频繁程度与主流族群居民邻里信任水平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相关,而且阐明了这种关系背后的社会机制;不仅证实了跨族交流确实是消减主流族群对少数民族傲慢与偏见的重要原因,而且说明上述交流甚至还能进而积极影响那些从来不与少数民族进行交流的同族友邻,有助于社区内各族群的和睦相处。

这项研究虽然开展于以白色人种为主的地区,但是,正如该项目组成员、牛津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修斯通(Miles Hewstone)所言,“没有理由认为该效应会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族群杂居社区对于消减偏见的积极作用,同样值得中国重视和借鉴。

参考文献

- Christ, O., Schmid, K., Lolliot, S., Swart, H., Stolle, D., Tausch, N., . . . Hewstone, M. (2014). Contextual effect of positive intergroup contact on outgroup prejudi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仍将上升

◎ 归宿

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也让很多中国民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恐怖主义其实并不遥远。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开展了一些研究。去年底,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助理教授菲利普·波特(Phillip B. K. Potter)在美国空军学术期刊《战略研究季刊》(*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内外

的恐怖威胁明显上升,其对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安全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

“东伊运”：主要恐怖威胁

文章指出,苏联解体后,紧邻新疆的中亚五国纷纷独立,中国西部安全破碎化。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也借机进入新疆,并与新疆一直存在的分裂主义势力结合,在一些地区生根发芽。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伊运”(EITM)一直是新疆乃至中国的主要恐怖威胁。“东伊运”最初成立于新疆,随后转移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参加“圣战”,与塔利班、“基地”、“乌伊运”(IMU)等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2009年,“基地”组织高级头目阿布·利比就曾公开为“东伊运”站台,在恐怖视频中鼓动针对中国开展“圣战”。

“东伊运”在盘踞于巴基斯坦部落区的国际恐怖组织中也具有一定地位,其前两任头目阿布都·哈克和阿布都·许库尔都曾是“基地”组织核心机构“舒拉委员会”成员,哈布都·哈克还曾参与协调组织塔利班、哈卡尼网络、“基地”等恐怖组织行动,应对巴基斯坦军队对部落区的围剿。哈克和许库尔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被

美军无人机和巴基斯坦空军炸死。

文章认为，“东伊运”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密切关系，使其在资金、培训等方面得到了国际恐怖组织的帮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新疆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升级。2011年7月30-31日，喀什地区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一伙恐怖分子综合采用了汽车炸弹、卡车冲撞、砍杀、枪击等多种方式发动袭击，其复杂和协同程度较以往明显上升。这起恐怖袭击发生几个月后，“东伊运”在发布的恐怖视频中承认，一名参与袭击的恐怖分子曾经在巴基斯坦部落区的恐怖训练营中受训。

文章指出，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一些在该地区参加对美“圣战”、具有丰富恐怖袭击经验和极端思想的恐怖分子可能“回流”，新疆面临的恐怖风险仍有可能上升。

中国成为袭击目标的可能性增大

文章指出，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国际大国，其反恐政策也在不断明确和强化。

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以往对一些国家左派组织和民族主义武装组织的支持。“9·11”事件发生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小布什表示慰问,并表态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国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的鲜明态度,扭转了当时因南海撞机事件急剧紧张的两国关系,也成为后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反恐的重要共识。

就国内而言,中国的反恐政策一度较为成功。相较于美国、以色列、俄罗斯等国,中国的恐怖活动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对于此类活动一向“严打高压”,以及对枪支、爆炸物等物品的严格管理。

但近些年来,由于中国“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大,介入国际事务越来越多,中国也更多地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袭击的目标。迪拜警方就曾经破获过恐怖分子试图炸毁中国商品市场的案件,而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也曾多次发生过恐怖组织对中国企业和工人实施恐怖袭击的事件。“基地”组织在北非地区的主要分支“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就曾经公然对中国利益发出过“圣战”威胁。

文章指出,受多重因素影响,2008年以来新疆的恐怖活动明显增多。与此同时,互联网及各类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信息“去中心化”的流动,也使得政府传统意义上管制恐怖主义相关信息的难度加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新疆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

事件,就曾引发网民广泛关注,并激起了中国网民关于民族关系的热烈讨论,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恐怖主义的深远影响

文章认为,总体来看,未来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仍将上升,由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也会增加。除了国家安全遭受挑战外,中国政府还应该密切关注恐怖主义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刺激效应:有研究显示,一国遭受恐怖袭击后,该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往往高涨。对中国而言,过于高涨的民族情绪可能打乱既有的战略布局,过多地被卷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乱局。

同时,中国如果进一步加大在国内严打力度,不仅可能对本已紧张的民族关系进一步造成冲击,也可能会对中国振兴新疆经济、向中亚挺进扩大影响力的计划造成影响。对于国际社会来说,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上升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将极大增加国际安全格局演变的不确定性,整个体系的不稳定因素也会进一步上升。

文章指出,对美国来说,中国反恐形势严峻倒是一个有效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机会,在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可能为两国未来关

系的发展提供动力。中国也可以从中更好的掌握国际合作规范，为和其他国家在双边或多边层次上更好的开展合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Potte, P. B. K. (2013). Terrorism in China: Growing Threat with Global Implication.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7(4).

中日俄印对比：中国已经领先邻国？

◎ 缪莹

在 2012 年底被正式提出的“中国梦”，最近不断被大声唱响。当然，旁观者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放眼全球，中国在几个重要的发展指标上依旧很弱，中国梦是不是白日梦而已？

美国本特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的郑世平教授在《中国政治学刊》中提出，中国对强国梦的自信，不能光看绝对指标，更要看和周边国家的对比。在中国最重要的三个邻国中，只有日本在有些方面尚领先中国，且差距不大，而俄罗斯和印度，甚至逐渐被中国甩开了。在亚洲诸国 20 世纪以来的追梦道路上，当今的中国的确领先一步。在国际竞争中的表现，成为支撑中国梦的重要

因素。

研究者分析了来自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多处公开并相对权威的数据。他从政治、经济、社会几个方面对比了中、日、俄、印的现状,涉及的指标包括:政府效率、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外商投资信心指数、谋杀犯罪率、全球性别差距指数、国际旅游数据和全球竞争力指数。

经过对比,研究者发现,中国在经济信心指数、外商投资信心指数和国际旅游方面领先于其他三个国家,并在政府效率、谋杀犯罪率和全球竞争力指数上仅仅落后于日本,居于第二位。在性别平等上,中国离俄罗斯仍有差距,但依旧比日本和印度做的要好。虽然俄罗斯在性别平等一项中有良好的表现,但犯罪率和全球竞争力中糟糕的数据依旧显示了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更有趣的是,曾经在二十世纪以政治改革先锋自居的俄罗斯,在政府效率方面,反而远远不如中国。而中国在这一项指标上,也比印度做得更更好。

与此同时,尽管印度的发展力度不可小觑,但在这七项数据的对比上,依旧在各方面都不敌中国。更重要的是,在这七项指数中,中国若非领先,则排名第二,表明有极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而相

对于在好几项指数中领先的日本,反而在经济投资指数和旅游方面跌落末名,显得力不从心。

倘若将日本作为主要对比对象而进一步观察,则可以发现,尽管日本在政府效益性方面领先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则比日本更大,而两者在提高治安度、减少犯罪率的方面,则不相上下,在十年内都将谋杀率减半了。日本唯一遥遥领先中国的地方是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下属的“创新和企业成熟性”方面——日本居全球第三,中国排名三十四。不过,在同一项指标下其他部分,如“稳定的经济大环境”和“成熟的基础设施”方面,中国紧紧跟在日本后面,差距并不很大。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指标则远远赶超日本。在2012年,中国的经济信心指数为73,而日本是-56。在外资信心指数上,中国的2.02也高过日本的1.68。日本一年接收的国际游客往往不会超过九百万,而中国则高达五亿,给中国带来超过每年五百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这些数据似乎说明:尽管中国离“赶英超美”还有一定距离,但在追逐强国梦的道路上,已经走得比邻国更快更远。研究者认为,在提到中国梦的时候,与其拘泥于绝对指标的数据,不如更应

该关注和周围诸国对比性的表现。不过,这些数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值得再考量。

参考文献

- Zheng, S. (2014). Rising Confidence Behind the “Chinese Dream”.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9(1), 35–48.

农民工为何认为“法律无用，上街有用”？

◎ 杨鸣宇

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因为不能按时拿到工钱而上街示威的事情时有发生。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加强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既然如此，为何他们仍然偏好通过集体上访，而不使用更规范、可预期和程序性的法律渠道？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的贺欣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他们在四川某县城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对劳动纠纷的当事人（包括农民工、政府官员、律师和企业经理）进行了深入访谈。他们研究了农民工是如何理解法律的，并探究了法律的独立性是如何被不断破坏的。

农民工在劳资纠纷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劳资双方在议价能力上的不对等，以及农民工在法律知识上的缺乏。虽然中央的法律文件一再规定：劳资双方必须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但在实际中雇主经常违反规定。另一方面，农民工由于欠缺法律知识，往往会认为劳动合同并不重要。而且即便他们有这样的意识和要求，雇主很可能就会视他们为“麻烦人物”而不雇佣他们。

在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农民工在法律文本的语境下必然处于劣势，因为他们无法有效证明自己付出的劳动。法律的严谨、规范和正式反而成为他们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己权益的障碍。

但农民工认为：“一分劳动一分收获”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么谁该为他们遭受的“不义”负责呢？

有意思的是，不单是雇主（事实上有时候甚至不清楚谁是真正的雇主），很多时候连法律上并无责任的地方政府部门也成为他们讨工钱的对象。有不少农民工认为，地方政府有责任还他们一个公道。当“法律”无法保护他们的权益的时候，通过上街示威或阻塞交通这样的行为就成了他们的维权策略。以下一段访谈对话很好的展现了“法律”和农民工眼中的“正义”之间的隔阂：

官员：“你们为何一开始不遵守法律程序？怎么可以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工作？现在你说你没有收到工钱，证据在哪？”

农民工 1：“我们只知道在哪里工作就该在哪收工钱。”

农民工 2：“我们不关心合同！我们只知道我们建了那座公寓，所以我们要取回应得的工钱！”

农民工 3：“证据？你竟然和我们说证据？你没看到那栋房子吗？我们工作了，我的工作就证据。你到底什么意思？”

农民工 4：“我们本身就是证据呀，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农民工的这种反应经常使地方政府部门和法院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按照法律办事，他们的要求十有八九会败诉。但是在地方维稳的压力下，地方政府又无法置身事外。在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变通处理——农民工通常无法忍受漫长的法律周期，他们需要的是立即的补偿和解决，因此地方政府只

好打破法律程序的约束,并通过行政手段甚至是命令的方式促使雇主或其他个体(从法律上说可能不存在相关责任)支付全部或部分工钱。而地方政府这样的行为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法律无用上街有用”的认知。

法律为何无法有效解决劳资纠纷?当中固然有文化因素、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甚至是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侵犯劳动权益的企业进行纵容的原因。但更为根本的是,地方政府和农民工各自破坏“法律”的行为背后的理性需要放在中国独特的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地方官员的评价体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参考文献

- He, X., Wang, L., & Su, Y. (2013). Above the Roof, Beneath the law: Perceived Justice behind Disruptive Tactics of Migrant Wage Claimants in China. *Law & Society Review*, 47(4), 703-738.

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 越少向下级政府拨款

◎ 张跃然

一提到政府间财政关系，相信大多数人脑海中的第一反应都是“央地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央与省级政府的关系。其实，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关系，重要性或复杂度都不亚于央地关系，但一直以来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香港教育学院讲师吴木銓和印第安纳大学学者 Wang Wen 近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 1995—2006 年间中国除西藏之外其他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分析发现：一个省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会显著降低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换句话说，越依赖中央转移支付的省，往往越少向下面的地

市县乡拨出经费。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将“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定义为：省级政府支出占全省各级政府支出（即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级政府支出的总和）的比例。这一比例越高，则说明该省财政支出结构越“集权”；反之，这一比例低则说明该省财政支出分权程度高。而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影响了一个省财政支出分权程度的高低？

基于此前的研究，研究者将关键的自变量锁定为该省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众所周知，由于在目前的分税制下，地方政府本级财政收入难以负担其承担的支出责任，因此中央政府会拿出钱来，补贴地方政府的财力，这就是所谓的“转移支付”。而中央政府对基层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并非直接给到基层政府，而是通过省级、地市级、县级、乡镇级政府层层传递。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被各级政府截留、分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分权结构。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用中央转移支付占全省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一个省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

在分析数据过程中，研究者试用了多个统计模型。而这些模

型所得出的结果,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一个省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对“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远远强于研究者代入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吸引外资规模等等。

为解释这一发现,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因果机制:大量来自中央的转移支付为省级政府提供了庞大的截取留用的空间。因此,一个省越是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省级政府的本级财政支出所占全省支出的比例越大——也就是说,越依赖转移支付的省级政府越“集权”。研究者进一步推测,省级政府的“截取留用”很可能都用于壮大政府规模了。

研究者的这一分析思路固然清晰,但却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是由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钱组成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额由公式计算得出,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小;而专项转移支付的拨付权力掌握在各个中央部委手中,其分配结果取决于各地干部和中央部委的磋商和讨价还价(也就是所谓“跑部钱进”)。与此同时,这两类钱的拨付方式、管理方式也区别甚大。因此,这两类转移支付对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的影响很可能大不相

同,而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将两者做加法,合并处理了。

研究者忽略了这两类钱的不同,也就忽略了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一个内生性问题:“一个省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与“省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有可能存在伪相关关系。如果某一省级政府手握权力变大、活动能力越来越突出,这个省政府的“省内财政集权程度”会提高,而其从中央政府手里套取转移支付(特指专项转移支付)的能力也会同时变强。这一可能性,是本研究无法排除的。

虽然这一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够稳健,但其对我们理解中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还是很有启发的。近年来,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话题一直备受瞩目。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指出,要建立财权和事权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而要进行这样的制度设计,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目前,财权(对财政收入的支配)和事权(承担的财政支出责任)在各级政府间究竟是如何分配的?在不同省份,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结构各不相同、差异巨大。

研究者不仅告诉我们,省以下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存在极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且还揭示了:不同级别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也往往具有相关性。我们清楚地看到,转移支付(中央和省级政府

之间的财政关系)和省内分权(省级政府及其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高度挂钩。而张闫龙等学者的研究曾经证明,省级与地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和地市级与县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之间有很强的互动作用。如何解释这其中的普遍规律、情境差别和动态过程,则需要更为扎实而丰富的经验研究。

参考文献

- Wu, A., & Wang, W. (2013). Determinants of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46, 176–184.

外交

中日韩青年如何看待历史伤痕与外交政策

◎ 于灵歌

2013 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又一次激怒了中韩民众。在东北亚历史问题上，曾遭日本侵略的中韩民众似乎总是非常“玻璃心”。由历史引发的伤痛与愤怒真的会增强当下的不安全感吗？历史伤痕会怎样影响民众对未来外交政策的偏好？

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的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教授与来自中、日、韩的三位学者曾就此问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是中、日、韩三国的北京大学、新潟大学（Niigata University）、全北国立大学（Ch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的 181 名大学生。结

果显示,历史观强烈地影响着大学生对当下和未来的判断。中、韩大学生越是在历史问题上感到“受伤”,就越容易对现状感到不安,倾向于强硬的对外政策;而日本大学生对本国侵略历史造成的伤害认识越深,其外交偏好就越平和。

研究首先选取了三个国家两两交集的三段历史:日本侵华时期的中日关系,明清朝贡体系下中国与李氏朝鲜关系,以及日本占领朝鲜半岛时的日韩关系。调查中,大学生被要求对与本国相关的历史关系进行评价。

日本人都是拒不承认历史罪责的吗?不尽然。结果显示,对于日本殖民扩张的历史,中韩学生都感到“受伤”,而调查中的日本大学生与中韩学生的认知差异并不大:较多数人承认“日本殖民统治给亚洲人民造成苦难”。有趣的是,中国与韩国大学生对朝贡体系下的中韩关系评价大相径庭。中国多数学生认为“作为中国附属国的李氏朝鲜强盛了”;而韩国学生却有相当一部分认为,这段历史对李氏朝鲜的发展不利。这种不对等的历史认知也成为中韩两国对历史问题(如2004年的高句丽问题)产生争执的导火索。相比之下,日韩两国学生的历史认知则较为平衡。

继而,调查又对三国大学生当下的威胁认知进行评估。自然,

在中日两国大学生看来,对方的威胁程度最高,两国成了彼此的“眼中钉”;同时,中日大学生都认为韩国的威胁程度都不高。对于夹在强大的中日中间、规模和位置都不占优势的韩国而言,他们的不安全感是最明显的——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威胁性几乎与日本的威胁性一样高。

那么,受不同的历史观念影响,三国大学生对于本国在东北亚地区未来的外交政策持怎样的看法?有着“伤痛记忆”的中、韩两国学生,仍有很大一部分倾向于对日外交采取强硬态度,在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积极的防御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认识到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亚带来的灾难,使得日本大学生的态度变得“包容平和”,偏向和平地与邻国开展外交,在主权问题上并不喜欢侵略性的姿态。

固然,这项调查仍有许多局限性,比如样本局限于大学生,规模有限,无法充分地反映民众多元化的认知水平。调查中日本大学生对侵略历史的认知极为宽容,或许与他们较高的教育水平有关。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依然能给人启发。历史观念对东北亚地区青年人的影响巨大,对历史真相进行充分的了解与认识,同时不一

味沉湎于历史的悲痛与愤怒中,才更有可能在“过去”与“当下”、“未来”之间创造桥梁,也才有机会在彼此的互动中减少认知不对等带来的摩擦。

参考文献

- Gries, P. H., Zhang, Q. Masui, Y., & Lee, Y. W. (2009). Historical beliefs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reat in Northeast Asia: colonialism, the tributary system, and China–Japan–Kore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9(2), 245–265.

中国加大对朝经贸联系有助于推进朝鲜无核化？

◎ 归宿

朝鲜前二号人物张成泽被处决震惊世界，朝鲜局势走向也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分析人士认为，张成泽之死反映了朝鲜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未来朝鲜可能通过第四次核试验或者发射导弹的方式转移内部矛盾，半岛局势存在剧烈升级的可能。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国能发挥独特作用，避免朝鲜生乱危及地区乃至国际安全。近些年来中国对朝政策也更加积

极：一方面，中国一直在为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奔走斡旋；另一方面，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中国加大了与朝鲜的经济贸易合作力度，试图以此加大对朝鲜的影响。国际各主要智库和研究机构一直以来对此也有诸多分析评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近日即发布了该所中国与国际安全项目负责人 Mathieu Duchâtel 和核武器项目研究员 Phillip Schell 撰写的报告《中国对朝政策：经济接触与解除核武器》（*China's Policy on North Korea: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Nuclear Disarmament*），认为尽管中国加大与朝鲜的经济贸易合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其脆弱性和缺陷也非常明显；中国也正在积极做出调整，力图使这一政策取得更好的效果。

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报告认为，2009年朝鲜第二次核试验后，经贸在中国对朝政策中重要性上升。2011年底金正恩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加强与朝鲜的经贸联系仍然是中国对朝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一些专家认为，加大与朝鲜的经济贸易联系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东北省份

获得经济利益,从长远看也有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

报告指出,中国这一政策的提出主要基于三个考虑。首先,加强与朝鲜的经济交流有助于帮助朝鲜重新融入世界。当朝鲜发现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升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对于核武器的需求可能也会降低;其次,在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经济途径的效果可能会更加明显;第三,加大经贸联系有助于帮助朝鲜解决其内部的一系列严重民生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有利于朝鲜维护政权稳定,避免国内局势出现动荡。

但中国的这一政策却遭遇挫折。2013年2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劝阻,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受此影响,中朝关系也一度陷入低谷。目前,中国对朝政策重点已发生变化,主要精力更多放在了恢复六方会谈上。

脆弱的中朝经贸关系

报告指出,最近张成泽倒台并被处决,也凸显了中朝经贸关系的脆弱性。张成泽支持朝鲜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和联系,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也成为他倒台的重要原因。张成泽死后,中国对

朝开展经济合作可能面临无人可谈的境地。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当前加强与朝鲜经贸关系,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更多。金正恩上台后,朝鲜的政权延续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塑造有利于己的朝鲜半岛战略环境,已成为眼下中国对朝经贸合作的两大支撑。在未来,中国对朝经贸政策依然将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在制裁和经贸合作间取得平衡

报告认为,中国与朝鲜的经贸联系,其实也给了朝鲜“钻空子”逃避国际制裁,继续核扩散的机会。中国近期积极与国际社会合作,更加严格的执行联合国相关决议,实际上加大了制裁朝鲜的力度。报告认为,中国的这一政策转变,显示出其已充分认识到朝鲜核武器的危害性,并决意在朝鲜核不扩散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报告指出,朝鲜半岛无核化依然是中国的政策目标。但朝鲜多年来的一系列举动表明,拥核是其战略抉择,而非简单的交易筹码,朝鲜绝不会轻易放弃。因此对于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一方面固然不能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但同时,外交努力和制裁

能达到的目标,也仅仅是确保朝鲜核不扩散,并继续遏制其核技术发展。因此,如果中国能更好的平衡其开展对朝经贸合作和严格执行制裁决议的关系,对朝鲜相关政策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也将继续在国际社会达成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Duchâtel, M., & Schell, P. (2013). *China's Policy on North Korea: Economic Engagement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Sweden: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如何让周边“小伙伴”们不视中国为威胁？

◎ 宿亮

中国崛起后会怎样？经济强权？政治霸权？负责任大国？与这些问题相伴而生的，是不少周边国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传统意义上相对成功的“双赢”外交政策似乎在新时代没有阻止周边国家不同程度上对中国未来方向的怀疑和猜测。那么，“双赢”还管用吗？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吴本立（Brantly Womack）认为，“双赢”仍然有效，但仅靠与周边国家说“双赢”不足以缓解他们对中国

的担忧。如果不能调整“双赢”政策,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在今后中美竞争中,中国将面临极大挑战。

“双赢”根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9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提出“安全新概念”,强调安全“应当建立在互信和共同利益基础上”。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双赢”首次出现,随后成为中国外交关系文件中最爱用的词语。以“双赢”为标签的“好邻居”政策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贸易、政治交流、投资、旅游等方面关系发展,推动中国和平崛起。

然而,吴本立认为,时过境迁,是时候调整“双赢”政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时代后第一次危机,由于各国相互依赖程度前所未有,危机导致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不确定性迅速升高。而中国在危机中成为受影响相对最小的经济体,保持增长,不断拉大与周边小国的距离,缩短与欧美的差距。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年代,各国追求的边际效益,更愿意承担风险,更愿谈“双赢”;但多层次的不确定性之下,人们倾向于保护现有财产,各国也因此开始保守谨慎,警惕风险。

从“小伙伴们”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势头好,周边国家越来越依赖中国以保证复苏,中国从好邻居变成了亚洲经济中心。“小伙伴

们”会不会自问：我们变成中国后院了吗？中国会成为霸权国家吗？中国的态度会从“大熊猫”变成“喷火龙”吗？

这体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后，邻国对中国的意图和态度敏感程度陡增。再加上各国政府在网络时代面临更大执政压力，处理对外关系愈发紧张。

学者以南中国海问题为例，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主权声明从没变化，为什么现在在南海冲突有升级趋势，而此前则相对平静？

吴本立认为，周边国家经济上更依赖中国，自身就会更担忧中国的改变。无论中国以前是不是个好邻居，有没有一直强调“双赢”，与中国联系紧密的周边国家开始担心，强大的中国可能利用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地区主宰，在这种心理下开始与中国摩擦。

中国当然不会放弃对南海的主权要求，但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怎么让这些要求不会引发邻居们的过度担忧。南海宣言是个不错的开始，但要缓解关系、落实具体措施还有很长路要走。

吴本立认为，今后 20 年最大的国际问题是中美关系，但最大的问题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小伙伴们”都支持中国，那么美国将无法掌控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睦邻政策是未来力

量更加平等的中美关系如何相处中的重要一环。如果美国对中国敌意升高,中国对外关系的稳定就将取决于邻国。中国必须对小国如何看待自己引起重视。

苏联曾经与美国在冷战中对抗。它主张军备竞赛,以及控制周边国家形成“缓冲”。苏联的失败恰恰死在这种建立主宰的孤立集团。这种集团给予小国“小恩小惠”,实际上有“双赢”的成分,但最终多数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因为苏联解体而伤心。

在一个彼此力量不均衡的地区中,小国只有握有自由选择权时才对“双赢”有信心。如果地区强权在“后院”划势力范围,建立一种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结构时,小国不会考虑合作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是担忧这种势力范围会导致国家丧失自主权。小国会更愿意参与全球化合作,建立超地区关系,拥有更多选择。

“双赢”代表着以双边外交为主。这种政策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小国面临的风险,以及小国会在封闭环境下对大国意图的怀疑和担心。只有建立多边利益平台和全球机制,保持地区的开放性,让小国有更多选择,他们才会觉得自身不那么脆弱,从而更踏实。

中国如今卷入国际事务的程度比苏联更深。如果邻国不把中国视为威胁,并看中与中国和平关系带来的价值,对于中国而言是

巨大的战略资本。不仅经济联系带来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也使得破坏这种友好关系成本巨大。因此,帮助“小伙伴们”建立对中国的信心比给与他们特定利益更加重要。

参考文献

- Womack, B. (2013). Beyond win-win: rethink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an era of economic uncertain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89(4), 911-928.

靖国神社：参拜与民意

◎ 宿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4 年初前往靖国神社拜鬼，现场中国记者的反应是“恨不得脱鞋砸他”。安倍之前，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直接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至顶点。靖国神社是怎么回事？日本政客究竟是怎么想的？日本民众支持他们吗？

靖国神社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达到顶峰。根据惠美子《神风特攻队，樱花，和民族主义：在日本历史美学的军事化》一书，靖国神社当时就是所谓的“军国主义思想堡垒”。与其他神社不同，

靖国神社不归日本内政部管辖,而是由军方资助并“独立控制神社活动”。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于当年12月15日颁布《神道教指令》(*Shinto Directive*),禁止国家资助宗教活动,把靖国神社定为一处私有财产。不过,对于战争中阵亡亲人的“遗族”而言,靖国神社仍是他们的“记忆库”。

1978年,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供奉进这座神社,直到第二年4月,这一消息才被公众知晓。

靖国神社方面的历史记录称,“最近一次大战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卫战争”,“为的是亚洲国家从欧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言论与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的战争借口如出一辙。

靖国神社对日本政客而言,始终具备政治利益。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政府曾多次尝试把靖国神社变成国家祭祀场所。日本战争遗族会成为这一主张的主要支持方。当遗族会成为日本自民党的关键支持力量后,对靖国神社的推崇成为二者政治勾结的直接产物。前中曾根康弘1985年的参拜靖国神社导致这一问题国际化。

另外,遗族会多次反对在设立新的国家纪念设施取代靖国

神社。

在日本国内，靖国神社本身就是以社会党代表的主张神道教与政府政教分离的自由派和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派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首相小泉历次参拜与狡辩

美国圣约瑟夫大学日本学者福冈和也 (Kazuya Fukuoka) 2013 年发表在学术刊物《亚洲政治与政策》(Asian Politics & Policy) 上的文章收集了小泉政府期间的首相国会发言、民意调查和媒体舆论。

小泉 2001 年至 2006 年任内，就参拜靖国神社一事 73 次前往国会参加听证。从其国会发言中可以看出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愈发趋向强硬的态度。

上任之初，小泉对于邻国的反应和批评还是在意的。2001 年参拜靖国神社，他准备了三套方案。据他事后称，没有选择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日参拜的 A 计划，是“考虑邻国感受”。小泉也没有选择在这一敏感日期后 17 日参拜的 B 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国内在 15 日之后就是否参拜引发舆论争论。最终，小泉选择 13 日参拜的 C

计划。

2002年，小泉选择4月21日参拜，称这一时间点不会造成“国内外忧虑”。但这一行径遭到了中韩两国一致谴责。参拜行为对地区关系造成影响很大。在这之前的参拜后，小泉2001年10月还是访问了中国，就这一议题与中国磋商。但2002年之后，小泉几乎失去了中方的信任。

2003年，小泉1月14日突然拜鬼。这是第一次没有通知党内和执政同盟政治人士的“突然袭击”，事后也没有公开解释这一事件。这一时间点在中韩两国更换最高领导层之前不久，导致关系恶化，小泉原定当年5月访华没能成行。

2004年，小泉故技重施，1月1日再次拜鬼，称这一行为是“新年传统”。这次参拜不仅恶化中日韩关系，更引发日本国内反对。日本最大商会经济团体联合会警告小泉此举的危害。日方正积极争取的中国高铁合同也遭到压力。另外，这次参拜后，小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态度转变，公开在国会中说“每个国家都有纪念死者的理由”。同时，小泉在另设纪念设施的问题上降低调门。

2005年，中国社会反日情绪高昂，小泉同样开始语出激烈。他10月17日参拜经过神社。那天是两年一度的靖国神社大祭头一天。

2006年，小泉执政最后一年在国会的措辞更加极端。他曾在国会说：“我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不少日本人同意中韩政府的观点，反对我参拜。”在这一年，他不再带上遮羞布，直接选择8月15日参拜。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在当时影响到公众的观点吗？小泉无疑是日本战后影响力最大的首相，公众支持率较高。由于在党内较为孤立，小泉被称为独狼，更需要公众支持。他的领导风格强硬，要“领导舆论而不是追随舆论，认定公众无疑会拥护他的主张”。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公众是否买账又是另外一回事。

公众与政客观点逐渐分叉

福冈和也援引《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以及日本广播协会等媒体多年进行的民调，分析民众对官方是否应参拜靖国神社、是否应另设国家纪念机构及亚洲反日情绪的看法。

2001年，日本民众总体支持首相参拜，69%的人在民调中赞成。但此后，随着中日韩关系紧张，日本公众不再支持小泉参拜。到2006年，54%至57%的民众在民调中反对参拜。多数人认为，小泉之后的首相不应再参拜靖国神社。

公众对于靖国神社的态度中有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民众起初总体不反对参拜，但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在支持者中，多数选择“以一种谨慎的方式参拜”，只有少数选择“积极促成”。相比较 1985 年中曾根康弘时期，多数民众更加重视亚洲邻国的反应。

其次、尽管中日关系在 2004 年至 2005 年有所恶化，但由于中国反日情绪导致日本民众对中国存在看法，这并不意味着支持参拜靖国神社。55% 的人认为中韩抗议“可以理解”。尽管 2005 年两国关系恶化达到顶峰，半数民众仍反对参拜。

最后，多数日本民众多年来倾向于建立新国家纪念设施，回避靖国神社议题。

福冈和也认为，日本社会对于战争的看法在上世纪 90 年代产生转变，人们不再像 80 年代时回避战争罪行问题，而是认识到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应承担战争罪行，并意识到真诚向战争受害国道歉的重要性。但日本政客此时却还在讨论一些历史事件的“真伪”。政客与公众观点在这一时间点开始走上不同轨道，从小泉参拜的过程和民众支持率就可以看出。

这名在美国任教职的日本学者认定，纪念战争死者是民族自

我认同的一种基础,但靖国神社作为纪念战死者的场所“没有得到认同”,其敏感的历史和现状使得这一神社在亚洲争议不断,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听之任之、无所作为,靖国神社议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导致亚洲国际关系恶化。

福冈和也的研究发表在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之前,在文章中福冈指出小泉之后还没有首相敢于以牺牲睦邻关系为代价拜鬼,但如今不知日本学者又会对新一次的参拜作何解释。

参考文献

- Fukuoka, K. (2013). Memory, Nation, and National Commemoration of War Dead: A Study of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on the Yasukuni Controversy. *Asian Politics & Policy*, 5(1), 27-49.

“双倍下注”还是引发“噩梦”

布鲁金斯学会谈 2014 中美外交

◎ 归宿

近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由该学会多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专家合作编写的系列研究报告《大赌注和黑天鹅：总统简报》（*Big Bets and Black Swans: A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分析美国在新年度可能面临的重大外交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此报告也是该学会去年广受关注和好评的《大赌注和黑天鹅：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面临的外交挑战》（*Big Bets and Black Swans: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for President Obama's Second Term*）的续篇。

今年的报告中，布鲁金斯学会将美国可能面临的外交挑战进一步细化，在原先的“大赌注”（美国应集中精力解决的，将具有深远

影响的挑战)和“黑天鹅”(发生概率很低,但将产生颠覆性冲击的事件)之外,还增加了“双倍下注”(Double Down, 2013年未完成的大赌注”, 2014年应继续加大力度推动解决)、“噩梦”(Nightmare, 可能发生的最为糟糕的事件)和“持牌”(Holds, 应继续推行的现行政策),关注的领域也较去年有所扩展。

中国在这份报告中的分量依然很重。在报告列出的5类22项挑战中,与中国直接相关的有3项,分别是“双倍下注”中的《重返亚太再平衡》、《避免东海、南海发生冲突》和“噩梦”中的《朝鲜危机引发中美对抗》。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较以往明显更为强硬,报告中的一些对策建议似乎已经落地成为政策,这也再次反映出美国学术界与政界密切的互动关系。

重返亚太再平衡

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和高级研究员、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ery Bader)共同撰写了此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对于“亚太再平衡”持谨慎态度,但美国在2014年仍应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并将此作为美国长期战略重心调整的前奏。

报告认为,当前美国在亚太面临的挑战有三个方面:保护和增强美国的长远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深化与当地盟友和伙伴的关系;努力在地区争取新盟友和伙伴。而在应对前两个挑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都需要积极的政策规划和管理。

报告建议,美国应在今年继续实现其“再平衡”战略,同时给予中美关系动力和指导。首先,美国必须确保自动减支导致的军费预算削减不至于损害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备和行动能力,同时也不会对计划中的军力部署调整造成影响。其次,应在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太平洋战略与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并促使国会早日批准该协定;鼓励中国在达到 TPP 标准的前提下加入该协定。第三,大力支持中国领导层推动的改革进程和经济转型,表明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和成功符合美国利益,力争到 2016 年完成美中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以证明美国对发展美中经贸关系的诚意。第四,促使亚洲各主要盟友的利益与美国保持一致,美国应支持日本在美日联盟的背景下加强安全,支持日本经济复兴的努力,但是安倍不应在历史问题上继续挑衅;向韩国施压,促进韩日关系正常化。第五,大力推动东海和南海领土争端降温,避免各相关方擦枪走火。

报告认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时“行胜于言”。演讲和访问非

常重要,但必须确保以果断和坚持的行动做后盾。言辞对于当前高度敏感复杂的局势和摇摆不定的地区国家来说,无疑太过空洞。

避免东海、南海发生冲突

这部分报告由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 III)、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主任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和乔纳森·波拉克共同完成。报告认为,尽管东海和南海都有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但当前东海和南海形势存在一定差别。在南海,相关各方已经提出了行为准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已表现出了建设性的外交姿态,美国只需乐观其成。但在东海,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紧张对峙态势仍在升级,特别是中国对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决心和力度估计不足,增添了中日双方战略误判的风险。

报告认为,美国应尽快采取以下动作,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强化对亚太盟友的承诺,让盟友们知道美国的支持并不是“空头支票”。二是利用各种沟通管道做韩日两国工作,促使两国降低民族主义调门,放弃挑衅行为,尽快缓和关系。三是尽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共同赋予新型大国关系实际内涵,让中国知道利用军事手段解决东海、南海争端将面临严重后果。四

是任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与中国及其他相关方一起讨论建立海上安全框架、危机管控机制、探讨美国海上力量在保障中国及其他地区国家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中的作用。

报告指出,上述动作可能都需要美国高级外交官高密度的穿梭外交。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一旦发生冲突,美国很有可能被迫卷入,将对美国外交目标造成冲击。因此,更需要提前谋划相关政策,避免最坏情况发生。

防止朝鲜危机引发中美对抗

这部分报告由卜睿哲和波拉克共同完成。报告认为,朝鲜和韩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可能造成中美直接对抗。除此之外,中美两国还同时面临着不断加强核武器力量建设的朝鲜的挑战。如果朝鲜继续加强其和力量,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中美“迎头相撞”的可能性同样高度存在,中美建立成熟政治军事关系的可能性也无从谈起。

报告建议,奥巴马总统应派出私人代表,向习近平主席表明朝鲜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威胁,同时也是双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抓手。中美两国应该互相“交底”,让对方知道自己在朝鲜问题

上的政策考虑。对于美国来说,应让中国了解到美国的对朝政策,本意并不是制造朝鲜的不稳定,更不是针对中国。此外,双方也应加强情报方面的务实合作,相互取长补短:美国监控技术先进,在了解朝鲜核导设施建设进展上优势明显;中国则对朝鲜内部动向有较好掌握。

报告指出,逆转朝鲜的核武进程,防止其进一步挑衅行为,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从朝鲜过去的行为方式看,其并不会因为中美或者其他大国的关切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产生对抗毫无疑问将成为美国的噩梦,但双方在此问题上合作的空间和机会依然巨大。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Piccone, T., Pifer, S., & Wright, T. (Eds.). (2014). *Big Bets and Black Swans: A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新大使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什么？

◎ 归宿

3月1日，中美建交后的第十任驻华大使骆家辉正式结束任期。早前，奥巴马总统已提名蒙大拿州的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为新一任驻华大使。这一提名在参议院审议中全票通过，鲍本人也已于2月21日在国务院正式宣誓就职。

作为中美建交以来年龄最大和第一位现职参议员转任的驻华大使，鲍卡斯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期走马上任，引来国内外研究机构的诸多分析评论。清华卡内基研究中心国际政策项目（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主任韩磊（Paul Haenle）近日在网站上撰文表示，鲍卡斯可利用其丰富经验增进美国国会与中国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这将有利于构建更为稳定和持久的中美关系。

美国国会对中国的关注不够

作为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会在美国内外政策制定中都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议员大多是美国民众直接选出，往往更加顾及本地选民的利益，对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外交事务并不了解。特别是在当前美国国内两党角力加剧的情况下，国内政治事务占据了国会的主要议程，议员更无心关注中美关系。

作者认为，尽管中美两国的主要接触由行政机构完成，但为了在中美关系领域推动制定有利于美国利益的立法，美国国会需要掌握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目前众议院中已有跨党派的美中工作小组（U.S.-China Working Group）承担这项任务，但力度远远不够。而鲍卡斯自 1974 年就进入国会，先后担任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并连任六届至今，在国会两院人脉深厚。如果他能利用其在国会的关系网，唤起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将有助于美国在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时做出更为明智而有效的选择。

需要解决的几个迫切问题

作者指出，当前美国国会立法进程中有几个迫切的涉华问题

需要解决,其中都需要鲍卡斯发挥作用。

首先是网络安全问题。去年2月以来,网络安全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陡然上升。2013年,众议院议员针对网络安全问题提出了9项议案。今年,美国国会将争取在《网络安全法》方面取得新的进展,而鲍卡斯需要向国会说明,什么是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网络间谍活动,什么是威胁美国繁荣和发展的商贸网络袭击,这些都与中国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是贸易问题。今年,美国国会将决定是否赋予奥巴马政府贸易促进权,这直接关系到美国正在积极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能否顺利实施。TPP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有12个国家参与TPP谈判,GDP总额占全球的40%,贸易总量占全球贸易的1/3,中国也表态有意加入TPP。目前,国会正在激烈讨论这一议案,鲍卡斯可以向议员们强调TPP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可以向中方说明美方相关立法进展和国内政治考虑。

第三是太空科研合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国会立法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与中国开展合作。但中国近些年来在太空科技领域发展迅速,这一禁令让美国更难了解中国太空

技术的发展程度。去年 NASA 曾援引法案,禁止中国科学家赴美参加相关科研会议,一度引发争议。但随后,中国就成为了第三个在月球上实现软着陆的国家。鲍卡斯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美国国会放松禁令,推动两个太空大国更为紧密的合作。

作者指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周边和国际事务的态度较以往更为积极进取。同时,全球化也使得中美两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不断加深,未来任何国际事务的解决,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可能都相当困难。但在过去,由于美国国会对中国了解不够,大多数时候中国引起美国国会关注是因为两国关系出现危机,这其实对美国整体利益非常不利。而鲍卡斯如果可以利用自己在国会的影响力,推动中国与美国国会开展建设性互动,可能将为中美关系留下宝贵财富。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3 月 5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Haenle, P. (2014). Baucus Can Bring China to Congress. The Global Think Tank. Retrieved from: <http://carnegietsinghua.org/2014/02/03/baucus-can-bring-china-to-congress/hoo>

经济

中国移民怎样在非洲做零售批发生意

◎周航

在非洲莱索托王国首都东北方的小城市 Maputsoe, 有众多商品丰富、规模不一的超市。随意进入一家商铺, 顾客往往会听见普通话的电视剧对白。一两个中国人盯着柜台上的电脑, 一边吃着方便面, 一边和其他员工闲聊。

这样的场景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小镇也并不陌生。来自维也纳大学的博士生 Sarah Hanisch 通过田野调查, 尝试解读中国移民在当地从事批发零售活动的生存现状。

据不完全估计, 目前在莱大约有 5000 至 10000 中国人。中国移民在当地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 莱索托与台

湾建交，一些台湾移民因双边发展合作的关系来到这里。项目结束后，部分人决定留下并开始从事批发零售。80年代，新一批的台湾移民到莱索托投资纺织服装业，颇为成功。这一蜜月期结束于1991年台湾移民与当地巴索托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不少人随后决定离开。

20世纪初，随着莱索托国内局势逐渐平稳，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填补了台湾移民离开留下的空白。大陆移民最初也是由于双边国家发展合作项目的关系来到莱索托，但越来越多的国人自发决定到莱从事批发零售业，或是投资纺织服装业。

由于来自南非的大型连锁超市早已进入当地，这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移民大多只能选择从事中小型的批发零售活动。然而，由于当地商业环境的不景气，就业市场不断萎缩，居民购买力随之下降，中小型零售批发行业事实上利润微薄。这种结构性的经营困难也解释了不少中国移民在当地的商业行为。

由于中小型批发零售行业的发展对创造当地就业机会至关重要，莱索托政府限制外国人进入这一领域。当地法律规定，外国人如要从事零售活动，铺面面积需至少大于1000平方米。作者采访的大多中国商铺都符合这一规定。一些当地官员虽然注意到少数

中国商人违规经营,但也并未采取相应法律行动。部分中国移民为了规避这一规定,向当地商人每月支付款项,“租借”经营许可证。

当地官员认为中国商铺在莱索托的零售批发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当地官员对中国商人的违规经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大城市里,中国商铺的存在为居民购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来自南非的大型连锁超市虽然供应的货品更为多样,但是大多也是从中国进口,且销售价格普遍更高。在较为偏远的乡村,当地人可以直接前往村里的中国商铺购物,无需再耗时耗力前往大城市购买日常用品。

中国移民往往倾向在乡村地区开店铺。对于莱索托本地商人来说,因为运输困难且成本高,在乡村地区经营商铺往往不是理想选择。而对于外国移民来说,因为竞争较少,这些偏远地区反而成为他们经商的首选地。

此外,中国移民进入批发零售业也为当地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作者发现,中国商铺的员工大多都是当地人。尽管中国员工的薪资待遇往往比本地员工更为优越,但这主要归因于两者间的职责差异,而且当地员工的待遇也略高于莱索托法律规定的最低收入。

部分当地人埋怨本地员工在中国商铺里只能做杂活,在职业技能上并不能获得任何提高。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其他外国人经营的商铺里也普遍存在。这部分反映了外籍雇主对本地员工的不信任,部分也归因于当地员工自身教育水平的不足。在作者看来,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莱索托的中小型零售批发行业本身就难以为缺乏技能的本地员工提供职业培训和发展的机会。行业整体利润较低,外国店主都只关心如何在当地继续经营生存。

这些缺乏技能的当地人也可以选择去纺织服装业谋职。但是,他们会面临同样的困境——被分配到低技能、高劳动强度的工种,缺乏技能培训机会。然而,这些岗位提供的平均工资却比零售批发行业更低。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刊的《参考消息》

参考文献

- Sarah, H. (2013). At the Margins of the Economy? Chinese Migrants in Lesotho's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 *Africa Spectrum*, 3, 85-97.

民营企业主：国家的盟友

◎ 宿亮

“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是后毛泽东时代改革中意义最为深远的社会经济变化……随着民营企业数量的不断增长，他们会对中国政治体系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美国爱达荷大学学者陈捷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提出的问题。在他们合著的《国家的盟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与民主变革》中，两位学者研究了民企与政府的关系，并试图解答民营企业主和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否会推动民主化。

《国家的盟友》一书搜集的资料涉及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几个省份的 2071 名民营企业主，选择这些地区是因为它们涵

盖了约 70% 的中国民营企业。

哪些因素会影响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观点？《国家的盟友》一书根据调查资料得出结论：企业家自身身份（如是否党员、是否全国或地区人大代表等）与政治观点无关。研究者发现，企业家对自己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越感到满意，就越会支持现存的政治体制，认为现行政策会维护其利益。不过，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也影响着民营业主对政策的评价。

不少民营企业主与政府存在着种种密切联系，一些企业倾向于用与政府的关系换取特权。另外，在很多情况下，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界线并非完全清晰。这些关系令民营业主和“崛起”的中产阶级倾向于维持现状，而不是推动改革。也就是说，中国民营业主整体而言是“国家的盟友”。

陈捷和狄忠蒲把民营和政府的关系分成四个维度：获得公共银行财政支持的程度、与政府机构的联系的密度、自身价值观及对公共政策的评估。

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那些从国有银行获取贷款的私营业主最不愿意接受体制改革。这一结论并不新鲜。但同时研究者得出的结论还包括，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支持改革的可能

性越大。研究者们认为,这可能与现有政策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壮大有关。

关于民营企业支持改革的具体行动,研究者认为极其有限。这种支持往往是间接的,比如支持学术研究。

总体来说,作者认为民营企业没有改革现状的动力。如果政府能够控制腐败状况,并与企业主保持良好关系,深入的体制改革在短期内将很难发生。

参考文献

- Chen, J., & Dickson, B. J. (2010).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民营企业：“不顾法律”的发展？

◎ 宿亮

在中国市场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主要是依赖政策而不是法律，而民营企业在改革初期很大程度上是不顾法律（in spite of law）的发展。”这是英国学者、媒体人琳达·岳的观点。她在2011年出版的《中国企业化：1979年后的商业、经济和法制发展》一书中，关注了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司法环境。

从完善法制的角度看，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 and 外企相应的法规制定节奏各不相同。

就国企而言，上世纪80年代的合同制改革和90年代的企业化改革、“抓大放小”等基本上是以政府政策的面貌出现，而非系统化

法规。在政策基础上，中国政府在 90 年代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公司法。尽管当时没有囊括所有国企，也缺乏类似股份制等重要元素，但这种“政策—法律”的过程体现了法治趋势。公司法“不是为控制国企而提出的治理机制，更是政府建立法制的努力。”

就外资而言，中国 1979 年就制定中外合资法规，而公司法则是 1994 年设立。也就是说，在中国企业的行为还没有系统化法规规范前，外资就已获法律支撑。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外资介入的前提是法制化，为引资必须事先定法。

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环境则没有那么规范。直到 1996 年之后才有相关法律出台理顺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关系，而它们在 80 年代数量就已经达到 1800 万，雇佣 9000 万人。

民企情况则更为极端。改革开放中，它们激活了中国市场经济。但直到 90 年代后期，私营业主才有了物权保护的相关法律，2000 年后才有了资本市场相关法规。

这种市场改革与司法演进极其不配套的情形是怎么维持下来的？琳达·岳认为，这是因为民企与供货商、客户及政府官员都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网络，即便没有合法的合同和商业框架，他们仍然依据个人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商业义务。

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船小好调头”的小规模企业；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缺乏法制是无法维持的。琳达·岳指出，这正是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市场法制建设、完善“事后法”（law ex post）的原因，这种建设的进度将决定中国深化改革的成败。

参考文献

- Yueh, L. (2011). *Enterprising China: Business, Economic, and Legal Developments Since 197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用数字证明制度缺失导致企业行贿盛行

◎ 邵立

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系教授王裕华最近撰文讨论了中国企业的行贿行为和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行贿相当于支付额外的费用来购买政府的服务,例如获取经营许可,或者保护企业产权等。因此,行贿的数额就相当于政府服务的“价格”。

王将这个“价格”分解成两个部分:行贿的“成本”和“收益”。行贿的成本主要取决于企业内部审计管理的严密程度。一家企业账目越透明,越需要向公众、股东、母公司或监管部门负责,管理者挪用经费的难度就越高,行贿的风险和成本就越大。另一方面,行贿的收益则取决于企业所在的市场制度环境。如果企业所在地有

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维护企业的合法财产,企业就不会有行贿的冲动。相反,如果当地的法规制度不够完善,企业将更有可能向政府行贿来保护自身利益。

如果这个理论要在中国成立,作者必须找到三个关键数据,分别反映不同企业之间行贿程度的高低、内部审计制度的好坏(行贿成本)以及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行贿收益)。他使用的是世界银行和国家统计局 2005 年的调查数据,这一调查覆盖了全国 30 个省区(除西藏和港澳台) 120 个城市里的 12400 家企业。

对于行贿程度的高低,王认为可以从这些企业预算中的“差旅费和招待费”(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或 ETC)中反映出来。但 ETC 不全然是行贿的支出。同样来自宾大的方汉明教授和他的团队曾经在 2011 年将这此费用分成四类:一是正常的商业花销,二是被内部员工享受的额外津贴,三是“润滑费”,即打通政府关节的贿赂,四是“保护费”,即向税务官员行贿用以降低税费的贿赂。显然,只有第三、第四项才是行贿的花销。因此,作者在定量模型里必须将前两项支出分离出来。于是,两个新的假设被提出:企业的经营市场越广阔,差旅费和招待费就会越高;企业员工工资的比例越高,差旅费和招待费就会越低。作者利用企业经营的

地域广度和企业平均工资这两组数据控制了行贿费用的两个混杂因素。他发现,企业经营的地区范围越大,ETC 的确会越高。但企业员工工资和 ETC 则不存在相关性。

其次,对于行贿的成本,作者利用产权的不同来区分企业内部审计制度的成熟程度。他认为,由于受到所在国家(地区)的监管,境外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审计在总体上优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而对于被调查企业的多元回归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从相对数值上看,私企、国企和混合型企业所花费的 ETC 支出显著高于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十个百分点。从绝对数值上看,每年,一个境内企业在 ETC 上要比境外企业要多花 4800 万元人民币。相比之下,集体所有制的 ETC 花销占的比例为所有类型企业中最低的一种。因此作者认为自己的模型无法对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作出解释。

最后,对于行贿的收益,作者以城市为单位衡量了该地方的制度完善程度。他的数据来源是在 2005 年调查中对企业经理的一个问题:“在贵公司所有的商业或其他纠纷之中,你们的合同和财产得到保护的比率占总数的百分之几?”比率越高的城市,被视为拥有越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作者发现,这些城市的企业平均 ETC 支出

也越少。也就是说，制度越完善的城市，企业行贿的支出也越少。

作者总结道，这项研究反映了：制度的缺失是行贿现象盛行的重要原因。与欧美国家比较，中国和俄罗斯等“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腐败现象正是源于转型时期制度的脆弱和不稳定，尤其是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没有完全建立，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过于强大等。行贿作为企业保护自身产权的手段，弥补正式法律制度的缺陷。这种“通过腐败进行现代化”的现象，也在亚洲其他“发展主义国家”，如印尼、新加坡、韩国和越南等地出现。而企业行贿行为的差异，则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态度并不公平。王认为，这也是国内腐败现象日益加深的重要原因。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Wang, Y. (2013). Institutions and Bribery in an Authoritarian Stat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5.
- Cai H., Fang H., & Xu L. (2011). Eat, Drink, Firms and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4(1), 55–78.

存款保险制度： 政府决心已定，细节值得推敲

◎ 袁幼林

2013年年末通过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业内普遍预测，此制度将于2014年上半年正式推出。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但是政府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一直在事实上存在。

荷兰 Maastricht 大学比较法教授 Michael Faure 和中国政法大学法经济学教授胡继晔最近联合撰文分析了中国存款保险制度从隐性走向显性的原因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通过与欧盟和美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比较，两位作者探究了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细节问题。

隐性存款保险的弊端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由符合条件的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集中建立保险机构,各机构按照一定存款比例缴纳保险费。当一成员机构面临经营危机而无法满足存户的提款要求时,存款保险机构向其存款人支付一定比例的存款,从而保护存款人利益并稳定金融秩序。

上世纪 20 年代美国大萧条期间,由于市场上关于某些银行即将破产的传言四起,许多存户担心自己的存款会随著银行破产而消失,于是排队在银行前取款,大量的提款要求导致原本经营尚可的银行破产。作者指出: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打消存户的忧虑,因而可以缓解市场传言对银行带来的危害。

作者观察到,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其保证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当地方存款性金融机构经营不善或者即将进入破产时,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央行通常会派遣特别行动小组介入,还清部分个人存款。1998 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后,央行即宣布其所有资产和债务并入中国工商银行,前海南发展银行的个人存款也转入工行。

在作者看来,这样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存在三个弊端:首先,政府为金融机构经营不善埋单,承担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间接转嫁给了所有纳税人,而得利方只有被拯救金融机构的存款人。其次,隐形存款制度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因为政府的保证,金融机构会更愿意承担高风险,而忽视了必要的风险控制环节,2011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即将道德风险列为现行制度的首要弊病。最后,现行的隐形存款保险制度只补偿个人存款,机构存款在此过程中亏损巨大。

独立性尤其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3年就开始论证存款保险制度的可行性。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制度处正式成立,并于当年12月完成了《存款保险条例》初稿。2008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将近期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来临而推迟。2012年,金融危机风波平息后,温家宝又重申了建立此制度的决心。在政府决心已定的情况下,又有哪些细节因素值得考量呢?

从体制上来说,作者通过分析美国和欧洲的经验,认为必须保

证存款保险机构自身运行的独立性。作者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独立于财政部做出决定的能力尤其重要。

从参与此制度的存款金融机构的范围上来说,作者认为应仿效美国和欧盟各成员国,强制所有存款性金融机构缴纳保险费。如果银行可以选择是否参与此制度,那么经营最好的银行(在中国特指五大国有银行)鲜有动机参与,而参与者通常是经营不善的银行。这样的逆向选择会使得此制度难以为继。

从此项制度覆盖的存款范围来说,作者认为:如果覆盖全部存款,将会使金融机构和存款者忽视自身风险控制的责任。若此制度覆盖款项太少,又很难起到作用,不能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必须更加具体的分析,防止两个极端的出现。

从各机构缴纳保险费的数额来说,作者认为我国应该在短期内对银行缴纳数额一视同仁,即银行缴纳数额与其吸收存款总额的比例保持一致;在中长期内,仿效欧美,针对各银行风险级别不同,高风险者缴纳更多比例的保险费。中长期目标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少道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因为更高的风险对应了更多的保险费,因而银行不能无限制的承担风险。但由于中国存款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体系尚缺失,此制度仍然无法实行。

存款保险制度将在近期推出, 究竟央行会推出什么样的制度, 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Faure, M., & Hu, J. (2013). Towards a Deposit Guarantee Insurance in China? A Law and Economics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2), 256–288.

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更喜欢贷款给国企？

◎ 韩笑

最近，中国政府正在着手处理大幅增加的不良贷款，并防止银行坏账的进一步增加。截至 2013 年 9 月底，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额为 5636 亿元，较 2011 年增加了 38%。大规模的不良贷款给中国银行体系带来了极大隐患。分析认为，不良贷款主要来自陷入产能过剩的主要行业及地方政府借入的建设贷款。

由此，有关不良贷款的讨论将问题引向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是否存在借贷偏向，即是否更加偏向国有企业。曾有一些经验研究证明确实存在这一现象。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 Godfrey Yeung 的一项研究认为，出于对风险和交易成本的考虑，国有商业

银行的借贷偏向事实上是一种理性选择。

作者通过对四个主要城市的国有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信贷部门负责人进行采访,试图解释银行是如何做出贷款决定的,并探究成文以及不成文的信贷政策如何评估信贷风险,如何影响银行运作。

2003年银监会成立后,商业银行开始使用信贷打分的方法评估贷款申请,并在2004年采用国际通行的贷款五级分类规则,即按风险程度将贷款划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其中后三种为不良贷款。在此基础上,信贷部门使用“5C”原则进行信贷评估,即借贷人品德(Character)、资本(Capital)、偿付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以及经济周期(Cycle)。同时,银行系统建立起多层级的贷款审核制度。支行发放的贷款要通过分行的信贷审批委员会审批,之后再由分行行长提交给总行的信贷审批中心。但是,为了增加竞争力,商业银行的分支行有一定的审批自主权。

研究指出,除了这些正式的信贷政策外,银行还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规则。

首先,企业所有权是不成文规则中最重要的一個。国有企业

身份所带来的较低的交易成本使其更容易获得贷款。同时,商业银行认为私有企业因产权结构不清、管理不善、固定资产有限等原因存在过高风险,而不愿意为其发放贷款。作者认为,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的观念也使得银行更加倾向于国有企业。

其次,企业规模是银行信贷另一个不成文的规则。私有企业一般为中小企业,也被认为是信贷风险最高的,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风险较小。

另外,企业所在的产业部门也是规则之一。银行会给予国家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以尽可能优惠的贷款条件,这也是国有商业银行间最激烈的业务竞争。

作者认为,这些不成文的信贷规则并不能证明国有商业银行存在借贷偏向。但是,这些规则确实为银行职员提供了寻租机会以利用监管漏洞攫取个人利益。银行可以通过两种方法绕开正式的信贷政策贷款给国有企业:将贷款拆分成若干部分以逃避总行的审批;使用虚假的财务报告以达到正式的信贷标准。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企业必须向税务部门提交一份准确可信的财务报告。但是商业银行无权查阅这些文件,所以不得不通过企业提交的文件来评估财务状况。这样企业就可以通过行贿信

贷经理等方式使用伪造的财务报表以取得贷款。例如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就曾以虚假财务报表取得了大量银行贷款。

同时,为了降低不良贷款率,银行会通过“中间企业”将贷款间接贷给几乎无偿还能力的企业,这些“中间企业”通常是财务状况较好的国有企业。“中间企业”再通过借款或者预付款等方式将贷款转移给借款企业。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方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经常有各种办法绕开中央政府的规定。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中央银行一直无法管住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信贷。

作者还认为,不成文的贷款规则为什么可以存在值得深入的研究。为什么银监会不规定贷款企业必须提供与纳税时相同的财务报告?银监会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有利于防止不良贷款产生,为什么不这样要求是否是出于政治考虑,以防切断对处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资本支持?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 Yeung, G. (2009). How banks in China make lend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59), 285-302.

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的意图与顾虑

◎ 韩笑

近年来，中国积极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以推进贸易自由化。2002年，中国与东盟（ASEAN）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ACFTA）。随后，又分别与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瑞士等发达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中国正在与挪威、韩国等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并着手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磋商。

阿肯色大学政治学教授 Ka Zeng 认为，中国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协定来提升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大海外市场，获得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资源，同时避免被排除在贸易自由化的

大门之外。而且，北京希望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为贸易外交提供新的沟通渠道，并通过贸易自由化调节国内市场化进程。

作者提出，中国在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积极行动是基于战略、经济和竞争因素驱动等三种原因。其一，中国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提高自身影响力，以制衡日本和美国，并意在争夺地区领导权。其二，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帮助中国提高贸易总量、改善与贸易伙伴间的摩擦以及带动国内经济的产业升级。其三，受到日本、韩国等邻国的刺激，中国追求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被认为是在未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抢先占据有利地位。

不过，中国在推进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一直有着务实的考量。首先，不同贸易协定所覆盖的范围和形式存在很大差异。与香港和澳门签署的 CEPA 条款全面而具体，而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协议则相当模糊。其次，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贸易协定。从发展中国家入手，然后再与发达国家进行谈判。同时，中国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规定履行的义务较少，排除了很多敏感问题，诸如知识产权保护、争议仲裁机制、环境及劳工条款等，所以相对质量不高。所以，作者认为，中国是在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

研究进一步表明，虽然中国积极参与多边贸易协商（如 WTO、APEC）但是目前影响力有限，所以中国领导层希望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双边贸易框架来更好地实现本国利益。另外，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贸易谈判寻求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例如，新西兰在贸易谈判中同意放弃中国“入世”时附加的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歧视性条款，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发达国家。

除了这些外部因素的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同样影响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当时国内对于加入 WTO 的政治博弈不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涉及的参与者较少，也没有了“入世”后的政治象征意义，所以决策者更倾向于满足国内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需求以减小改革成本。

在“入世”后，国内农产品价格在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下不断走低，农民收入也随之下降。这使得农产品成为贸易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中国不肯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大幅开放农产品进口，也证明了中国领导层担心过快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给农民带来的损失。在服务业领域，诸如电信、交通运输、金融等国有企业主导的关键行业的开放，也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也限制了中国所签署的贸易协定的范围和深度。

作者认为, 贸易谈判的机构安排也使得其更容易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商务部是负责贸易谈判的主要部门, 但是其需要与代表各行业利益的政府其他部门不断博弈。贸易、投资及产业政策的权力分散极大地限制了商务部在谈判中的决策权, 也使商务部很难说服其他部门。

参考文献

- Zeng, K. (2010). Multilateral versus Bilateral and Regional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laining China's pursui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FT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66), 635–652.

中国和巴西：在非洲角逐的策略异同

◎周航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崛起中的大国在非洲大陆发展合作领域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来自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与未来农业组织(Future Agricultures)联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关注中国和巴西在数个非洲国家进行的农业发展合作项目,希望通过具体的国家个案研究来解析这些项目的运行模式、实践、话语及隐藏的权力结构关系。莫

桑比克是该项目选取进行研究的国家之一。

巴西在莫桑比克

截至 2011 年，巴西在莫桑比克共设立了 21 个技术支持项目，莫桑比克因此成为巴西在非洲地区技术合作项目最多的国家。巴西大型私企也在莫桑比克建筑和采矿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农业方面，巴莫合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名为 ProSAVANA 的项目——该项目将改造莫国北部三省纳卡拉走廊的 1400 万公顷土地，使其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区，以解决莫国粮食安全问题。这一项目的灵感实际上来源于巴西自身的农业发展经验——巴西在日本的支持下，用时 30 年将本国热带稀树草原地区改造成高产的农业种植区，也因此一跃成为世界大豆主要生产国。

通过实地调查具体的合作项目，作者发现巴莫农业合作主要由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巴西方面参加到双方农业合作的机构众多，而且对合作的目标和期许不尽相同；二是合作的形式大多是长期的能力建设项目，且注重复制转移巴西自身的农业政策元素；三是注重三方共同合作，譬如巴莫农业合作中常有日本国际援助机构

(如 ProSAVANA 项目) 和美国国际发展署的支持; 最后是双边的农业发展合作吸引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参加。

中国在莫桑比克

近年来, 中莫双边政治经济联系发展迅速。2010 年, 中国对莫桑比克工业的投资占其外国投资总额的 71%。中莫的农业合作也需要放在双边经贸投资领域合作的大视角下观察。中国向莫国发放了 5000 万美元的优惠贷款以改进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并于 2012 年同意为莫提供 6000 万美元的信贷以发展当地一农业加工集团。

此外, 中国在当地也有数个农业发展和投资项目。例如, 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决定设立的农业技术展示中心——项目由湖北省农垦局负责承建, 占地 52 公顷, 旨在承担起农业科研, 培训, 生产和技术示范的职能; 又如, 目前由湖北省万宝粮油股份公司投资运营的 Xai-Xai 灌区。

在中莫农业合作中, 不同层次的官员所持观点有所差异。政府高官往往称赞双边合作, 认为可以帮助填补当地农业技术的缺

失。底层官员,包括在中国农业技术展示中心工作的当地人则有所保留,认为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双方沟通困难,交流不足。不过,在莫的受访者都对中国人的工作能力和纪律性表示钦佩。

中巴对莫农业合作有何异同?

通过回顾和比较中国和巴西在莫桑比克的农业合作,作者发现两国都热衷强调自己曾是受援国的身份,因为这能给予两国更多的道德权威,使得它们可以将各自的对外援助描述为以需求为导向,并与传统援助的赐予观念和附加条件的援助方式区分开来。两国都视发展合作为各自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但是,相较巴西而言,中国在发展合作上更加强调商业因素,认为这是一种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中国和巴西也都认为各自国内的发展经验对莫桑比克有可借鉴之处。两国的农业发展经验都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和私人资本的辅助角色。

然而,作者特别指出两国在改造本国农业所具体采取的途径则大为不同。巴西大面积积极改造利用国内的热带草原,外加大大

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转变成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的主要成就则是在缺乏可耕地但劳动力富裕的情况下,成功解决了大量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

中巴相异的农业发展成功史也解释了它们对莫桑比克农业发展不同的理解。受访的中国人往往认为莫国低下的农业生产效率是由于当地人未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而巴西受访者则更加倾向于强调莫国需要持续的投资和更多的创新进取精神,以克服自然地理环境对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中巴对各自农业发展经验的肯定也表现在:受访的中国和巴西人往往认为他们有很多知识可以传授,而并未将援受双方看作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作者认为,这似乎有违中巴强调的南南合作的初衷。莫国高层官员认为中巴强调的以技术发展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是当地未来农业发展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和巴西看成是技术和资本的重要来源地。但是莫国地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则对当地农民是否能从农业合作项目中具体获利有所保留。

此外,作者也强调由于历史和语言上的亲近,巴西的援助人员被认为更为随和及开放,巴西的合作项目也更容易被视作符合当地

的需求,这也与巴西的文化产品在当地受欢迎有关系。而中国的农业合作项目在莫国口碑难免受当地人对中国整体印象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当地的建筑、零售、资源开采和农业领域工作。莫国大众一方面钦佩中国人的勤劳苦干,但是由于语言不通,当地人也略有耳闻中国“奇怪的”文化和饮食习惯,这使当地人对中国既感好奇有趣,也有怀疑不解。

参考文献

- Chichava, S., Duran, J., Cabral, L., Shankland, A., Buckley, L., Lixia, T., & Yue, Z. (2013). Brazil and China in Mozambican Agriculture: Emerging Insights from the Field. *IDS Bulletin*, 44(4), 101–115.

孔子学院：文化推手的经贸意义

◎ 陶郁

自 2004 年 11 月 21 日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成立以来，截至 2013 年年底，全球已经建立了 440 所孔子学院，分布于 115 个国家和地区。

孔子学院甫一建立，就受到了中外媒体和研究者的大力关注。不过，关于孔子学院的讨论，除针对其本身的运作情况和教学效果外，主要聚焦于该机构与中国外交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然而，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大学教授连大祥（Donald Lien）与合作者最近发表的系列论文，却指出孔子学院同样会影响中外经贸关系，而这种影响又受制于孔子学院所在地的具体情况，其机制和模式都比较复杂。

连大祥等学者的研究始于对孔子学院在全球分布情况的计量

分析。他们认为,孔子学院作为语言文化机构,其选址必然要考虑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往往又缘于当地民众学习外语的成本和收益。同时,设立孔子学院,必须取得国家汉办批准,孔子学院也受到国家汉办补贴,因而其选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 1998 年至 2008 年间的相关数据建立统计模型加以分析,连大祥等学者发现,孔子学院往往更有可能建立在那些对华进口额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此外,在控制住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总体 GDP 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官方语言为英语、距离中国较近以及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更有可能建立孔子学院;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额度以及官方语言与中文在源流关系上的远近,则不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建立孔子学院的可能性。

那么,孔子学院建立起来以后,对于当地民众的经济效应有何影响呢?连大祥发现:孔子学院建立后,不仅对于所在国家或地区民众个人的中文学习成本和收益有所影响,而且与当地此前存在的中文学校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具体来说,孔子学院的建立,会改变当地中文教学市场的供求结构,吸引部分原本自学或者在其他机构里学习中文的生源,并增加当地学习中文的总人数。如

果当地中文学校先于孔子学院建立,当面临孔子学院竞争而可能造成的生源流失时,往往需要降低学费加以应对。

孔子学院对于中国外贸的影响模式,则相对比较复杂。通过测算建立孔子学院对于中国向所在国家和地区出口额与直接投资净值的影响,连大祥等学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孔子学院建立之后,往往能够有效促进中国向相关国家或者地区的出口额与直接投资净值;同时,相对于出口贸易,孔子学院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影响更加显著。然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孔子学院却无助于扩大中国的出口与投资。

连大祥等学者认为,出现上述差别的原因,主要在于发展中国家原本对中国了解甚少,孔子学院能够为海外学生提供教育支持,也能为商业人士打开市场,从而在短期内就能减少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而发达国家往往已经对中国具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因而孔子学院的效果相对并不显著。

虽然孔子学院对于中外经贸关系的影响,更为明显地呈现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但通过对于美国各州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连大祥等学者也发现:在发达国家内部,建立孔子学院的地区,在对华出口额方面的表现,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具体来说,对于2006年至

2010 年间美国各州对华出口额数据的研究显示,在控制住主要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每新增一个孔子学院,都能给所在州带来 5% 到 6% 的对华出口增长,这说明孔子学院也能给美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

可见,以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为直接目标的孔子学院,其影响力却不仅局限在文化领域;相反,这一机构对于中外经贸关系也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子罕言利”;然而,连大祥等学者对于孔子学院经贸意义的研究,却再次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国际舞台上,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往往是相互交织而密不可分的。

本文已刊发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出刊的《青年参考》

参考文献

- Lien, D., & Oh, C. H. (2012). Determinant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Establishmen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College of Business Working Paper Series*.
- Lien, D., Oh, C. H., & Selmier, W. T. (2012). Confucius institute effects on China's trade and FDI: Isn't it delightful when folks afar study Hanyu?.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1(1), 147-155.
- Lien, D. (2013). Financial effects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on Chinese language acquisition: Isn't it delightful that friends come from afar to teach you Hanyu?.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4, 87-100.
- Lien, D., & Co, C. Y. (2013). The effect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on US Exports to China: A state leve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7, 566-571.

市场还是政治？北京现代崛起的逻辑

◎ 邵立

北京现代汽车成立于2002年，仅用了三年时间便成为中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传统的市场理论认为，这是因为北京现代刚好赶上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天时”，而且正逢中国国内小客车市场迅速扩张的“地利”，再加上现代集团优秀管理战略的“人和”，才造就了这个“现代速度”。不过，任教于布林茅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助理教授吴承云（音译：Seung-Youn Oh）反驳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北京现代进入中国很晚，当时已经有很多汽车厂商都拥有这样的优势条件，但只有北京现代发展如此迅速，这用传统理论是解释不通的。因此，在最新一期的学术期刊《中国季刊》上，

她探讨了北京现代成功背后的政治逻辑。

北京现代是韩国现代集团和北京汽车集团（北汽）的合资企业。在北京现代成立之前，北汽正面临着困境：此前和美国公司合作的北京吉普（北吉）濒临破产边缘，中央政府正希望将北汽和一汽集团合并。但北京市政府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汽车企业，因此致力引入现代汽车集团，并给予其一系列优惠政策。对现代集团来说，北汽的政治背景很可靠，可以弥补自己进入市场晚的缺陷，也能提高自己和中国政府谈判时的地位，减少进入中国的不确定性。因此现代与北汽一拍即合。

吴将北京市政府的政策分为两面。

一面是“保护主义”。北京市政府将价值 1600 万的北京轻型货车厂的土地和基础设施以 500 万的低价卖给现代，并为现代招聘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工。在第一批索纳塔刚落地的时候，北京市政府便用行政命令买下全部 2000 辆汽车，分配给出租车公司、市政府和警察等企业机关。此外，北京要求在 2008 年奥运会之前更新七万辆出租车出租车。在索纳塔还没有上市之前，北京交通局出租车管理处便宣布将中型索纳塔定为政府选定的“标准车型”。尽管这项规定受到了其他汽车厂商的抗议而未能完全实施，但从 2005 年到

2007年，依然有三万四千多辆出租车被更换成现代系列，占总数的60.5%。作者认为，北京市的做法正是钻了世贸协定的漏洞——尽管世贸对国际贸易有所规定，但却不能管制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壁垒。中央政府也曾有打击地方主义的行动，却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中国并没有签订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该协议规定政府采购招标时需要公平对待国内和国外企业）。因此，地方政府能“合法”实施保护主义，并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规避保护主义的指责。而外资企业（现代）也能依靠这种保护获取利益，自然乐享其成。

另一方面，吴认为北京市政府在供应链方面实施了“自由化”政策。零件配件供应商与汽车产品质量休戚相关。在1980年代第一轮引进外资时，中央政府规定了汽车零件生产本地化的政策，要求第一年40%的零件做到本地生产，第二年60%，第三年80%。然而，本地企业的生产技术跟不上这种快速的本地化，因此损害了汽车的质量，这也导致北京吉普失败。北京市政府接受教训，给予现代集团更大的选购零件自主权。尽管北京现代在2003年做到了68%的本地化，2009年更达到94%，但这种本地化和之前大有不同：此前指的是中国本地企业生产零件，而北京现代的“本地化”

实际是把韩国的零件制造企业搬到北京，移植成“本地公司”。这既保障了现代汽车的质量，也减少了成本。不过，这种“本地化”的利润并不属于北京现代集团，都被韩国公司赚取，中国企业未能分到一杯羹。这也导致了北汽和现代之间一度关系紧张，使北京现代的销量下滑。

作者总结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为北京市政府扶持现代的做法提供便利。一方面，北京利用世贸的漏洞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另一方面，在供应链上采取自由化的政策，引进韩国原配件生产企业，这种自由化成功避免了政治上的批评。因此，尽管中央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受到了世贸协议的制衡，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却得到加强，能够灵活利用保护主义和自由化来促进本地汽车产业发展。她把这种现象称为“碎片化的自由化”（fragmented liberalization）。而现代集团作为跨国公司，也没有起到理论上的促进中国市场自由化的作用，而是依附在这种碎片化的自由化政策之上谋取利益。

参考文献

- Oh, S.-Y. (2013). Fragmented Liber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Automotive Industry: The Political Logic behind Beijing Hyundai's Success i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hina Quarterly*, 216, 920–945. doi:10.1017/S0305741013001070

中国银行建立史：政权更迭背后的利益纠葛

◎ 王韬

在清王朝和中华民国的权力利益交接中，围绕央行的建立有一段值得讲述的历史。

彼时，在大清银行基础上成立的中央银行，就是今天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百年以来，中国的政权虽几经更迭，中国银行却一直存续至今。政权与金融关系之密切，从这段历史中也可窥得一二。美国加州理工州立大学的学者 Georgia A. Mickey 在她的论文中追溯了这一段历史。

对于一个新成立的政权而言，成立中央银行是塑造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在中国主权已经遭受外来势力不断侵犯的清末民

初,这一点尤为迫切。但是,偌大一个央行可不是凭空建立的,钱从何处来?由谁来管理?大清银行已随帝国倒塌丧失了合法性,其遗留下的财产负债如何清算?是否保障旧有股东和存款者的利益?这些都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难题。

公私共有的大清银行

中国并非自古就有央行,大清银行是19世纪末光绪变法图强运动的产物,既然要模仿西制,金融体系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光绪三十年春(1904年2月),大清户部奏请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次年八月,户部银行在北京建立,行大清中央银行之名,以张允言为总办。

1908年7月,户部银行正式更名为大清银行,度支部(即户部)厘定《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确定大清银行中央银行之职。中华大地上终于有了第一个名义上的中央银行。虽然已经晚于欧洲诸国和日本几十年,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清的央行的建立倒也并不算晚,要等到今日在全球经济呼风唤雨的美联储成立,是五年之后的事情了。

然而,大清银行名为央行,实际上并没有今天央行实施货币政

策的职能,主要是度支部用来存钱取钱、调配财政资源的隶属机构,此外还作为商业银行,接受私人储蓄。模仿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日本央行,大清银行为公私共有,接受私人投资者作为股东,在治理结构上与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有相似之处。大清银行建立的初始资本银为四百万两,分为四万股,度支部认购一半,其余由商民认购。

大清银行的股东由朝廷的官员和私人股东共同组成,自1907年起,每年召开会议,选出银行的总督、监事等职位,他们大多是朝廷官员,九名股东中有八人都有官衔加身。起初,私人股东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力十分有限,除享受分红权利外,私人股东的权利不过是参加股东会议而已。但此后几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私人股东群体影响力日渐增大,这成为日后推动大清银行向中国银行过渡的基础。

前朝股东与革命势力角力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大清银行随王朝覆灭而濒临倒闭,除上海分行外各地分行都纷纷停业,私人股东们的商本岌岌可危。在此情势下,上海的私人股东们在1911年成立了大清银行股

东联合会，这一组织随后更名为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大清银行的私人股东们希望以联盟之力保自身全在大清银行的权益。

1912年1月，商股联合会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新的中央银行最宜以大清银行为班底改组建立，并且应在新的央行中保留其在大清银行私人股份，认为此举“匪徒收事半功倍之效，抑实寓保商恤民之意”。上书象征性地陈述了金融对建国工作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建立央行对树立新政权信用之必要，相较之下对大清银行的清王朝背景则轻描淡写——他们深知，共和政府使用推翻帝国的机构建立新机构，其中有不合宜之处。此外，请愿书也没有提及普通存款者的利益。

与大清银行竞争的是革命军在1911年创办的中华银行，孙中山受邀担任主席。但是随着孙中山承诺让位给袁世凯，革命同盟势弱，大清银行股东的势力理所应当地占据上风。商股联合会得提案也获得了新近任命的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陈锦涛的支持——陈在金融银行业享有很高威望，获袁世凯支持，也曾是大清银行的股东。在他的力推之下，孙中山于1912年1月24日颁布总统令，宣布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行中央银行之职。

然而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利益之争并未停止，革命联盟一方

面全力竞选政府席位，另一方面破坏大清银行的形象，甚至不惜采取不正当手段。1912年3月24日，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以贪腐为名逮捕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宋汉章，这实则是莫须有的罪名。这些冲突是辛亥革命后革命势力和帝国旧有势力利益博弈的一个缩影。总统令颁布后，联合会迅速组织力量筹建新央行，随后召开临时理监事会，八十多位股东参加讨论中国银行事宜。2月1日，新的中国银行正式成立，吴鼎昌被任命为第一任行长。

几经周折终如愿

不过随后上位的袁世凯对此事体现出了不同态度，事态随之变化。商股联合会不得不两度上书袁世凯内阁的财政部长熊希龄，再陈保留中国银行股份权益之请求。熊希龄拒绝了该提议，认为国家初建，时局不稳，央行不宜贸然招股，这有损国家信用。作为替代方案，熊希龄答应会如数偿还股东本息，但是因为政府手上无钱，不得不采取多年还清的办法。从股东变成存款者，商股联合会的失望可想而知。

大清银行清算是事态的再一次转机，按规章中的清偿顺序，大清银行存款者在先而股东在后。熊希龄的继任者周学熙清楚这一

点。1912年8月,商股联合会上书周学熙,周随之修改了熊希龄在任时期的规定,重新赋予大清银行股东换取中国银行股份的权利。在随后递交国务院的报告中,周提出,为了使民国政府树立信用,政府理应全部承担大清银行商民所受亏损。由此也可看出,虽然几位当事人在中国银行组建的问题上诸多纷争,但针对民国政府通过清偿大清银行商民损失而树立国家信用的考虑上倒是颇为一致的。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岌岌可危的清帝国轰然倒下,中华民国成立,这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历史。不过宏大的叙事总让真实的历史过于简单化,它略去了政权更迭背后复杂的权力交接和利益博弈过程。改朝换代虽然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新体系下的利益关系却不得不以旧有体系为基础,其间利益纠葛反复,绝非只言片语所能讲清楚的。中国银行建行的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辛亥革命后的各种势力利益博弈的复杂之处,历史无绝对的对错,这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应该谨记的道理。

参考文献

- Mickey, G. A. (2012). "Safeguarding National Credibility": Founding the Bank of China in 1912.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7(2), 139-160.

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体系： 中投与国家外管局之间的竞赛

◎ 韩笑

今年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首席投资长朱长虹的低调离职引来媒体热议。有评论认为，这位曾经供职于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业操盘手的离去，标志着过去四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战略的失败。

外汇储备投资夹杂着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利益，一直备受关注。为运作存量已经超过 3.8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建立了怎样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体系？

Sarah Eaton 和张明两位学者试图解析政府应如何处理主权财富基金体系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委托人（全体国民）与代理人（主权财富基金经理）之间的非对称信息问题。他们认为，有两

个因素对主权财富基金体系产生重要影响：一是政治权威的集中性，二是透明度和问责机制。

在政治权威较为集中，同时具有很强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国家，可以采用政府直接监管和信息公开披露的混合管理模式，如新加坡的淡马锡（Temasek）和政府投资公司。

而在政治权威集中但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国家，则主要依靠政府的监管，如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ADIA）。

在政治权威相对分散但透明度高、有较强问责机制的国家，可以依赖主权财富基金公司内部的管理机制，如挪威的政府养老基金。

在作者看来，像中国这样存在“碎片化的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同时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的国家，则应采用“锦标赛”（tournament）模式来管理主权财富基金体系。而中国领导层对于中投（CIC）和国家外管局（SAFE）之间相互竞争的默许态度恰好验证了“锦标赛”管理模式的假设。

中投一直被认为是央行和财政部之间官僚政治斗争的产物。起初，设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建议曾引起激烈争议。央行下属的国家外管局认为外汇储备投资理应是自己的管辖范围。同时，财政部也

认为自己有权成为基金的监管者，并提议仿效国资委设立金融国资委。但是，这一方案最终并没有被采纳。领导层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外汇储备投资公司，即中投。2007年，财政部发行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购买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将其注入中投。

为了偿付高额的国债利息，中投一边从国有金融资产体系中吸纳资本，一边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股权投资。2007年底，中投从央行手中正式购入汇金公司。此前汇金公司利用外汇储备投资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同时，中投大手笔投资海外金融机构，如黑石、摩根士丹利、JC弗劳尔斯等。但在次债危机的冲击下，均损失惨重。

在面对利息偿付压力的同时，中投还面临着来自外管局的激烈竞争。领导层还不时将其与国家开发银行和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表现相比较。这一比较的结果将很可能决定中投能否继续获得外汇储备的大量注入，同时也是该系统内官员晋升的重要参考。这正是“锦标赛”管理模式的主要奖励机制。

外管局之前一直以投资美国国债等低风险、低回报、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为主。但在中投成立后，外管局大幅增加了对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的投资，相继大手笔投资了澳大利亚三家商业银行、全球

第四大石油天然气公司法国道达尔以及包括英国石油公司、巴克莱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在内的超过 40 家英国上市公司的少数股权。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管局的投资同样遭受了巨额损失。

随后，中投和外管局纷纷调整投资战略。中投逐步涉足矿业、环保产业、能源业等多种产业并大幅减少了单笔的投资额度，成为更加稳健、规避风险的机构投资者。外管局则恢复了保守的投资风格，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等低风险金融资产。文章特别指出，当初外管局决定聘用朱长虹成为首席投资长恰是其决心与中投一决高下的标志。

最后，作者认为，虽然中国政府选择了一种与其管治能力相匹配的主权财富基金体系，但是中投与外管局在股权投资中带来巨额损失的激进轻率举动，表明中国领导层还未真正掌握“锦标赛”管理模式的技巧。但是，在领导层不断强调分散美元资产投资的要求下，二者的竞争必将进一步加剧。

参考文献

- Eaton, S., & Zhang, M. (2010).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of China's Sovereign Wealth System: Byzantine by Desig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7(3), 481-506.

中国经济究竟比印度领先多少？

◎ 王韬

中国和印度值得一比，不过长期以来，国内主流舆论和政策界对印度的关注有限，公众对印度也多停留在贫穷、基础设施差、软件业发达等一些粗浅的印象上。很多人都不认为印度经济短期内会超越中国。

但两国之间到底差多少？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两项研究，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作了对比。研究显示，中国虽然在大多数指标

上的表现的确优于印度，但两国经济发展路径的差异并不显著，而是存在很多共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和印度两大经济体相继崛起，位列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列。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也表现不俗，先于发达经济体实现复苏，重回快速增长轨道。印度经济虽然在最近再次震荡，增速大幅放缓，但从更长的历史看，印度经济还是保持了高速增长。

增长动力：中国持续高速投资的利弊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两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自何处？

衡量描述经济发展来源的模型有很多，其中最常用的是梭罗经济增长模型。按照这一模型，经济学家 Barry Bosworth 和 Susan M. Collins 将中印两国劳动生产率（而非 GDP）的提高分解为三个因素的作用，分别是资本深化、教育水平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资本深化就是增加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数量，教育水平则用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则综合反映了经济生产效率，或者理解为要素的使用效率。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 1978 年，有关印度的经济改革的年限有

争议,但大多观点指向1993年。以此作为标准,上述研究不仅关注了1978-2004整个时间段,还分别对1978-1993和1993-2004两段时间做了研究。

整体而言,两国在26年间的经济增速都很快。中国经济平均增速为9.3%,印度经济比中国慢,但平均增速也达5.4%,而且在第二个时间段明显提速。两国就业率在三十年内都稳步提升,增速均为2%。

经济增速的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上述研究发现,中印在教育水平(或者说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方面差别不大。而在资本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两方面,中国都有绝对的优势,在第二个阶段进一步提速,人均资本增速从2.4%增长到4.2%,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从3.5%提高至3.9%。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之后有明显加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达到2.3%,超过东亚其他国家,却远不及中国。

此前的很多研究也都证明,中国经济通过提升效率带来了增长红利,这源自广泛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但是,两国在投资速度上面的差别则凸显出各自的结构性问题。持续高速的投资的确拉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过分依赖投资也成为中国增长模式的最大

风险。相比之下,印度则投资不足,年平均增速只有 1.3%,低于东亚诸国。

产业结构: 印度跳过制造业的后果

通常情况下,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结构转型是从农业至制造业,再到服务业。这一转变不仅引起产业部门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变化,还伴随着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部门间转移。中国就基本遵循了这一路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 1978 年的 28% 降到 2004 年的 9%。制造业大幅增长,服务业比重上升,大量的农业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部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占总劳动人数的比重到 50% 以下。

印度则走了不同的道路,跳过制造业,直接跨到了服务业。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贡献超过 50%,但是印度的优势——软件业等不是劳动力密集型,加上对劳动力素质要求很高,劳动力无法大量转移至服务业,能吸收劳动力的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却增速缓慢,远不及中国。这导致的后果是: 直至目前,印度超过一半的人口仍然在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而印度的传统强项服务业与中国相比的优势也开始缩小。自 2004 年起,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就已

超过印度。

中国经济更早起飞,也可能更早减速

无论从增长来源还是产业结构看,中国似乎都绝对领先。但是这些对比中,中印两国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印度经济改革始于1993,中国则始于1978年。若能将开始改革的时间作为起点进行对比,或许有一样的发现? Manmohan Agarwal 和 John Whalley 两位经济学家在他们的论文中做了这样的尝试。

两人发现,在各自经济改革后的二十年间,两国很多关键指标都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比如,两国人均收入的增速自改革后的第二个十年开始趋同,出口贸易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的变化也开始趋近。有趣的是,在改革实施后的前十年,两国FDI(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很低,到后十年间,中国的FDI比重才迅速攀升,大幅超过印度。因此作者推测,FDI对经济早期起飞的贡献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这些发现当然没有否定中国在整体经济绩效上的优势,却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国比印度发展更快不仅是因为中国做得更好,也因为中国更早实施改革。其实在中印两国的经济比较中,与其过

分关注印度何时能够超越中国,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体制截然不同的后发经济体在经济起飞路径上的异同之处。以各自改革起点为锚做对比,是对单一维度的比较研究一项有益的补充。

中国经济更早起飞,也可能更早减速。虽然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在增速、稳定性等指标方面都比诸多新兴市场国家表现更好,但是,那些曾经带来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其实两项研究已经证明:继续改革才是关键,对中国和印度都是如此。

参考文献

- Bosworth, B., & Collins, S. M. (2007). Accounting for Growth: Comparing China and Indi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Agarwal, M., & Whalley, J. (2013). China and India: Reforms and the Response: How Differently have the Economies Behaved.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跨国企业恶化腐败现象

◎ 邵立

政见团队曾经介绍过宾大教授王裕华的论文,其中提到:境外企业行贿现象不如国企、民企严重。但境外企业(或称跨国企业,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是不是对贪污腐败没有一点“贡献”呢?来自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的 Zhu Boliang 教授的答案是:“不。”

在今年二月份的普林斯顿国际关系研讨会上,他发表的论文表明:在中国,跨国企业实际上也乐于与腐败官员勾结。

他的理由如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很多机会进入那些尚未开发的市场。他们通常因为手握独到的技术和专利,相对本地

企业占有绝对的优势。但专利本质上是公共产品,也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持,国内企业也会逐渐掌握相关技术,外企的优势难以长期保持。这时,如果跨国企业想保持自己垄断性或寡头性的地位,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不断引进新技术和资本保持自己的市场竞争力;二是通过游说或者贿赂政府来阻止其他企业进入与其竞争。

因此,跨国企业的活动实际上创造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如果他们从不平等的市场竞争之中获得的利润要大于打点政府官员的贿赂开支,这种权钱交易便具备了进行的逻辑。

作者认为,要证明跨国公司能加深腐败现象,就要观察跨国资本越密集的省份,其腐败现象是不是也越严重。那么,各省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该如何衡量?他搜集了1998年到2007年全国各省市检察院有关腐败立案的数据,重点观察(1)涉案总金额;(2)破案后挽回的损失金额;(3)是否有高级官员(县处级或以上)受到制裁。但是,只依靠这个客观数据来源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一个省的贪污案例多,不一定是因为贪污现象更严重,还有可能是因为该省反贪工作更有效。

作者采取两个办法来把反贪工作的效果清除出他的模型。一是尝试通过测量各省的反贪工作情况,以便在回归分析模型里控

制这个变量。作者估计,如果某省领导人和中央关系越密切,在中央工作时间越长,那么他们反贪的意愿也越大;直辖市的反贪力度比其他省和自治区更大;公众对法院系统越信任,该省的反贪力度更大。

另外,作者引进“主观”的数据,即2008年 *Asian Barometer Survey*里对中国人腐败感知的调查结果作为参照。最后,和王裕华一样,他也使用了跨国企业的娱乐招待费开支作为其行贿金额的参考数据。

通过回归分析,作者发现,反贪工作的效果的确和贪污情况成正相关。一个反贪得力的省份,通常拥有中央“空降”的领导人,公众对其法律系统也更信任,而直辖市的确比普通的省份反贪效果更好。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作者发现,跨国企业越活跃的地区,贪污案件的涉案金额就越大,人均腐败损失金额越高,高级官员涉案的几率也越高。而这些“高外资-高贪污案件”省份并不见得反贪工作很给力。因为主观数据表明,在外资集中的省份,人们对腐败现象的感知并没有比其他省更少。

在跨国公司越活跃的省份,企业花在娱乐招待费上的比率也最高。娱乐招待费比例越高的外企,企业规模越小,而且更倾向于

和国企、政府做生意。有趣的是,研究投入更多、技术密集型企业 在娱乐招待费的花销也更大。而港澳台企业和国外企业在行贿 上的表现,并没有显著的不同。这意味着:一个典型的行贿的跨 国公司,会是一个以国企和政府部门为销售对象的规模有限的技 术密集型企业。

王裕华的论文认为,跨国企业一般受制于母国、母公司比较规 范的会计制度,因此行贿的可能性较小。但 Zhu Boliang 的这个研 究发现证明了这些企业依然不能对腐败免疫。它们会积极地利用 中国不完善的市场制度进行寻租。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 足以证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只起到负面作用。这些跨国企业具 体如何行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 Zhu, B. (2014). MNCs, Rents and Corru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Princeton IR Faculty Colloquium*.

社会

商业化和新技术让新闻变得更糟糕？

◎ 郭毅 / 特约观察员

媒体的商业化和互联网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的新闻业，乐观者认为这带来了自由，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 Emily Chua 却认为：它们同样对媒体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了新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脱节。

作者指出：在西方学术界，较之国家权力的控制，学者们更关注商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大众传媒提供给人们的并不都是政治参与的必要信息，而往往是娱乐甚至麻痹人们的内容。与此同时，互联网这类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也给新闻行业带来了危险——记者和编辑们的工作的确因为技术变得更

为便利,但是他们也变懒了,不再那么频繁地亲临现场采访。

作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大众传媒同样出现了这些症状。她在2009年至2011年间开展了为期18个月的田野调查:她在北京的一家小媒体工作,观察研究了新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在中国当下的媒体产业中,时间本身成为了商品:越及时的报道,将会带来越丰厚的经济效益。因此,网络成为了新闻发布的最佳平台,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的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占。作者发现,很多纸媒只能通过对已经出现在网络上的新闻进行筛选,从而满足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筛选!这是报纸现在唯一的功能了!”作者工作的那家报社的领导曾经这样说。她观察到,新闻事实本身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包装”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包装”的目的是建构“品牌”:一份报纸、一本杂志必须有其鲜明的定位,才能吸引特定的读者,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这是当下传统媒体的生存之道。即使是党报,也必须依靠商业层面上的优势、品牌塑造上的亮点才能够在时代大潮中立足。

作者记录了一次具体的新闻报道过程。她和另一位记者搭档去采访一位因为住房问题而引起关注的老人。但问题在于,那位记者选择老人作为采访对象的原因并不是事件本身需要被报道,也

不是这位老人需要被关注，也不是这个社会问题需要被揭示，而仅仅是因为这条新闻在网上已经累计了极高的关注度，因此追踪这个老人是有“价值”的。而就在一段时间之后，当那位老人再次联系媒体时，已经没有几位记者愿意参与报道了——事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变化的是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作者看来，当利益逻辑主宰新闻产业之时，新闻工作者将会更多地考虑他们的报道是否能够胜过其竞争者的报道，而不再认真思考这份报道与现实世界、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作者还认为，信息技术给新闻界带来的危害不小于商业化。当一位记者每天的工作是从打开笔记本电脑浏览新闻开始，当他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进行采访时，新闻已经发生了质变：记者们的工作仅仅是重组信息，他们的写作过程并不与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发生关联——他们的作品与他们所身处的世界是隔绝的。作者认为，她在这家报社的同事们笔下的“中国”不是他们生存的真实的中国。

作者继续发问：当商业化与信息化持续高歌猛进，当新闻业继续以滚雪球的方式生产泡沫一般的“事实”，我们这些生活在信息狂潮中的人会不会成为《黑客帝国》中那一个个由程序代码编

织而成的“虚拟”的“信息人”？或许，这是这位人类学博士花费 18 个月进行田野调查并最终写作此文的问题意识所在。

但是，这项研究的缺陷也很明显。基于对一家并不典型的报社进行田野观察而得出的结论是否可靠？她是否过度阐释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不过，她的提醒是有启发意义的：对于新闻媒体来说，商业化和新技术并不总是值得欢呼的东西。

参考文献

- Chua, E. (2012). Rethinking the Chinese Popular: Commercial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News Media after Mao.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48-72.

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既要自主创新，又不放弃国际合作

◎ 宿亮

什么是“技术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对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技术民族主义”这一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莱许（Robert Reich）1987年率先提出的。他当时在一篇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应该采取措施，以防今后技术突破的机会被日本人夺走，这种尝试就是“技术民族主义”。

莱许从美国角度出发，认为霸权国家应保护其技术前沿地位。政治学学者随后对这一定义进行演绎。有学者把“技术民族主义”定义为：相信技术是国家安全的最基本条件，必须实现技术本土化才能让国家富强。另外，不少学者把这一概念与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联系起来，称“技术民族主义”是亚洲国家破除对西方技术

依赖的一种愿望。

“技术民族主义”包含若干要素。

首先,认为技术竞争非常关键。这与“技术全球主义”正好相对——全球主义更多把技术看成国际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国际竞争的焦点。

其次,“技术民族主义”务实灵活。在追求民族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国家倾向于混合民族主义政策和自由化政策。不少学者给“技术民族主义”贴上各种标签,如“开放技术民族主义”、“工具性技术民族主义”等等,它们意味着国家政府愿意引入高技术外资或国际技术开发合作,以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那么,中国有没有“技术民族主义”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学者安德鲁·肯尼迪(Andrew B. Kennedy)发表论文《中国找寻可再生能源:务实的技术民族主义》,从能源领域分析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

肯尼迪认为,中国技术发展的“拐点”在21世纪头十年。此前,政府提出建设“国际创新体系”,主要集中力量在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为推动国外高科技企业进驻引发技术“让渡”,在高科技领域政策开放。随后,从2002年制定、2006年公开发布的《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可以看出，中国力争发展自主技术，特别是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

这份文件强调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并指出：不能指望他国提供先进技术，要求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过，文件也提到国际合作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意义，如国内外大学开展科技合作、中国企业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等。肯尼迪认为，这份文件正是中国务实灵活的“技术民族主义”。

在肯尼迪看来，一方面政府强调不依赖“外人”，另一方面国际合作又成为自身创新能力不足时的“稻草”。这就体现了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务实灵活。而这种务实灵活在支持国内新能源企业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中国既不是那种全面依赖国际合作的技术发展，也没有“死硬技术民族主义”政策。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清洁能源”位列重要领域之中。清洁能源指的是“新可再生资源”，超越了传统水利发电等领域，提出更高的科技要求。

例如，在风能领域，由于成本过高，直到2003年中国才开始启动大规模风力发电项目，但明确要求在风力发电站至少采用50%本地化技术，随后这一比例升至70%。所谓“本地化技术”，指的是

由在中国境内生产的设备。在随后几年间,中国企业在国内风能市场的份额迅速增长。2004年,中国所有风力发电站中四分之三的涡轮是外国生产的,2010年中国企业控制了85%的市场,在全球涡轮市场也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政府的本地化技术要求下,不少外国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涡轮或其他设备,或依赖中国企业提供的折本。

另外,中国从2008年开始向国内涡轮制造商提供670万么美元至2250万美元不等的补贴。

类似的以强制标准和补贴支持技术发展政策极其容易在国际市场引发不满。美国曾先后就中国的本地化设备要求和政府补贴投诉至世界贸易组织。但事实上,政府的倾向性政策早就写入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针对新能源企业的补贴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中方也就美国等方面“贸易保护”的指责进行一定回应,削减部分补贴政策,体现了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在这一议题上的“务实灵活”。

但中国政府支持国内企业发展的立场并没有改变,最新关于光伏产业的国际纠纷让中国与美国、韩国、欧盟“对簿公堂”,但中

国的立场似乎强硬起来,采取了在葡萄酒领域指责欧盟反倾销等报复性措施。

肯尼迪认为,以清洁能源为例,中国所采取务实灵活的“技术民族主义”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不放弃自主创新、提升技术能力的机会,但同时不关上国际合作的大门。也正因如此,中国在稀土等高科技原材料出口上的政策,在“智能电网”等技术标准,以及支撑战略新兴产业的大规模方案都可能成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焦点。

在这份研究的最后,肯尼迪提出中国“技术民族主义”值得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确需要国际技术合作,应如何平衡“技术民族主义”目标与国际合作的关系?第二,中国在其他领域的“技术民族主义”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如信息与通信技术等领域?第三,“技术民族主义政策”与中国经济与外界存在较高程度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最后,中国“技术民族主义”本后的动因值得探索,是否与中国文化或近代历史上遭受列强欺压有关?

参考文献

- Kennedy, A. B. (2013). China's Search for Renewable Energy: Pragmatic Techno-nationalism. *Asian Survey*, 53(5), 909-930.

单身汉的苦恼：婚姻不平等值得关注

◎ 王韬

单身汉是乡土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形象，他们经常被赋予的特征是：性格木讷、自卑、封闭，社会地位不高，被人嘲弄取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观念中，“打光棍”被视作某种程度的生活不幸。

如今，在男女性别比例日益失衡的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打光棍已不再是个别现象，而是变成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几位学者基于中国安徽某县农村地区的实证调查表明：相比于已婚男性，单身汉在情感、社会认可和性行为等多个方面面临更大障碍，其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也与已婚男性明显不同。

该项研究数据来自 2008 年中国农村男性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

调查。这项调查在安徽某县对分组随机抽样的 24 个行政村的单身和已婚男性发放问卷, 30 岁以上的受访男性共 523 名, 其中单身 288 人, 已婚 235 人。本地计生官员在接受培训后负责调查实施, 问卷由受访者独自填写, 调查者无法知道填写内容。研究者认为, 当地官员作为调查实施者并未破坏调查数据准确性和客观性。

研究结果显示, 当地的单身汉与已婚男性在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首先, 在居住方式上, 一半的单身汉都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住在一起, 这个比例在已婚男性中只有 13.2%。因此, 单身汉拥有的隐私更少。

其次, 单身汉往往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由于农村妇女择偶“向上看”, 经济条件不好的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79.2% 的单身汉在过去六个月间收入低于 1000 元, 而只有 51.9% 的已婚男性有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单身汉整体的教育水平也远低于已婚男, 11.8% 的单身男性为文盲, 这一比例在已婚男性中只有 1.3%。

“打光棍”不仅要受到外界压力, 自身情感和自我认知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在该研究中, 有 72.7% 的单身汉都抱怨来自家庭的压力, 50% 左右的受访者抱怨社会舆论压力。超过半数的单身汉表示感到孤独或者缺乏情感体验, 这一状况在不同年龄段没有差异。

单身也极大地影响了性行为。这首先体现在初次性行为的时间和性伴侣数量上。30岁之前，68%的单身汉从来没有性爱经历，已婚男则全部有过性爱经历。到40岁，单身汉的平均性伴侣数量为0.7，远低于已婚男的1.5。

在有过性爱经历的单身汉中，只有七分之一的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有女朋友作为性伴侣。由于没有婚姻式的同居和私人住所，他们的性活动次数远少于已婚男性。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五分之一的单身汉曾购买性服务，而另一种替代性行为——自慰也并没有在单身男性中更加普遍（都在40%左右），频率差异也并不显著。在调查前的一月中，单身受访者平均自慰0.6次，已婚男性为0.4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文化约束减少，年轻男性的婚姻外性行为特征有明显变化。40岁以下的单身男性中20%曾与女朋友发生性关系，而在年龄更大的群体中只有8.1%。7%的年轻男性最近一次性经历是与性工作者，年龄更大的群体则只有3.1%。

由此看来，“打光棍”的确对男性观念和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不同于已婚男性，单身汉只能有限地体验与婚姻相伴随的社会生活，比如抚养孩子、进行性行为等，与此同时，他们也拥有更低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打光棍”无疑是对本

已贫穷的生活又一重大打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考虑到涉性问题的特殊性，即便是受访者独自完成问卷，其回答或许仍与真实状况有所出入，进而影响数据的真实性，这是在理解这一研究结果时需要特别注意的因素。

该研究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日益加剧的性别失衡。文章认为，截至目前，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对于婚姻的影响仍然较为有限，但这一问题正在不断加剧，“打光棍”不再是个别人生活状况的描述，而是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它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我国现有的政策辩论话语中，有关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的议题常常被人提起，不过本文的研究提醒我们：婚姻状况的不平等同样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婚姻状况的不平等会与经济、教育的不平等相互结合，衍生出更多的弱势群体。这一现象值得学界和政府更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 Attané, I., Zhang, Q., Li S., Yang X., & Guilimoto, C. Z. (2013). Bachelorhood and Sexuality in a Context of Female Shortag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in Rural Anhui,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703–726. doi:10.1017/S0305741013000702

跨族交流越多,傲慢偏见越少

◎ 陶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 multi-ethnic 国家”，这是《宪法》序言对中国基本情况的描述之一。不过，各族人在一个社区内共同生活的情形，也存在于其他许多国家。因而，了解这些国家的相关情况，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与思考自己身边的民族问题。

例如，在上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和本世纪头十年间，英国政府曾长期奉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受此影响，许多移民后裔得以保留并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而许多英国社区也逐渐形成了多民族共处的局面。传统观点认为，这些多民族社区中的邻里信任程度，往

往低于纯粹由本地白人组成的社区。然而,牛津大学最近完成的一项实证研究显示:若这些社区内部各族居民之间的日常交往丰富,则同样能够实现较高的邻里信任。

在研究中,学者们委托专业机构,通过严谨的抽样方法,选取了全英 224 个社区中的 868 位本地白人居民和 798 位少数族裔居民进行了当面访谈。通过这个富有代表性的样本,学者们得以了解英国人对社区内本族裔与其他族裔居民的信任程度——包括受访对象是否认为其他族裔居民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机会,或者提高了社区的犯罪率。此外,他们也得以考察受访对象与其他族裔社区居民的互动程度,并且通过汇总加工一个社区内所有受访者的信息,计算出了每个被调查社区的跨民族交流活跃程度。

研究者指出,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和社区富裕程度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信任水平。控制住这些因素对于统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干扰后,他们发现,各族居民之间的交往程度,确实显著影响着一些社区的邻里信任程度。

具体而言,在那些白人居民占总人口比例相对更低的社区里,接受调查的英国白人往往更倾向于认为少数族裔威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机会和安全水平,这些白人的邻里信任程度也往往较

低。但是,在那些各族居民交流比较频繁的社区中,无论白人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是高是低,接受调查的英国白人往往都不会将少数民族居民视为威胁,他们的邻里信任程度也大都相差无几。

研究者认为,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在那些白人比例相对较低但各族居民交流频繁的社区中,跨族交流对受访白人心态和邻里信任带来的正效用,抵消了社区内少数民族居民比例较高给他们带来的负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对于少数族裔被访者来说,社区中的白人比例对他们看待白人的态度以及邻里信任的程度没有显著影响。

研究者承认,受制于数据结构,他们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到底是什么机制造就了跨族交流频繁程度与白人居民邻里信任水平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既可能是因为跨族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白人对少数族裔的误解与恐惧,也可能是在邻里信任水平较高的社区中人们更愿意进行跨族交往。此外,若希望将上述结论推广到主流族裔并非白人的国家和地区,显然还需要使用更多数据进行重复研究。

不过,对于同样大量存在各族人民杂居情况的中国来说,上述研究成果至少说明:那些更愿意与其他民族同胞深入交流的公民,

往往在民族问题上会更少傲慢与偏见；而如果我们自己和越来越多的邻居能够成为这样的居民，那么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势必会更加融洽。

参考文献

- Schmid, K., Ramiah, A. A. & Hewstone, M. (2014). Neighborhood Ethnic Diversity and Trust The Role of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erceived Threat.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1177/0956797613508956

环境污染也不平等：谁首当其冲？

◎ 缪莹

这个冬天，雾霾不再是北京的专利，它轮番转战全国各大城市，上百城市“中招”。有人在雾霾中安慰自己：谁不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喝着同样的水呢？

其实，环境也有不平等一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马春波教授在河南省取样调查便发现，相比起城市和农村居民，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是受环境污染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在美国，“环境不平等”早就是一件饱受关注的事情，穷人和有色种族是受害最严重的群体，这和美国国家历史和社会构成是分不开的。同样的假设显然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那么，在中国，

谁最容易被环境污染所影响呢？

首先，在中国，经济状况的改善并不一定代表身边环境的改善。在美国，收入和受污染度是成反比的，穷人受环境污染影响更大，而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往往都搬离了那些污染严重的区域。可在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城镇工业化给人们带来了高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污染，但许多城镇居民还是愿意住得离工作地点近些，这便导致了收入和受污染度成正比的奇怪局面。

当然，中国的高房价和亲戚邻里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国内居民搬家难的因素之一。在国内，好几代人在一个地方居住是十分常见的事，哪怕这个地区已经青山绿水不在。于是，作者的调查中发现了这样的现象：从城镇工业化中收益越大，受工业化的污染影响也越深。

那么，城市居民受到的污染就一定比农村居民大吗？答案其实是否定的。例如，从1998年开始，中型城市和城郊地区便不再允许建立大型用煤发电厂。而在城市用电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以牺牲农村地区的环境来满足城市需求了。在马教授的研究中，供暖是整个地区的第二大污染源。

不过，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环境污染首当其冲的其实是农民

工这一数字可观的群体。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工人数越多的城镇,受污染影响的程度也相对越高。对这种现象,马教授则提出两种解释的可能性:第一,由于手头拮据,有一部分的农民工们经常吃住在工地上,而他们的就业行业往往也是污染最重的行业;第二,农民工在城乡结合部的区域也往往更为密集,因为那里可以租到更便宜的房子,然而由于城市规划的原因,这些区域恰好是污染源最多最重的地方。这和马教授在2009年于江苏省做的类似调查结果是相似的,可见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河南省。

尽管马教授的调查引出了中美两国在环境不平等上的不同之处,但归根究底的原因还是类似的。由于历史等种种原因,美国的有色人种往往经济社会地位偏下,这便符合了“越穷越受环境污染所害”的假设。这一弱势群体在中国则换成了农民工:同样由于历史和社会构成原因,农民工们不光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甚至在环境方面也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

马教授认为,在中国,尽管环境保护意识已经逐渐进入主流,但环境平等和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概念尚属模糊。这意味着大环境可能得到改善,却不能平均地影响到每一个人。当然,关注环境不平等的问题不光要关注已有的现象,还需要仔细判

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否大多数人（或经济条件尚可的人群）会相对注重抵制污染大的重工业？又或许经济条件欠佳的人群宁可承受污染，也不愿意放弃由此可能带来的工作机会？这都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挖掘了。

参考文献

- Ma, C. (2010). Who bears the environmental burden in China — An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sources? *Ecological Economics*, 69(9), 1869–1876.

墙里墙外： 不同研究者眼里的新浪微博 vs 推特

◎ 陈仲伟

尽管新浪微博在微信等新兴社交工具的冲击下已渐趋强弩之末，而推特也已风光不再，但作为全世界注册用户、活跃用户及媒介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微博客平台，基于推特与新浪微博的比较研究依然是观察中国和国际虚拟社区及其用户行为特征的绝佳样本。

本文撷取三篇对比研究新浪微博与推特的报告，分别是惠普实验室的《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协同完成的《粉谁？中国微博用户有着不同的选择》，以及学术

期刊《网络心理学：行为和社交网络》上由张莉轩（音）和 Iryna Pentina 撰写的《(新浪) 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方式》，并参考博主牵牛续锦《回到产品设计起点，溯源 Twitter 和新浪微博的殊途不归》一文观点。

就研究数据的来源上，惠普实验室更多的是凭借公开数据，《粉谁》一文采用了不少更难获得的数据，譬如某条具体微博的阅读量，互粉比率，及互粉好友同城比率，而《新浪微博的使用动机及使用模式》一文则更多地依赖调查问卷，三篇报告但都围绕着新浪微博与推特传播方式与内容及其用户的行为的差异展开。

微博的用户关系更密切？

《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一文通过统计受访微博主的粉丝数量与微博主的动机，发现：粉丝数量取决于微博使用动机与更新频度。但作者同时指出，针对具体的动机而言，某些动机驱动的微博主之所以受欢迎并不受其每天更新频度左右，而是深受他们发布信息的质量，对讨论贡献以及对他人支持的影响。而自我表达作为重要的动机，尽管会极大影响微博主的活跃程度，但并不必然提高微博主的受关注度。譬如那些沉湎于微博游戏的微博主

尽管能赚取很多微博礼品和提高微博级别,但这种活跃度几乎并不影响受关注度。

《粉谁》一文则通过数学模型发现:在新浪微博上,粉丝量较少时,活跃度会极大提高被粉的机会,但人气王们则并不靠活跃度提高粉丝数量。《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一文指出:相比推特,微博的交互性更强,由此更具有商业化的潜力。根据《粉谁》一文作者就推特与微博、粉丝与微博主之间的层级关系统计,推特的任意两个用户之间隔着 4.86 个用户,而新浪微博两个用户之间隔着 4.63 个用户。由此似乎可以认为:相较于推特,微博的用户联系更为密切——当然也可能是因着人气王们作为中介强化了这种虚拟的关联。不过《粉谁》一文同时统计出有 47.3% 的互粉是发生在同省用户之间(至少按照注册信息如此),互粉似乎也具有一定地域性。

《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一文作者期待未来通过对粉丝数量与每条微博转推数量的相关性比较,能加深对人气王们何以产生,以及微博信息的流通机制的理解。这在《粉谁》一文已得到实现,该文指出,一条热点微博的原创者与任何用户最远不超过十层关系。作者将热点微博的消息源分为两种,一是草根意见领袖,

他们的微博被直接转发,第二种多是明星,他们的微博被其他有影响的人气王们接力般的梯次转发。由于每次转发只被计入源微博和上家,所以那些拥有众多粉丝的人气王们在议题设置中起到更重要作用(至少从数据上来看,因为他们的粉丝转引次数除了被计入他的转发数量,也贡献给了源微博)。这大概也是大V们被重点照顾的原因。

推特明星关注更多元,微博大V喜欢相互捧场

《微博用户的使用动机和方式》一文根据共享好友的比例与转推的数量指出:推特更像是自媒体而不是社交网络。推特所满足的用户需要更多的是信息获取与兴趣分享,而微博使用的动机更多的是自我表达、情绪发泄、社交、追星、公民行动、职业发展、信息获取——这其中,女性微博用户更倾向于帮助她人,换句话说,女性微博主更倾向于采取公民行动,但推特或是脸书的女性用户则更倾向自我表达及维持小圈子的交谊。

《粉谁》一文则通过完整的数据,进一步将新浪微博用户按照粉丝数量及发帖条数多少粗略分为四类,根据同配网络分析,作者发现:在新浪微博,普通用户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微博条数不是很

多,但粉丝数量极多的用户;推特用户的关注能够更明显地展示该用户的独特兴趣偏好,并隐含着更多的个人信息,而新浪微博用户则明显呈现随大流倾向。同时,在推特上,越是高居人气排行榜上的人气王,其关注对象越多元,而微博的大V们则更乐于相互捧场。由此《粉谁》一文认为,新浪微博也具有社交媒体的功能,因为其传播与受众并不平衡——推特的社交媒体功能是通过其帖子的内容实现,而新浪微博的社交媒体功能是通过传播与受众等级化体现的。

微博主牵牛续锦则认为,微博并非简单的社交网络,它乃是媒体、明星以及意见领袖们的信息放大器,如同新闻联播,占据了受众有限的注意力频段。不过尽管如牵牛续锦所说,人气王们享受着更多的关注、转发,然而粉丝们如何参与互动,职业网络评论员、网络推手、网络信息员在此间发挥了何种作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尽管推特也存在大量欺诈性账号,但由于推特的扁平化和自由度,这些职业并不普遍。

推特紧跟时事,微博娱乐八卦

针对两个平台所承载的内容,惠普实验室报告以每小时为测

量单位,连续跟踪了新浪微博在 30 天内和推特在 40 天内,其官方列出的热门关键词。作者发现,新浪微博关键词多数无关痛痒的娱乐与八卦。从形式上 56.43% 的内容含有图片或本身即以图片呈现,而推特平台上的关键词跟当前发生的新闻事件有很大的相关度,而与娱乐内容的相关度不高,此外截止该报告完成时,推特还尚未具备插入图片功能。

就两个平台的信息源来说,新浪微博对热门话题的转发数约占整体的 62%,而 Twitter 的热门话题转发数仅占 31%。而且,人气王们的微博更多的也是转发而非原创内容,也就是说他们的议程设置功能是通过二传手式的转发其他用户的视频、图片和笑话以及其粉丝的转发与回复实现的。因此惠普实验室报告指出,转发而非原创内容构成了新浪微博的主要信息源,而推特平台上尽管也有大量转推,但其比例和影响力均不像在新浪微博转发的影响力那么大。

根据作者排名前 100 位的意见领袖中,未经身份认证的用户在新浪微博有 23 位,远比 Twitter 多。而这 23 个用户中,时尚、购物、游戏、旅游及明星占据了压倒性多数,而推特的人气王很多是媒体及公共部门的官方推号,且推特的链接功能使得推特在相当

程度上充当了用户获取新闻的中介。作者似乎在此暗示：推特的意见领袖们更具有权威性 & 严肃性。

《粉谁》认可微博的等级化与中心化趋向，其作者将之归因于华人社群为主体的微博用户与遍布全球更为多元的推特用户有着不同的性格及社会道德观念，并进一步认为文化差异所导致的用户习惯值得进一步研究。然而博主牵牛续锦却认为，很可能正是微博的产品设计本身导致了用户的选择偏好——Twitter 的每条评论并不会显示源微博，每条转发也仅显示其直接转发处，并不重复源微博，“每条信息都是同等的，而新浪微博里是有两种：原发微博和转发附言微博。原发微博的传播力远远大于转发附言微博，他们是从属和被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屌丝”与人气王的文化是被创造出来的，媒介本身创造了这种等级化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粉谁》一文的第二作者任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主任分析师，这一报告通过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合作完成，显示舆情监测部门本身除了实践之外，也在积极谋求成果的学术化，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由此，似乎也不难理解这该报告所采取的的调查方式及所采用数据源的独家。而惠普实验室报告体现了统计、模型与制图的精湛与通过公开数据得出结论的能力。

而《新浪微博的使用动机及使用模式》一文无论调查问卷与数据处理则更类似于学术个体户。

参考文献

- Yu, L., Asur, S., & Huberman, B. A. (2011). What Trend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5th SNA-KDD Workshop'11 (SNA-KDD'11)*.
- Zhang, L., & Pentina, I. (2012). Motivations and Usage Patterns of Weibo.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5(6).
- Chen, Z., Liu, P. Wang, X., & Gu, Y., (2012). Follow Whom? Chinese Users Have Different Choice. Retrieved from <http://arxiv.org/abs/1212.0167>
- 牵牛续锦 (2013). 回到产品设计起点, 溯源 Twitter 和新浪微博的殊途不归. 钛媒体. 检索自 <http://www.tmtpost.com/49370.html>

两岸三地

台湾“总统”大选对经济景气的影响

◎ 马军

每次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都会宣布自己的经济政策以获得选民的青睐。2008年选举中，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就曾向选民保证“633计划（经济成长率6%，失业率3%，人均收入3万美金）”和“股市破两万点”并获得胜选。后来，这些目标并未实现，这也让他在四年之后的2012年选举中颇受质疑。

由于需要向选民展现执政能力，历次“总统”大选都会对台湾岛内的经济景气产生不小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变化也能反作用于选举结果。“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博士生蔡昕俞通过对四次“总统大选”前后台湾经济景气变化的研究，发现了选举与经济成长之间

的一些联系。

在以政党政治分野的选举中，政党会逐渐朝中间选民的偏好靠拢以争取多数选民的支持，现任者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执政优势操控经济，借以增加选民对现任者的信任度。此外，每个政党的支持者具有不同的属性，在经济表现上也会提出不同的政策。因此，在讨论因为选举周期而导致的经济政策、景气波动的关系时，需要考虑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投机性政治景气循环”，二是“党派性政治景气循环”。

“投机性政治景气循环”认为现任执政者为求连任，会在选前迎合选民的需要，借由提升政绩、强化施政表现来获取选票。而“党派性政治景气循环”则强调各政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会以不同的政策使其政绩与支持者的属性或者意识形态相符。根据欧洲的经验，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在执政初期与末期会有不同的经济表现。

台湾自 1996 年第九届“总统”开放民选以来，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与两次政党轮替，提供了一个同时印证“投机性政治景气循环现象”与“党派性政治景气循环”的机会。蔡昕俞根据台湾四次大选前后的经济数据以及台湾政治、经济的特有情况，对台湾大选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视。

经济成长指标方面,在国际上现有的的研究中,衡量经济景气的指标有 GDP、GDP 平减指数、银行利率、货币供给和能源的相对价格、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等。考虑到台湾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属性,研究者加入了资本形成、出口、贸易条件、每季股票流动性等。

而在政治方面,台湾也有着独特的情况:以政治-经济光谱来说,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为中间偏右,而民进党则属于中间偏左。但是,通过粗略的观察来看,这种政治观点上的差异并没有转化为选举议题,国、民两党的政治差异并不体现在经济的左右之争,而是聚焦在统独议题上。虽然 2000 年后经济平等、反贪腐、阶级投票等社会经济层面的议题开始涌现,但国家认同议题在国民党与民进党台湾两大政党地位的确立下仍是主流。

研究者定义每一个投票日的当季视为最后一季,往前推算 4 年共 16 季作为一个政治循环,把上述经济指数与政治选举变数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两条结论。

首先,台湾“总统”大选的选举周期里较能够观察到投机性政治景气循环对经济实质面的影响。经济成长率在选前两个季度会有加速上升的趋势,尤其是 2004 陈水扁寻求连任和 2012 马英九寻

求连任的两次大选中,经济波动的幅度最大。即便以股票市场流动性对于经济成长的预测能力来控制选举行情的影响,还是能够从经济层面观察到执政者的投机性政策在选前的效果。

另一方面,党派性政治景气循环的影响效果则不明显,政党轮替前后,两党的经济表现并没有巨大差异。研究者预期:若台湾的政治分歧能够由现在国家认同的单一议题转往社会经济层面等多议题导向,或许能借由政党竞争增加台湾总统大选政党轮替的机会,更能够在经济实质面观察得到岛内主要政党在施政上的差异。

参考文献

- 蔡昕俞(2013). 台湾总统大选与经济成长的政治景气循环. 台湾民主季刊, 10(1), 1—34.

我们是谁？

台湾人和香港人的国族认同与泛中华意识

◎ 陈仲伟

晚清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侵迫，疆界模糊的中华共同体不得不向民族国家转轨。Nation（国族）、Country（国家）等肇始于西方、边界清晰的概念，在转译与应用过程中语义变得模糊。在中国大陆，由于大一统的惯性思维，地域认同与国族认同并不至于水火不容，这使得很多大陆汉人对这些误解将错就错、熟而不察。但晚近中华文化圈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断裂，使得身份认同在文化圈的边缘演化成为认同的困境与政治的对垒。

“国立”中山大学的刘正山与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立峰两位学者，在2013年最后一期《亚洲研究》上撰文，力图厘清一些近似且极

容易混淆的概念,如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中国人属于国族认同,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公民”或“台湾共和国公民”则是国家认同,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这些概念的微妙区别在大陆更不容易区分,而由此引发的对香港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一锅煮的认知与一厢情愿的想象只会加剧隔膜,阻碍共同体的构建。身处文化圈边陲的两位学者,具有明确的身份自觉,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

两位作者首先回溯了台湾认同与香港认同的起源,前者基于被殖民经验与民主化转型,后者则在南逃难民客居异乡与被殖民等不利身份建构的土壤中,自身认同意识萌发于1970年代经济的起飞与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勃兴。相比于台湾,独立建国从未进入港人现实与主流的政治选择中,尽管有新加坡的样板可为参照。

2011年11月,两位作者以电话抽样采访为研究方法分别在台湾、香港收集到1074份和845份反馈。

82.5%的台湾受访者视中华民国为台湾的正式国号,而68.8%的受访者倾向以台湾作为国名。41.5%的人接受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双重国家身份。42.2%的人认同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51.2%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5.7%的人认为自己是

中国人而非台湾人。62.5%的人认可中国人和台湾人享有共同的国族。67.7%的人视台湾文化为真正的中华文化,而21%的人不认可。30%的人自称蓝营的铁杆,18.8%的人自命是绿营的拥趸,51.2%的人表示不预设党派立场。

60.3%的受访港人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港人,20%认为自己是港人而非中国人,19.7%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非港人。81.8%的人认可中国人和港人享有共同的国族。为自己国家自豪的台湾人和港人分别有82.7%和53.8%。

作者发现,认同中华民国作为国号的台湾人并不必然仅视自己为中国人,而多是认同自己作为台湾人和中国人的二重身份。“我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泛蓝拥趸区隔自己与大陆中国人的政治正确。

在港人的身份认同上,受教育程度是重要影响因素。受教育层次越高,越倾向于不仅仅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种双重身份认同基于对香港核心价值的骄傲(市场经济与法治),且认同香港人身份的人更倾向于民主政治。

另外,以本国为骄傲的台湾人,更易认同中华民国合法性,更倾向于蓝营且更认同中华文化,且更年轻化。而以本国为骄傲的香

港人,更不接受香港认同,更倾向于香港对大陆的隶属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以年长者为主。作者认为,倘若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被削弱,台湾建构起文化主体性并在其论述上成功与中华传统文化脱钩,蓝营大量丧失票仓都可能引发台湾在认同上(而非政治上)脱离中国;而中国国族主义声誉的损失也会削弱港人对自身中国身份的认同。

这一研究的另一特色在于,作者调查了台湾人和香港人彼此如何看待对方。作者发现,惟有中华国族主义决定台湾人和香港人是否认为对方是中国人,而与文化、政党偏好等无关,而且台湾的男性与香港的女性更倾向于采取中华国族主义思维。

就台湾人而言,个体的国家认同与国族认同孰强孰弱决定着他们是以何种方式想象台湾的定位与自身的关联。就香港人而言,本土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先后决定着他们对北京的态度。

参考文献

- Liu, F. C. S., & Lee, F. L. F. (2013). Country, National, and Pan-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Standing Together as Chinese? *Asian Survey*, 53(6), 1112–1134.

选举改变了国民党么？

◎ 马军

现代民主政治的运作无不以政党政治为基础，民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政党政治。198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在政治自由化的趋势下解除了党禁，各政党相继成立和竞争，政党政治也逐渐发展起来。

在台湾诸多政党中，中国国民党是最具有全国性选票和社会基础的政党。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史上，国民党在绝大多数时期也是执政的政党。2000年以前，它几乎就是“执政党”的同义词。国民党在“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架构下，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有凌驾其他政党的绝对优势，“党国体制”则是当时党政关系

的准确描述。

2000年后，国民党一夕之间沦为在野党，不再掌握中央政府的主要执政权力，形成国民党党史上首度党政分离的状况。那么，2000年后国民党发生了哪些变化和转型？2008年重新执政后，国民党组织定位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国民党与政府重新建构了什么样的关系？台湾中原大学副教授陈宏铭通过“政党组织”和“政党与政府”两个面向对2000至2012年间的国民党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在现有政党组织的研究中，对政党的区分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干部型政党”与“群众型政党”分类中，研究者认为国民党偏向于“群众型政党”，甚至属于强调民主集中原则的列宁式“革命民主政党”。而在“大众官僚性型政党”与“选举—专业型政党”的分类中，在组织上更像是官僚系统而非选举专家的国民党更接近于前者。

2000年失去政权之后，国民党进行了对党组织的改造，目标是将党改造为“选举机器”，并且做出了如下的尝试：成立“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精简裁撤中央地方党部、改变民选公职提名办法、将三四千人的党工裁撤至不足四百人等。对于国民党尝试向“选举机器”的转型，研究者认为国民党内部人士“有意”向选举机器的形态

发展, 历任党内领导也明确表示将国民党改造成“选举机器”, 甚至提出“把党建在投票箱上”的口号, 并且做出大量工作。

不过, 国民党仍维持着相当规模的官僚行政组织, “大众官僚型政党”的属性依旧浓厚。此外, 国民党中央制度化层级组织多年来并未实质改变, 资源募集和分配仍由中央党部负责, 政党的资源仍掌握在中央党部。

而在党政关系的建构层面, 国民党失去政权后依旧利用立法院中的力量与民进党政府抗衡, 民选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在党内的角色明显提升, 党对立委的控制依旧体现出了大众官僚型政党的性格。2008年马英九上任后, 曾有一年时间不兼任党主席, 使国民党党内最高权力机构中常会无法与总统府和行政院有效沟通。这样一来, 国民党虽然占据执政优势和立院多数, 但在重大法案和人事案中屡屡受挫。2009年7月26日, 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 利用“党政五人小组”、“中山会报”、“党政协调会议”“府院党三秘会议”等跨党政平台重新建立起党政关系, 强化了总统对政党的控制(观察员注: 2013年国民党全代会上, 将总统兼任党主席写入党章)。

由此, 陈宏铭得出结论: 虽然国民党转型中, “选举机器”是一项核心的任务, 在多数时期为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意见, 但未形成具

体的内涵并加以实践,故 2012 年止,国民党仍未完成实质转型。国民党仍旧充满群众型政党及大众官僚型政党特色,并非选举专业型政党。在台湾“总统优势的半总统制”宪政制度下,政党很难仅仅是一部选举机器。

参考文献

- 陈宏铭(2013)。“选举机器”政党转型路线与党政关系的建构:中国国民党的经验(2000—2012)。台湾政治学刊, 17(2)。

两岸经济一体化不会消解台湾的本土认同

◎ 王韬

从很多方面看，最近台湾发生的反服贸协议运动都是史无前例的——学生先是占领立法院，随后又占领行政院，事态剧烈，甚至被一些媒体冠以“准政变”之名。

此次事件与台海两岸的经济一体化有关。不少人认为，在经济层面，大陆与台湾贸易开放，是大陆对台湾让利，台湾经济整体获益更多。贸易自由化不仅拓展台湾对大陆的出口，提升 GDP，还能增加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在台湾无法获得其他拥有巨大市场的贸易伙伴的前提下，依靠大陆是提振台湾经济的唯一可行选择。而经济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则是：大陆通过让拥有很强议价能力

的台商群体获利,获得政治支持。因此,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上更亲密的关系,看上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事实上,“经济一体化导致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武断的论点,它遗漏了这个两岸关系中多个层面因素的复杂互动。

一方面,即便台湾经济整体受益,受益最多的也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资本家,相对弱势的产业和社会底层的就业者都是牺牲者。在大陆的威权体制下,中央政府推行对外经济政策遇阻较小。但台湾不同——今日的台湾,民主观念已深入人心,各方利益诉求千差万别,与大陆签订贸易协议这样事关全岛的大事,若在民主程序上稍有不周到,都会引起民意反弹,此次反服贸协定就是民意反弹的一次高潮。台湾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是岛内种种利益诉求折衷的结果,在未来仍然会受到重重阻力。

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的阻力超出了简单的政经利益考量,岛内的民众心理也至关重要。背靠大陆,巨人崛起,这激起岛内各界极深的焦虑感。不断推进的经济一体化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焦虑感,就算经济一体化是台湾贸易自由化不得不走的道路,在经济上过分依赖大陆也只能以牺牲政治上的独立性为代价,这无疑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这种抵触的情绪,实际上不受其他考量的左右,

随着经济合作的深化,这种心理预计将只增不减。

因此,有观点认为,两岸经济一体化不会增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认同感。相反,随着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不断增加,台湾人的本土认同感反而得以强化。在一本名为《民族认同和国家利益:台湾的竞争选择和对区域稳定的影响》的书中,多位学者的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向这一结论。该书出版于2012年,由纽约城市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Peter Chow 主编。

经济一体化不会使两岸认同感趋同, Michael Danielsen 认为这与台湾的民主化有关。在台湾,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讨论都需要一个具体针对台湾的解决方案,不同政策的考量都基于岛内社会多样的利益诉求。在民主政治的塑造下,台湾人已逐步形成了独立的本土意识。虽然直到今日,台湾仍然是一个族群意识和社会观念高度分化的社会,但是马英九和其国民党在台湾社会中建立大中华意识的努力很难成功。在两岸经贸合作的议题上,虽然有一部分台湾人持支持的态度,但他们也仍然会把经济利益和文化上的认同感区分开来。

Frank Muyard 则指出了另外一些可能的原因。他认为,虽然通过贸易自由化拉动对外出口有台湾的利益,但是与大陆交往实

际上也强化了台湾人对两岸社会差异的体验，经济利益与文化上的认同感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此外，正如上文所言，两岸经济分工深化带来岛内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受损，激发社会不满，反过来助长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Naiteh Wu 的研究就对此提供了民意测验的数据予以证实。岛内的民众虽然在统独问题上观点各异，但是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台湾应当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台湾的本土认同和中华认同等不同概念的界定在学界一直多有争议，不同概念的内涵也绝非泾渭分明。但已有充分的研究表明，台湾和大陆的经贸合作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更多的政治和社会因素。此次服贸协定引致的混乱局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两岸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不必然带来两岸认同感层面的趋同，若政治家们处理不当，反而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

无论对于大陆还是台湾的执政者而言，在未来的互动中，无论任何时候，经济效益上的可行都不能替代程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何况，即便以单纯的经济角度衡量，台湾对大陆的经济自由化也仍然伴随着岛内很大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受损，政策制定程序

的合宜合法就更加重要。今日的两岸关系,因为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上的崛起而日渐失衡,但两岸在对话地位上保持平等,却从未像今日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 Chow, P. C. Y. (Ed.). (2012). *National Ident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 Taiwan's Competing Op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 for Regional Stability*. Palgrave Macmillan.

米尔斯海默：美国将对台湾说再见？

◎ 归宿

2010年以来，美国智库和政策研究界对于美国对台政策的争论明显升温，“放弃台湾”也被越来越多的提起。去年12月7日，“进攻性现实主义”流派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台湾国际关系协会”发表演讲，称美国虽然在短期内仍会将台湾视为“战略资产”，但是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这篇演讲以〈告别台湾〉(Say Goodbye To Taiwan)为题，发表在最新一期《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双重意义

米尔斯海默认为，近年来台湾人自我认同意识不断上升，岛内

一些政治势力也一直在推动“法理独立”，但台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难度很大。对中国大陆而言，台湾问题更涉及核心利益——具体来说，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台湾是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见证，关系到民族感情和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台湾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位置，与中国大陆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中国不会改变“统一台湾”的诉求，这一诉求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强烈。

文章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等权力政治理论，可以解释崛起的中国对于台湾以及美国的影响。他认为，正如美国在西半球一样，崛起的中国将在东亚寻求“地区霸权”，必然会将台湾纳入其中。中国也会像世界上其他“地区霸权”一样，采取措施防止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介入地区事务，避免自己的影响力遭到削弱。

美国在台湾政策上的两难选择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对于任何一个“霸权”国家来说，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是其最希望达到的结果。中美两国均概莫能外。美国与中国的安全竞争仍会持续，遏制中国实力的增长将是美国长期的政策选择。

但就台湾而言,美国似乎在政策上面临两难选择。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美国都有强烈的意愿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大陆。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承诺,也关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信誉。但是,美国没有义务在台湾遭受攻击时保卫台湾。毕竟,相较于美国,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着完全的地缘政治优势。在中国实力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未来美国可能将失去保卫台湾的能力。

美国的决策者也认识到,台湾的前途命运是全体中国人的重大关切。如果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统一,中国人民将极为愤怒。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将升高,甚至对抗升级导致核战争。

米尔斯海默认为,未来十几年美国在对台政策上出现某种“精神分裂”,在取舍之间难以抉择。但十几年后,美国与台湾维持密切关系的收益将逐渐被成本超越。最终美国决策者将发现,放弃台湾“说得通”。

“香港战略”或是最终选择

文章认为,在中美两个大国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是台湾的首要目标。这在未来十年内仍然可以得到维持,但是从一个更长的

时间维度看,可能要打上问号。台湾面临三个政策选项:一是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二是加强常规军力威慑;三是采取“香港战略”(Hong Kong strategy),即与中国大陆实现统一,但仍保持一定的自治权。

文章分析认为,台湾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加强军备,对自身、美国乃至地区及国际安全秩序来说风险都很大。而通过发展核武器形成战略威慑为时已晚,更不会得到大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因此,从安全战略的角度来说,虽然很不情愿,但“香港模式”是台湾没有选择的选择。这也正如古希腊历史学者修昔底德所说,在国际政治中,“强者做他们想做的,弱者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

参考文献

- Mearsheimer, J. J. (2014). Say Goodbye to Taiw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专栏

课本里的世界观

◎ 缪莹

从前有一条扁担，据说是朱德的，后来却又成了林彪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过的人们，对那充满时代气息的课本可能还记忆犹新。很多没有亲历过红色年代的人，对那时“多变”的课文可能也略有耳闻。这根令人啼笑皆非的扁担，是教科书被政治左右的缩影。

小小的课本可以看出大名堂，从国际局势，到当下的政治生态。几十年间，从刚开始黑白分明的两派阵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后来的三个世界——以苏美为首的第一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辅的第二世界、以及由中国带领的其余的第三世界，都可以从当时的课本里窥得一斑。

新中国政府对课本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1950年的初级中学

语文课本里，编辑大意一栏写到：“无论什么科目，一定要达到政治教育的目标。”在这样的指示下，编辑部觉得韦息予的《外国地理》一书就有许多地方不对：苏联怎么可以和美英相提并论呢？这分明是敌友不分嘛！于是，许多一直沿用的课本便需要大幅度修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被格外强调，连“经济地理学”也被加入了课本中。

相比之下，民国时期的课本编制则宽松不少。尽管挂着“党化教育”的牌子，并要求国民教育和孙中山思想看齐，但国民党当局对课本内容检查得并不是很严，编辑们也往往是嘴上同意，阳奉阴违。

在南京政府治下，尽管课本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入侵拉丁美洲，但美国并没有被形容成中国的敌人。由于美国并没有真正占领过中国领土，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十分憎恨美国。再加上许多知识分子曾经留学美国，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而俄国则因侵占大量中国领土，在人们心中印象不佳。如何将人们的敌友认知“纠正”过来，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任务。

在中共眼中，世界被分为两大阵营：以死对头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及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了突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逐渐胜利，在1950年版的《国外地理》中，有整整

两章描述苏联作为世界领头人的内容，并引入了一个新的国家分类：“新民主国家”，也即蒙古、朝鲜、北越、以及东欧，它们和西方资本主义所控制的“旧民主国家”形成对比。在1953年的再版中，世界诸国是按照政治地位排序的，苏联第一，而美国，自然是被丢在了最后一章。

朝鲜战争爆发后，课本里更是掀起了一波反美的浪潮。那些黑白分明、针锋相对的观点，从充满时代气息的用词里可见一二。茅盾在《剥落蒙面强盗的面具》一文中充满讽刺地写道：“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全世界人民都蒙受它的福佑……”然后笔锋一转，指出美帝国主义其实是“希特勒的孝子玄孙……杀人魔王，吃人生番，他们的统治阶层疯狂又无赖”。这种极端的语言，后来不仅仅被用于美帝身上，还被用来形容各种各样的其他“敌人”。

对美国的黑化还可以从一首名为《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死了》的诗里体现出来。这首诗的开头展现了一幅美妙的场景：

八月里的一个早晨，
我走过一条清清的小河旁，
河水淙淙地流过田野，

带着唱不完的歌声奔向远方。

河岸上密密的松树林里，
是夏令营白色的篷帐。
一群少先队员奔到河边，
满身披着金色的阳光。

朝霞对他们微笑，
晨风向他们鼓掌，
孩子们追逐着绿波，
小鱼跟在后面来回游荡。

随后笔锋一转，描绘出了一副可怕景象：

如今，我要告诉你们的
是另外一条河的故事，
这条河不在中国，
它在美国的密西西比州，
在同样的八月的早晨，
这条河里浮起了一个孩子的尸首！

他的头上被射进了一颗子弹，
他的脸上被打的稀烂，
他的衣服被剥的精光，
他的全身都是重伤。

满是尖刺的铁丝，
一道一道地
捆住了他的身体。
铁丝上还吊着个铁滑轮哪，
杀死孩子的凶手，
还想把他的尸首沉下河底！

这首诗披露了美国的种族歧视现象，但其重点在于：诗的开头对“少先队员”生活的描写和后面的美国社会形成巨大反差，突出了中国的进步和美国的落后。类似的设计屡见不鲜，一道小学数学题提到：苏联发射的第三颗卫星载重 1327 公斤，美国却只有 14.29 公斤，请问二者相差多少？而在另外一本课本里，则写着：“中国的小麦产量已经远远超过美国”。

在这段时期，课本里除了美国的形象漆黑不变外，对其他地区

的描写一直在变化着。1950年初,在所有亚非拉国家中,只有朝鲜出现在中国的课本里,非洲和拉丁美洲仅仅出现在地理课程里,并且篇幅不多。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后,新中国正式亮相国际政治舞台上,于是1955年的历史课本里加进了新的内容: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以及万隆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之后,关于第三世界的内容逐渐增加,语言也逐渐变得好战。1962年版的地理课本里采用了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as Guillen)的诗《美国佬,滚回去!》。到了1964年,更是有《向瘟神开炮》,这是一首关于“解放台湾”的诗,结尾为:

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向艾森豪威尔,
向美帝国主义,
开炮! 开炮! 开炮!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三个世界”的说法是在1974年,但“三个世界”的理念早就悄悄在课本里成型了。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之后,苏联在中国课本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从刚开始的满满两章,到欧洲诸国一章中的一部分,最后沦

为课本最后一章中被谴责的欧洲诸国中的一小段。在文革时期的版本中，阿尔巴尼亚取代苏联成为了“欧洲社会主义的亮光”。在《初中世界历史》里，1960年版用了整整20页来描述二战后的历史；到了1963年，只剩下了4页，其中只有短短一段话介绍了苏联击败纳粹主义，以及它的五年计划，更是删除了“苏联带领社会主义阵营”这句话。

苏联在中国课本里失势后，第三世界也没能填补老大哥留下的空白。在五十年代后期还充满荣耀的万隆会议，到了六十年代却变成了尴尬的存在：印尼和阿尔及利亚的亲华政府全部被推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又打了起来，在抗美援朝中，还因为援助的关系和越南一度闹僵。世界历史课本的最后一章越来越短，到了1963年，对现代历史的介绍直接停在了1950年而静止不前。

课本换得再快，也快不过当年的世界形势变化。1965年初，教育部决定，世界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还是太多了，于是干脆将世界史这门课暂时叫停了事。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课本里的民族主义既连贯，也有变化。课本对美国的批判是一成不变的，对苏联老大哥的态度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对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位置的描

述则是从跟随苏联蜕变成独扛社会主义的大旗。文革中处处可见的尖锐语言,更是可以从六十年代的课本里看见影子。

从八十年代起,课本终于开始多样化,政治性也减弱了。“阶级斗争”、“反革命”和“革命”这样的字眼从课本里消失了,课本里体现出的世界观也不再是非黑既白。

显然,五六十年代的课堂语言和现在相比,似乎多了一种针锋相对、黑(红)白分明的意味。有学者认为,这种立场明显、非黑即白的教育意在凝聚民众的力量,以加强主权,联手对抗外敌。如果说尖锐而立场鲜明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居安思危的表现,那么当今逐渐温和而多元化的课本,是否说明当下中国对自己的内在力量更有信心了呢?这还需各位读者自己来判定了。

知乎专栏 · [政见CNPolitics](#)

参考文献

- Yu, M.-L. (2013). From Two Camps to Three Worlds: The Party Worldview in PRC Textbooks (1949–1966). *The China Quarterly*, 215, 682–702. doi:10.1017/S0305741013001021

说说《纸牌屋》里那些 Chief of Staff

◎ 归宿

在大热剧集《纸牌屋》中，有两个重要角色，Linda Vasquez 和 Doug Stamper。他们全身心的服务于领导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 Doug Stamper，经常还要为 Frank Underwood 干一些脏活，给领导当“防火墙”和“清障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Chief of Staff（以下简称 COS）。在本剧中，这个头衔被翻成“幕僚长”。在以前的一些政治美剧和小说中，还看到有人张冠李戴，将 COS 翻作“参谋长”。说起来，“办公室主任”这个特别接地气的译名似乎才是最为准确的。

和剧中一样，在现实的美国政治生活中，COS 也是个非常重要

的角色。不过，作为美国行政当局（Administration）的重要成员，COS 的历史并不长，直到 20 世纪后才逐渐出现。最初，这个职位的部分职责由总统的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担任。但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联邦政府的职责范围迅速扩大，仅靠总统的私人秘书、顾问已无法保证联邦政府的顺利运转。1946 年，COS 的雏形“总统助理”（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一职正式设立。约翰·斯蒂尔曼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历史上第一位 COS。

COS 的职责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总统甚至可以不任命这个职位。比如受水门事件和尼克松政府一系列丑闻的影响，1976 年卡特在竞选中就公开宣称自己上任后将不设立 COS。于是 1977 年至 1979 年，这个职位一直空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卡特政府内政外交一团糟，干满一任之后就黯然下台，成为二战后美国少数几个未能成功连任的总统之一。

1979 年之后，COS 成为了每届政府的标准配置，其职责也逐渐确定。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COS 的职责一般包括以下几项。一、组建并管理白宫行政团队；二、建立白宫行政秩序；三、决定总统在什么时候见到什么人；四、决定总统应该知道什么；五、保护总统的利益；六、与国会、行政机构其他部门以及各类利益团体

或个人沟通协调,确定总统的日程;七、为总统决策提出建议。从以上这些职责也能看出,COS是白宫不折不扣的大管家,而且是实权位置。所以,COS也被称为白宫的“看门人”、“掌管王座的人”(The Power Behind The Throne)。

能够担任COS的,一般都是总统、副总统的“身边人”,而这个职位也是他们迈向更高权力阶层的重要一步。当代美国很多重要政治家都担任过COS,如小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副总统切尼就先后担任福特的COS;奥巴马的第二位国防部长帕内塔曾经担任过克林顿的COS;现任财长雅各布·卢之前就是奥巴马的COS。奥巴马的第一任COS艾曼·伊曼纽尔,离任之后到奥巴马的大本营芝加哥成功当选市长,已成为民主党内的政治明星。一些COS,即便离开了政坛,却依然是美国政治的“大玩家”(Major Player)。奥巴马2008年气势恢弘,令人印象深刻的竞选,就是由克林顿政府的最后一位COS,约翰·伯德斯塔一手操办的。

其实说到当代的COS,不得不提到卡尔·罗夫。事实上,卡尔·罗夫只是布什政府的Deputy Chief Of Staff,但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了时任COS的安德鲁·卡德。卡尔·罗夫外号“建筑师”,是共和党竞选大师。他成功策划了一系列竞选,将里克·佩里、阿

什克罗夫特等诸多共和党知名政客送上公职。罗夫最为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在十年内将小布什从一个酒鬼变成“自由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罗夫是个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兼备。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时，他敏锐察觉到美国选民对于克林顿道德瑕疵的不满，突出共和党以及小布什在道德方面的优势，将小布什打造成“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一举锁定白宫宝座。2004年大选，小布什受到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的有力挑战。当时，小布什因为越战时逃避兵役饱受指责，并与克里的越战英雄身份形成鲜明反差。但正当小布什选战告急之际，突然出现了一群越战老兵，在电视上指责克里越战经历造假，成功转移了选民的注意力。小布什也一举翻盘，成功连任。这次“逆袭”，就被认为是卡尔·罗夫的杰作。

《纸牌屋》第二季中，Doug 为了替 Frank 摆脱责任，主动顶罪背了黑锅。这在现实的美​​国政治生活中也曾发生过，尼克松的第一任 COS 哈尔德曼就因为水门事件被判刑入狱。最近的一起类似事件，当属 2006 年时任副总统切尼的 COS 利比因在调查中做伪证、妨碍司法被判 30 个月监禁，并处罚金 25 万美元，剥夺律师身份。利比是 2003 年轰动一时的“特工门”的始作俑者。当时，有美国媒体援引“白宫内部消息”报道称，美国驻尼日尔大使威尔逊的夫人

是中情局特工，导致威尔逊夫人被迫离职。威尔逊认为这是政治报复，要求司法部进行调查。虽然这起事件被广泛认为是切尼一手策划，但最后还是由利比出面顶了罪。利比入狱后，一度权势熏天的切尼也低调收敛了很多。

不过，切尼对自己的心腹爱将也是“不抛弃、不放弃”。2007年，利比被特赦重获自由。此后，切尼一直在为恢复利比的身份和名誉做小布什的工作，甚至在奥巴马宣誓当天，切尼还希望小布什赶在离任前动用总统权力赦免利比的全部罪行。但事与愿违，珍惜晚节的小布什拒绝了切尼的要求。为此，切尼大发雷霆，直到第二天还在媒体面前抱怨总统“不帮自己说话”。

知乎专栏 · [政见CNPolitics](#)

告别打口时代： 中国摇滚乐与城市青年文化

◎ 于灵歌

夏日炎热的夜晚，几个朋克男孩无所事事地坐在北京“无名高地”酒吧门口，喝着几瓶从旁边小卖部买来的啤酒。此时，酒吧里演出正 high：几支内地独立乐队，一群年轻的中国观众，其中还有不少老外。

如今，对于爱看演出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个画面一定不陌生。然而，十年前，当荷兰学者 Jeroen de Kloet 来到北京做田野调查时，只觉得“这世界变化快”。

Jeroen de Kloet 现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摇滚音乐与青年文化。他曾在《中国季刊》上发表过

一篇有趣的文章,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了中国90年代初期摇滚音乐从“流氓文化”向中后期的“打口文化”的转变。作者认为,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早期中国摇滚的消亡,而是凸显了流行音乐在中国青年文化中的重要性,标志着全球化时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以及文化市场化转型。

前打口时代：摇滚与“流氓文化”

崔健、魔岩三杰、唐朝、黑豹……说起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摇滚乐,必然会提及这些响当当的名字。他们引领的中国摇滚乐带有最鲜明的特征:本真性(Authenticity)。作者认为,寻求“本真”体现在两种“对立性”上:一是中国与西方的对立,歌手不甘于只做西方摇滚乐的模仿者,逐渐加入了許多中国元素,比如唐朝乐队的名称、崔健的“新长征路”;二是与港台的对立,尤其与港台流行音乐相区别,北京则在摇滚音乐版图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八九年之后,摇滚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一种风尚,一种流行的宣泄愤怒的方式,一种反抗,也是某种补偿。”

同一时期,“流氓”作家王朔出现了。在他的作品中,“流氓”生活在城市边缘,成天玩儿,性关系开放,常常喝醉,还爱听摇滚乐。

有学者将摇滚音乐与流氓文化解读为九十年代初对八十年代批判精神与叛逆气质的继承，认为它代表了彼时城市青年的疏离状态与边缘亚文化。

然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摇滚乐与流氓文化逐渐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走向衰落。在商品化取代政治化的过程中，那种最纯粹的、最原始的摇滚音乐早已成为过去式，“人们不再需要嘶吼与尖叫，而是开始寻求个性。无论是摇滚所代表的音乐、精神还是理想，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八十年代完成了。”

打口时代：时髦、地下与民谣

就在人们感叹九十年代“摇滚已死”的时候，作者却认为，九十年代中后期“打口一代”的出现不仅掀开了摇滚乐历史的新篇章，甚至带动了摇滚音乐图谱的多元化发展。

什么是“打口”？所谓“打口”就是指那些从海外流入，被海关查获的欧美或日本 CD、VCD。由于数量巨大，海关人员不便逐一摧毁，就用电锯或电钻在碟片上锯或钻一个口。虽然有瑕疵，但是基本不影响播放质量。光盘贩子们通过各种渠道将这些钻过口的碟片偷运出市面，低价贩卖。打口碟片市场不仅有小众的摇滚乐，

还有如席琳迪翁的流行乐、瓦格纳的歌剧。对于如饥似渴的中国乐迷而言,这种便宜的非法碟片简直如同天上掉的馅饼。

这样的环境滋生了中国的“打口一代”。作者认为,“打口一代”一方面以更坦率的姿态面对西方音乐文化,承认西方流行音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将“打口”默许为中国内地青年亚文化的特色。这种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身份认知是对“流氓一代”亚文化身份的继承,更是超越。因而具有超越性的“打口文化”更加多元和模糊化——这在三种音乐图谱中得以体现:时髦乐队拥抱都市文化,地下乐队回归政治隐喻,城市民谣歌手抒发怀旧情怀。

“时髦乐队”的代表——清醒乐队(Sober)与超级市场乐队(Supermarket)。无论是清醒乐队宣扬的“英伦摇滚”(Britpop)风格,还是超级市场乐队迷幻的电子氛围音乐,都呈现出与早期摇滚乐手“披着长发愤怒嘶吼”完全不同的音乐面貌。他们的歌放弃了虚无的理想主义,而是反映现代都市文化:不要假正经,好玩就成了,只要嗨皮起来谁在乎去“反抗”?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抱了现代都市生活,也标志着拥抱西方流行音乐文化,放下了早期摇滚与西方特意的区隔——而是主动融入全球青年文化中。此外,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也做了九十年代“下海”的弄潮儿,身为摩登天空

的老板,不断拓展着摇滚音乐的商业市场。

地下乐队的先锋——No 乐队与舌头乐队。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断裂通常被描述为从文化化、政治化向商品化、个人化的转变,然而“政治化”特征重新出现在了“打口一代”的地下乐队身上。虽然远不如崔健的政治批评来得直接,但他们的歌同样充满了政治隐喻。比如 No 乐队的主唱左小诅咒的歌曲〈代表〉*,就开了江主席的一个玩笑。

尽管地下乐队的作品时常有政治性的挖苦,但由于政府的管制放松,他们可以存活于独立的小型唱片公司,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文化市场化转型进程。

城市民谣歌手——胡吗个、小河。他们的歌曲通常只有一把吉他配以不加修饰的粗犷声线,抒发对远离现代都市喧嚣、回归纯真乡村生活的向往。这从他们的专辑名称即可窥一斑:胡吗个的《人人都有个小板凳,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充满简单的童真,小河的《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身上》则有田园诗意。作为青年一代,他们却是“怀旧的”(nostalgic),怀旧并不只是怀念过

* 新浪乐库试听地址: <http://music.sina.com.cn/yueku/i/801875.html>

去,更是在中国迅猛的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中“对当下变化的敏感思绪”,与消费性大众文化的格格不入。他们一个原籍内蒙古、一个原籍河北,来到北京唱歌,真的成了游走在都市边缘的吟游诗人。

后打口时代：与打口说再见

中国的城市青年位于文化市场化转型的最前线,流行音乐为其寻求自我定位创造了可能性。他们运用摇滚乐表达着自身生命体验:都市化的,政治化的,怀旧的。如果说前打口时代的摇滚音乐人与“流氓一代”选择了摇滚乐这种西方音乐类型去应对改革开放、与整个世界对话,那么打口时代多元的摇滚乐类型就是在订制摇滚乐,从而在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表达中国自身的渴求与归属。

然而,随着二十一世纪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国乐迷想要听到一首歌、一张专辑不再是难事,只需要在互联网上查找并轻点鼠标,再也不用费劲儿去淘换非法的打口碟了。正如最早提出了“打口一代”这一说法的摇滚乐评论家颜骏所言,“打口的一代正在消失,中国在变化,青年在老去,市场在蔓延,狂想、誓言、诗歌甚至自杀的冲动都被积攒起来的财产压到了箱底,记忆,像初恋一样在资讯的浪花里融化,塑料和废塑料旋转着,完成了我们的青春,现在,我们

带着残缺的歌声,踩过方便面纸箱、穿破的 Alchemy 牌 T-shirt 和第一个被扔掉的避孕套,再次上路了。”

知乎专栏 · [政见CNPolitics](#)

学术研究的意义： 为什么仅仅依赖常识是不够的

◎ 张跃然

社会科学研究，无论其理论框架多么精深、分析技术多么复杂，根本上来说还是与人们的具体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研究和个人生活体验之间边界的模糊，常常成为某些研究遭到诟病的原因：“这不就是常识吗？”“这种结论随便到街上找个人问问就能得到，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这里涉及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那些大费周章证明了“常识”的研究，究竟有没有意义？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常识”这一认识世界的工具（且认知成本极低），社会科学研究究竟在什么层面上增进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首先,人们在生活经验中产生的“常识”和“感觉” 往往不具有代表性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常识这一认知方式最为显见的弱点。我们脑海中的常识,总是基于我们特定的人生经历和信息来源的,而人们生活史的多样性,必然决定了不同人眼中的“常识”是不同的。我们所认定的常识,在他人眼里很可能就是胡话。

譬如,在最近五年中,中国人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普遍改善?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同的社会人群(如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男性与女性)的生活体验往往大不相同,他们各自认为“显而易见”的结论也往往相互抵牾。和基于常识的认知相比,像 CFPS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这样基于大规模系统抽样的长期追踪调查,无疑能更加全面、无偏见地解答这一问题。

其次,即使某些常识被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认可, 它也有可能是错误的

我们在总结常识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都是

我们在与这个社会不断接触过程中被“社会化”的结果。社会灌输给我们一系列关于“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基本假设，这些基本假设对我们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如条件反射般不假思索。它们决定了我们选择性地看到什么信息、如何解读我们看到的消息。我们很容易将看到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当作理所当然，因此，我们所得出的“常识”往往具有欺骗性。

和常识认知相比，学术研究使用的方法往往更有可能克服这些内在偏见（虽然很多时候并不十分成功）、呈现更为真实的社会图景（如果我们还承认社会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可被认知的东西）。譬如，人们普遍认为，父母离异往往会给青少年子女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这一常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感受相符。但这里面其实存在逻辑漏洞：离异的父母在离异前的婚姻生活往往已经是不幸福的，子女的身心健康问题是由离异这一事件本身导致的，还是由不幸的婚姻导致的？已有学术研究表明，离异父母的子女的成长状况虽然不及父母婚姻生活幸福的子女，但却明显好于那些生活在父母不幸婚姻中的子女。由此可见，普遍意义上看，父母不幸的婚姻才是造成子女成长问题的元凶，而及时了断不幸的婚姻不仅无害，反而有益——人们之所以得出相反的常识，是因为选错了对照组！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意义就在于，将所有的“想当然”都置于批判的放大镜之下细细查看，从这个角度说，研究结论不管是证实还是证伪了常识，都是有意义的。

再次，学术研究可以帮助明确常识的适用范围 (scope condition)

即使某一常识在很大范围内被广泛接受，而且也确实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情境中被证明是正确的，也无法保证它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社会科学中没有任何结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们需要知道，某一结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其成立的范围是大还是小。植根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常识”对解答这些问题毫无帮助，我们只能依赖于学术研究。

譬如，一个被普遍接受和广泛证实的结论是：由于权责分工明确固定、组织结构高度系统化，官僚制 (bureaucracy) 是最为高效的组织形式。但已经有研究指出，这一结论只有在“信息流动畅通、监管成本低”的结构条件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一条件不能满足，官僚制其实是低效的。对许多学术研究来说，其价值不在于揭示了某一常识成立与否，而是揭示了“在何种条件下”某一常识成立与否。

最后,学术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导致某一常识成立的具体机制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维往往是模糊且具有跳跃性的。我们常常会一步到位地觉得“A导致了B”,却很少考虑A究竟是怎么导致B的。缺少了具体因果机制的支撑,常识所告诉我们的因果关系无异于空中楼阁,站不住脚。更何况,某一因果关系往往可以由多种因果机制导致,那么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到底是哪种机制起作用,还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如果不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永远停留在模糊层面。

譬如,我们都知道,“维稳”对维持目前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稳定有重要作用,但如果问起“维稳”在微观层面究竟是如何作用、其平息社会矛盾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则需要学术研究来回答。若干研究已经表明,暴力镇压并非政府维稳的唯一机制,甚至也不是主要机制;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维稳是通过“关系型镇压”、官民议价过程中政府权威的商品化等机制完成的。在解决这一类问题时,基于丰富的访谈、观察材料的定性研究可以大显身手。定性研究虽然由于案例数目少而很难做到有代表性,但其凭借清晰的理论指引和扎实的实证分析,可以一针见血地揭示现实存在的微观因果

机制,以及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情境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都是有价值的。相信所有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经历过这样的沮丧:花了若干小时看完一篇论文,却发现作者只是换着花样说废话,没有给自己的智识带来任何长进。从常识出发或者以验证常识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如何既能体现思想上的美感,又能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是一件十分考验学者功力的事。当然,何为“美感”、何为“有价值”,不同的学者也自有不同的看法,这就超越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知乎专栏·[政见CNPolitics](#)

注:由于此文只是“浅谈”,并非严肃写作,所以文中提到的研究没有提供引用出处。读者若有兴趣,可以发邮件至 yueran.zhang@duke.edu 索取研究原文。

克里会见中国网民与“回旋镖”理论

◎ 邵立

前些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来中国访问，离开北京前和四名活跃在社交网络的媒体人见面，被要求关注中国的网络管制问题。这些媒体人的做法被《环球时报》社论评为“好萌的表演”。

其实，在国际政治研究里，这种“表演”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早在199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玛格丽特·科克（Margaret E. Keck）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就出版了专著《无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探

讨国际 NGO 如何通过跨国交流,来影响政府之间的政治。

她们把 NGO 的跨国交流分成三类。在这里只介绍和克里访华相关的一类:回旋镖模式 (boomerang patterns)。回旋镖是这样一个略带弯度的棒状物体。你也许猜到了,它的特点有点像飞盘,扔出去之后会自己飞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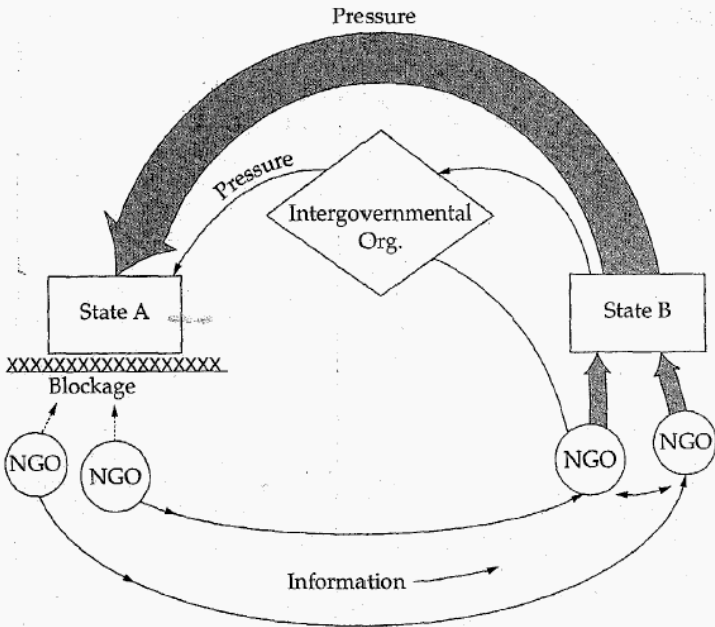


Figure 1. Boomerang pattern. State A blocks redress to organizations within it; they activate network, whose members pressure their own states and (if relevant) a third-party organization, which in turn pressure State A.

两位学者发现,假设有一个国家叫 A 国,里面的人民群众对政府不满意,但因为沟(gou)通(jian)渠(he)道(xie)缺(she)失(hui),这种不满便很难通过国内途径向领导人反映。因此,A 国的 NGO 便行动起来,将相应信息传达给 B 国的 NGO。而在 B 国,官民沟通渠道相对通畅,B 国 NGO 能直接跟自己的政府沟通:你看 A 国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你居然还跟他们政府称兄道弟?

于是 B 国政府受国内压力影响,便会对 A 国政府说,哥们收敛点,要不然家里鸡犬不宁,到时候别说做生意,搞不好我总统都做不成。A 国受制于国际压力,回应了 A 国人民的诉求。于是,A 国人的不满,经历“出口再进口”的方式回到 A 政府的办公桌上,就好像一只回旋镖飞出去又飞回来,因此被称为“回旋镖模式”。

回旋镖模式在什么条件之下容易成功呢?首先跟 A 国社会反映的问题有关系。两位学者发现,如果这个问题涉及到某弱势群体受到人身伤害,或者是跟机会平等相关的话题(例如奴隶制或妇女平等),更容易激起 B 国人民的同情。另外,A 国人民诉求成功与否还和“回旋镖飞行”中各方的实力有关系:A 国的 NGO 要能和 B 国取得联系;B 国 NGO 要有能力沟通政府和媒体;B 国政府要

承诺过保护相应的权利,认同 A 国 NGO 所提出的诉求;最后,A 国政府的自主性也很重要,他们受不受 B 国的压力或者其他国际组织的制约,也决定了回旋镖能不能起作用。

《无国界的活动家》出版于 1998 年,那时 NGO 之间的国际交流比个人交流更频繁和有效。在克里访华的这件事之上,我们能看到回旋镖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社交网络已拥有了跨国的属性,个人“自媒体”能具备与非政府组织相似的影响力。B 国政府和 A 国社会之间已经不再需要 B 国的 NGO 作为中介,而仅仅依靠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就能激活彼此的联系。正如书中所说,国际倡议网络的核心是信息的散布和传播。那么,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就改变了国际社会的行为模式。

但是回旋镖的基本路径还是不变:一国民间人士向另一国政府倾诉不满,然后希望另一国政府向自己政府施压。《环球时报》社论的态度也反映了理论的推演:中国不会轻易受到美国的施压,所以回旋镖模式效果很有限。

其实,国内有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这种行为:“告洋状”。例如,在外媒实习工作过的童鞋们都清楚,每天都有操着各地口音的

人打电话来反映各种不公。这时往往只能边安慰边委婉拒绝。记者们虽然号称无冕之王,但对大多数埋怨往往无能为力,搞不好还会 (bei) 引 (tui) 火 (xia) 上 (di) 身 (tie)。也就是说,民众大多数的回旋镖都未能起飞。

而且,去使馆区“告洋状”被许多地方政府视为“非正常”信访活动,是违法行为。例如:

- ※ 河南省政法委书记:可以上访,但不能告”洋状”(河南) <http://news.163.com/09/0813/07/5GJ4GNTL0001124J.html>
- ※ 中共哈尔滨市委办公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哈尔滨市重大紧急信息报送标准和时限的规定(修订稿)》的通知(黑龙江) <http://www.harbin.gov.cn/info/news/index/detail1/195120.htm>
- ※ 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无理访(河北) <http://www.docin.com/p-470836770.html>
- ※ 《信访条例》宣传提纲(吉林) http://mzj.yanji.gov.cn/user/index.xhtml?menu_id=8&mode=view_content&page=7&is_top=0&news_content_id=337

当然,最著名的例子来自某市前副市长,结局大家都懂得。

另:要想看成功的案例,请收看《纸牌屋》第二季有关哥伦比亚的剧情。

知乎专栏 · [政见CNPolitics](#)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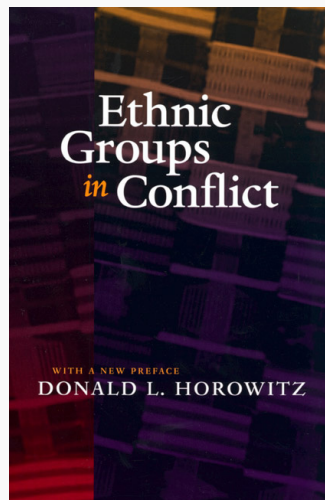
- Keck, M. E., & Sikkink, K. (1998).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理解族群冲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 陈硕 / 特约作者

族群冲突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横向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族群政治的问题。纵向来看,族群冲突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族群政治往往与战争、民主化、国际关系和经济事务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政党、工会、或是反政府组织背后也都有鲜明的族群背景。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族群冲突也表现出了很多的共性。这就为



本书是理解族群冲突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是杜克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 Donald L. Horowitz。

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族群政治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不足**。一方面，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社会科学家都没有意识到族群问题的重要性。他们一般认为族群政治是保守势力、现代化压力和阶级冲突在族群层面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族群问题的突发性和敏感性也导致我们对族群政治的研究非常缺乏。**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标准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族群政治，研究族群冲突背后的因果机制，并为减少族群冲突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研究族群冲突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合适的比较范围。为了更好地实现有控制的比较研究，本书在选择样本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原则：

首先，作者将研究的**样本限制在二战期间（或战后）独立的社会分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欧美人对于自己族群身份的认同远没有亚非地区来得强烈。第二，在欧美社会中，身份的识别主要基于语言、社会阶层和宗教等层面；而亚非地区的身份识别则主要基于族群。第三，欧美的族群冲突的密度要远小于亚非地区族群冲突的密度。

其次，作者**只考虑了那些族群之间地位平等的样本**，而没有考

考虑那些族群间存在社会等级差异的样本。这两种类型的族群关系存在显著的区别：**族群间的社会等级差异**一般是历史上侵略和占领的结果。在这一关系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族群很难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不能独立地产生自己的领导人，并且衣食住行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这种类型的族群冲突往往具有鲜明的阶级斗争色彩：从属的族群往往会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甚至颠覆那些地位较高的族群。**而地位平等的族群关系**往往是移民或原住民活动范围扩大的结果之间，各个族群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在族群冲突中，他们的目标往往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争取更大的自治权。**需要强调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同时存在有等级的和平等的族群关系。两种类型的显著差别使得我们不能将他们放在一起同时比较。**因此**，本书将只讨论平等的族群之间的关系。

第三，我们**只研究那些规模较大的族群**，因为这些族群之间的冲突往往发生在政治中心而非边缘地带。同规模较大的族群相比，**规模较小的族群**能力有限，因此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活动。此时政治的运作是有足够弹性的：中央政府可以在族群之间发挥缓冲和调和的作用，在不伤害其他族群利益的情况下满足某个族群的

利益诉求。而对于规模较大的族群来说,他们往往有能力活动在政治中心地带。此时中央政府本身就是族群之间竞争的中心,一个族群的诉求很可能会伤害其他族群的利益。因此,规模较大的族群在政治中心发生冲突的规模和辐射范围都更大,以他们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和理解族群冲突。

第四,本书对于“族群”的定义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包括他们的肤色、面貌、语言、宗教及起源等方面的差异。这一定义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肤色、语言和宗教的差异与族群差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作者之所以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肤色的差异本身并不能会导致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敌意,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现象只是族群间社会地位不平等的一种表现。第二,有一系列可见的及不可见的特征来对族群进行识别,肤色只是其中之一。同样,对于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也没有必要作过度的强调。

最后,作者认为在定义族群这一概念时最核心的要素是共同的起源。

陈硕专栏·非此或彼

海外来鸿

阿富汗学者眼中的“中国梦”

◎ 理查德 (Richard Ghiasy)

◎ 宿亮 / 整理

◎ 萧兰稀 (Frances Pontemayor)

◎ 毛舜昉 (Stephan Mothe)

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中国梦”，这种愿景常被描述为“国家复兴”，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过，还没有人准确地回答如下问题：“中国梦”究竟会带来什么？如何实现“中国梦”？

针对“中国梦”的公共宣传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对于回答上述问题，以及影响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的传统至关重要。

理查德、萧兰稀和毛舜昉这三名阿富汗人在发给“政见”团队的文章中首先回顾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的宣传。

中国政府于 20 世纪 90 年代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补充原有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通过平面媒体、广播、因特网、展览、文化表演或者官方活动传递信息,为党的政策和活动提供支持。理查德等三人认为,中国宣传机构能力强大,通过宣传塑造价值观和舆论态度是传统做法。

“和谐社会”在“十一五”期间提出,旨在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预防贫富差距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关于和谐社会的宣传一般由国家主导,停留在抽象思想的传达,方式亦不够吸引人。在官方话语体系中,2020年将建成和谐社会,但“保证”、“改善”、“提倡”等词汇不能代替具体步骤或明确时间表。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使中国人具备了更强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喜好,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普及也在塑造品味苛刻的多样城市中产阶级。他们的希望难以用简单的抽象话语所满足。

同时,三名阿富汗观察者提出,中国宣传机构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如北京奥运会期间,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发起的杜绝不文明行为以及上海政府在世界博览会期间避免民众穿睡衣上街的努力。

尽管听上去这两个案例听上去不像“和谐社会”一样意义宏大,但其过程中多媒体协调联动、志愿者基层宣传及组织相关活动的

办法却一度行之有效。

另外，非政府组织主导的宣传活动对中国官方宣传同样有一定借鉴意义，如其邀请姚明等多位名人参与的保护野生动物和反对猎取、食用鱼翅的活动。

这些宣传活动目标明确，利用名人效应吸引公众注意力，展示错误做法的危害，具有启发意义，同时又没有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它们同样强调推进法治，利用法律强化文明行为。这些细微之处都是成功的诀窍。

如何表述“中国梦”？三名阿富汗观察者认为，要想引发公众发自内心的共鸣，就要采取新的传播方式。

首先，要考虑到中国国情的复杂多样，避免“一刀切”。忽视一时一地的民情，宣传就可能变得荒唐可笑、事与愿违。网络宣传也要有独特方式。

其次，考虑细节，多谈具体情形。“中国梦”应明确目标、生动形象，点明需要改变的具体行为。例如，阿富汗观察者们提出，要弘扬“中国梦”，就要改变社会中现存的诸如冷漠、缺乏社会礼仪、环境意识不强、社会监管不细等行为。

就这三名关注中国发展的阿富汗人看来，“中国梦”概念的传

播需要更多艺术创意才能真正引人入胜。他们认为，私营机构在市场营销和广告领域有实践经验，可以协助政治概念的宣传。尽管宣传的宗旨是教育和影响受众的态度与行为，但仍可借鉴商品销售过程中的元素。

他们写道：“华丽的辞藻、爱国主义口号以及革命式的口吻已经失去往日的效力，无法让日益精明的受众接受公益宣传……理解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对于开展一项活动来说至关重要。”

他们建议，“中国梦”的传播要纳入与公众的互动，让公众发挥作用、表达心声。同时，应聘请公众人物担任形象大使，个性化宣传方式，提高可信度。这一点可以参见姚明在宣传野生动物救援理念上的经验。另外，由专家、官员和其他人组成的公关团队也可在脱口秀、公共或娱乐活动中发挥作用，鼓励公众了解、参与。

他们的建议是：投资小活动、提升人情味，更亲密、更动人。

站在阿富汗观察者的角度，中国文化遗产千年、独一无二，但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全球化已经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宣传机构也要适应现实。“如果宣传部门仍然诉诸于已经过时的方法，那么中国梦总有一天会成为一种白日梦。”

全球化影响巨大，连阿富汗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国、关注

中国国内的公共宣传。他们的观察也体现了各国国内政治进程中面临的同样问题,即在信息爆炸时代如何传播政府的想法。随着中国的发展,传统话语体系逐步褪色,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走向现代政治学思考的范畴,如何与民众打好交道至关重要。

注

- Richard Ghiasy (理查德), 阿富汗战略研究所 (AISS) 研究员, 前阿富汗驻中国大使馆分析师;
- Stephan Mothe (毛舜昉),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专栏作家;
- Frances Pontemayor (萧兰稀), 中冶集团驻关岛战略投资办事处联络员。

书评

龙与象：真的很不一样吗？

◎ 宿亮

关于印度的话题在中国总能激起各种看上去有趣的讨论，比如火车卖“挂票”、吃饭用手抓等等，更严肃的讨论集中在印度洋的出海口、中印军事力量对比等等。在这些讨论的背后，我们真正认识印度这个国家吗？了解印度的现状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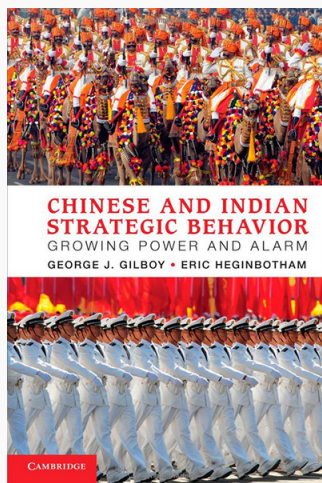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年来关于中印关系、印度发展的书籍，来窥探我们脑中建构的那个印度。龙与象，真的很不一样吗？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成员高承智（George J. Gilboy）和美国兰德公司政治分析师、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何理凯（Eric Heginbotham）2012年合著《中国与印度的战略行为：增长中的实力及警示》一书，就看待中印两国的方法提出疑问。

高承智和何理凯认为,美国在面对中印两国时,惯于这样设问:“中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印度怎样帮助美国应对这些威胁?”这种思考方法的误区在于没人能够真正通过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理解中印两国。

两名学者在书中系统评估中印两国在战略文化、外交政策、军事策略和经贸四个领域的异同,试图分析龙与象在这些领域的行为模式。尽管不少美国学者坚持民主和平论,认为拥有与美国类似整体的印度行事风格与中国不同,但高承智和何理凯的研究发现,龙象“战略行为整体上差别不大”,美国政府不应把政治体制差异作为衡量两国战略行为或与美国利益相关度的依据。

就能源和资源消耗来说,中国和印度需求不断扩大,因此积极与美国定义的“流氓国家”打交道,在苏丹、缅甸、古巴等国都可以看到两国的投资。在伊朗问题上,印度认为拉拢伊朗能平衡巴基



Gilboy, G. J., & Heginbotham, E. (2012). *Chinese and Indian Strategic Behavior: Growing Power and Alarm*.

斯坦在阿富汗的势力,这与美国政策相悖。与之类似,中印两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记录看上去都有较强相似点。

因此,“民主价值观念不能取代共同的地缘战略利益”,中印两国都给美国带来“机会与挑战”,而且挑战“同样艰巨”。站在美国角度,高承智和何理凯呼吁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路径对待中印两国,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因为两国本质上战略相同。

印度学者 C·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在《印度快报》上撰写了针对《中国与印度的战略行为:增长中的实力及警示》一书的书评《让美国看清亚洲》。莫汉认为,高承智和何理凯的著作虽针对美国读者,却也给印度提醒,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印度也应发展现实主义的观点,以认清印美关系中的机遇和局限。

莫汉认为,印度人看到中美矛盾的尖锐性,但也得认清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赖、中美关系比美印关系更紧密的现实。印度正在崛起,能够在平衡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高承智和何理凯的现实主义政策建议同样适用于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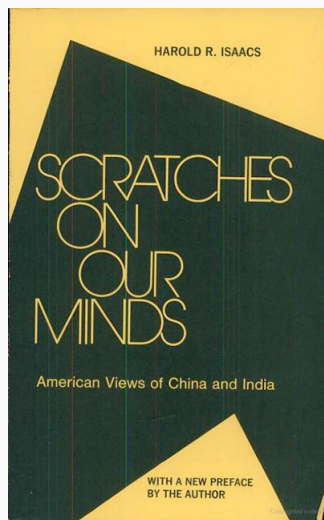
如此看来,中美印三角关系是否应是一个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范本呢?

莫汉在相关书评中把《中国与印度的战略行为:增长中的实

力及警示》一书与美国政治学者、记者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58年首次出版的《思维笔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

伊罗生的那本书采访大量美国人，询问他们对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印度的看法。那个时代，中国是美国人思考亚洲的核心，中国问题已经进入美国国内政治议程，那是因为美国崛起与“门户开放”之后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密切。去过中国的美国人都不认为中国会是未来美国的威胁。而对于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美国人认识不深，即便对印度有印象也是基于对中印关系的观察。

如今，这种观点随着中印的同时崛起完全改变了。伊罗生笔下美国人虚幻的印度形象现今清晰可见，伴随着盟友还是对手的模糊判断。高承智和何理凯的著作正是对这种复杂三角关系提出现实主义的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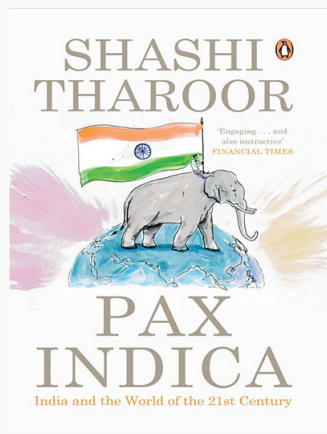
Isaacs, H. R. (1980).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那么,印度人在变化的世界中怎么看待自己呢?

沙希·塔鲁尔是《印度时报》专栏作家,曾经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印度政府部长级高官,2010年参选过联合国秘书长。这位多产作家2012年底出版新书《印度强权下的和平:21世纪的世界和印度》,分析印度主要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形成过程,认为印度要改变“大战略”,从不结盟国家发展成多结盟国家,发挥软实力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这种观点并不见于中国对印度的描述中。

《印度强权下的和平》一书始于一个关于印度外交政策的笑谈。塔鲁尔说:“许多年之前,一个印度资深外交官告诉我,印度外交就像大象做爱,要爬到很高的地方进行,在低得多的位置完成,然后两年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塔鲁尔认为,这种尴尬的外交实践已经基本是过去时了,但印度仍然没有拿出属于自己的外交大战略来。印度还不是一些印度



Tharoor, S. (2012). *Pax Indica: India and the 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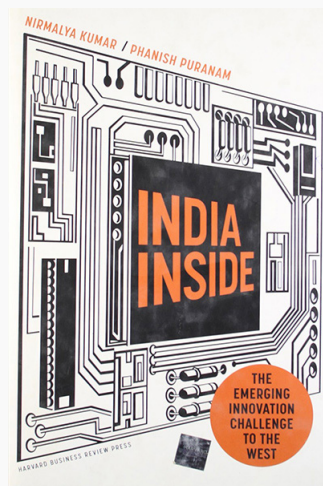
人所说的“新生超级大国”，其重要性在于印度掌握核武器，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

就大象身边的巨龙，塔鲁尔认定中印“存在共同发展的空间”，未来的印度可以广结盟友，在中美之间采取摇摆策略，以获取更多国家利益。

这名前联合国高官大胆预测，21世纪中期印度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处于一个“后超级大国时代”，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参与者，但那时的世界是由多个国家共同塑造的，没有那个国家能够主宰一切。

不得不说，这种观点与中国为未来世界的预测并不缺少相似之处。

印度如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伦敦商学院学者尼马利亚·库马尔和帕尼什·普拉南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印度内幕：西方面临正在兴起的创新挑战》尝试解答这样一个“回到未来”的



Kumar, N., & Puranam, P. (2011). *India Inside: The Emerging Innovation Challenge to the West*.

题目。

库马尔和普拉南似乎厌倦了人们把印度看成是“服务业外包胜地”。他们采访了通用、英特尔等国际大公司在印度的高级管理人员,认定从 B-to-B 商务模式到研发外包,再到管理创新,印度都处在一个兴起的过程中。“印度设计和自主产权”的产品越来越多。

不过,印度的创新类型却与西方不同。简而言之,西方设计了 iPad,印度开发了优秀的应用;西方出现了谷歌,印度优化搜索。印度的专利申请数量增幅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将近 7 倍。印度的创新是“隐形的”,因为虽然没有全新产品,但印度是对别人创新和设计的再修改,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参与市场竞争。

在库马尔和普拉南看来,这就是印度增长的秘诀,也是印度经济的未来。坦白来讲,这种“印度方式”对中国人而言陌生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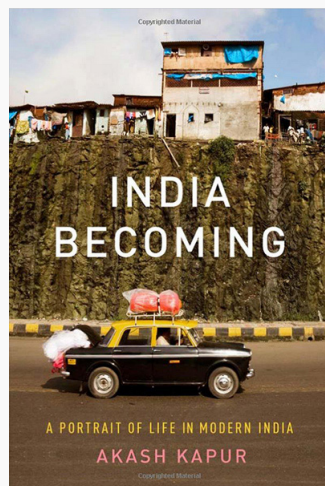
为了完整见证印度这头“大象”,最后一本值得关注的印度主题图书是《成为印度:现代印度生活写照》。作者阿卡什·卡普尔(Akash Kapur)是一名在印度美国留学生,他学成归国后发现,印度社会和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的印度社会,等级森严;卡普尔回国后,看到一个因为房地产开发而失去土地的印度大地主,这些原来在印度农村具有社

会治理权威的乡绅在地方政府腐败及犯罪猖獗的地方已经完全失势。类似的状况还有很多,妇女要求更多权利,同性恋公开表达性取向。印度社会在飞速发生着变化。

卡普尔认为,印度人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已经抛弃了原来的简单与纯粹,陷入“梦境”,但与此同时,过去那些拥有传统价值的东西也同样迅速走远。

或许,用卡普尔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能够更清楚表达他在《成为印度》一书中的观点。他写道:“在印度经济以每年8%的速度迅猛增长并且似乎将永远势不可挡的时期,整个印度都把信心放在了市场上。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虽然没有说破,但是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快速的经济增长能够自行解决印度的社会问题。……现在这种情绪已经消散了……印度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已经不容否认,所以印度已经变得不再痴迷于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增长。”



Kapur, A. (2013). *India Becoming: A Portrait of Life in Modern India*.

对于中国而言，“大象”印度遥远而陌生，人们习惯了猜测那个大山南麓的地方。然而，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能够看出，印度与中国就外交、政治、经济、社会而言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在国际竞争中，同样的境况可能造成共赢的机会，也可能提出严峻的挑战，但相互了解的意义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 Gilboy, G. J., & Heginbotham, E. (2012). *Chinese and Indian Strategic Behavior: Growing Power and Ala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han, R. (2012). Clarifying Asia to America. *The Indian Ex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archive.indianexpress.com/news/clarifying-asia-to-america/965601/o>
- Isaacs, H. R. (1980).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M.E. Sharpe.
- Tharoor, S. (2012). *Pax Indica: India and the Worl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enguin Global.
- Kumar, N., & Puranam, P. (2011). *India Inside: The Emerging Innovation Challenge to the Wes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 Kapur, A. (2013). *India Becoming: A Portrait of Life in Modern India* (Reprint edition). Riverhead Trade.
- Kapur, A. (2013). 围绕印度未来的论战. 华尔街中文网. 检索自 <http://cn.wsj.com/gb/20130815/opn073348.asp>

加入我们

政见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的团队，我们期待并随时欢迎你的加入。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相信：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工作，协力实现自己的想法，是一件快乐而又令人获益良多的事情。

在这里，你可以与一群优秀的朋友共事，施展自己的才华。

成为政见观察员

目前, 政见观察员以在国内外修读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和从事政治报道的媒体人为主。我们致力于将理性、深刻、富于启发的学术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

如果你认同我们的理念, 并且能够完成以下两项工作, 那么你就是我们希望吸纳的新成员:

- ※ 阅读学术期刊或智库报告中与中国政治社会相关的文章, 并撰写千字左右的文章对作者观点予以介绍。例文: 〈“重感情”的中国基层政治〉 CNPolitics.org/2011/12/local-political-participation
- ※ 联系研究中国政治的国内外学者, 并进行访谈。例文: 〈访法国汉学家潘鸣啸〉 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加入我们的团队之后, 你的职责将是定期提供稿件。因此我们希望每周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政见自身拥有多种新媒体平台,并和国内外多家媒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可以让你的作品获得广泛的传播。我们是非营利团队,因此没有办法向你支付薪酬;如果作品被合作媒体选用,你可以得到稿酬。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作品。作品需为上述第一类文章。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设计师

如果你爱好信息可视化,如果你是 Adobe DTP 专家,如果你计较像素对齐、标点挤压……如果恰好你也像我们一样,关注中国政治,政见期待你施展以下任一才华:

- ※ 优雅的文字设计: 擅长图文编排,对文本有严谨的控制力,对图像有丰富的表现力。在这里,你将亲自实践屏幕呈现的图文设计,还将参与平面媒体的信息图制作。
- ※ 精致的用户界面: 擅长信息架构,熟知互联网及移动设备的交互模式,良好的视觉表现技能。在这里,你将直接推动政见网站的改版,探索政见在移动互联网中的产品设计。
- ※ 创造性的信息可视化: 擅长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动态、可交互的信息图设计。在这里,你将与时政领域最优秀的观察家紧密合作,探索中国政治话题下的信息创意传达。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和设计作品。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主页君

政见是一个基于新媒体的团队，我们生产的内容依托多种新媒体平台传播。在今天这个媒体变革的年代，好的内容更需要依靠懂传播的人才能产生更重要的影响。

我们希望政见主页君认同团队理念，并且能够完成这些工作：

- ※ 与现有团队成员合作，运营政见新媒体平台（包括微博、微信等）——既包括独立撰写微博等内容，也包括发布他人撰写的文章，还包括与读者互动。
- ※ 与其他网站、平台联系开展合作。

我们希望寻找的新成员，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 ※ 做事靠谱，认真细致。对细节有完美主义的追求更佳。
- ※ 新媒体运营对及时性的要求很强，因此希望你大部分时候每天都能有一定时间用于政见团队的工作。

- ※ 思维活跃,熟悉新媒体运营,熟练掌握各种新媒体平台以及 Photoshop 等软件的使用。懂得基本的 HTML 语言更佳。
- ※ 掌握基本的政治学、社会学知识。修读相关专业者更佳。

有意加入者,欢迎投递简历,并附文介绍自己对政见新媒体运营的想法。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成为政见工程师

Web 前端工程师:

- ※ 具有扎实的计算机基础知识。
- ※ 熟悉 W3C 标准及规范, 熟悉 HTML、CSS、JavaScript 等技术。
- ※ 熟悉各类 JavaScript 框架, 如 jQuery、ExtJS、Yahoo UI、Prototype、MooTools 等。
- ※ 能熟练高效手工编写 HTML、CSS 及 JavaScript 代码, 确保代码对各种浏览器的良好兼容性。
- ※ 熟悉面向对象的软件设计方法、对设计模式有深入的理解及应用。
- ※ 具备 JavaScript 框架开发经验者优先考虑。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Web 后端工程师:

- ※ 精通 web 编程, 具备 PHP 开发经验, 熟悉常用设计模式。
- ※ 熟悉至少一种主流数据库及 SQL 语言、熟悉 Linux, 熟悉主流开源框架。
- ※ 热爱技术, 喜欢钻研, 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 ※ 有良好的沟通技能, 团队合作能力。
- ※ 有移动服务端开发经验者优先。
- ※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喜欢、认同这个事儿并愿意奉献自己的部分时间就行。

有意加入者, 欢迎投递简历。来信请致: Webmaster@CNPolitics.org

Cover image courtesy of [Wikimedia Commons](#)
— *Spring by the Seine*, Oscar-Claude Monet, 1875.

欢迎投稿推荐或自荐研究成果!

联系邮箱: Webmaster@CNPolitics.org

新浪微博: [@政见 CNPolitics](#)

腾讯微博: [@政见](#)

人人小站: zhan.renren.com/CNPolitics

Facebook: [政見 CNPolitics](#)

Google+: [+政见 CNPolitics.org](#)

微信公众号: [政见 \(cnpolitics\)](#)



政见 CNPolitics.org © 版权所有

